



工廠 · 廚房 · 垃圾房 · · ·

香港女工五十年

編輯小組：  
吳曉真 · 招璞君 · 胡美蓮 ·  
許少英 · 蘇耀昌

出版機構：  
文星文化教育協會 /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



工廠·廚房·垃圾房 ..... 香港女工十五年

編輯小組：

吳曉真·招璞君·胡美蓮·許少英·蘇麗昌。

訪問員：

梁淑美·徐家裕·蔡泳詩·關紹君·許少英·吳曉真·李峻嶸·  
鄧秀君·葉長秀·梁靜珊。

執行編輯：胡美蓮

排版/設計：黃雅娜

封面設計：吳曉真

ISBN：9889863758(10碼) 978-988-98637-5-3(13碼)

出版時間：二〇〇六年十二月

定價：港幣80元正



出版機構

文星文化教育協會

地址：旺角西洋菜街旺角城市中心1105室

電話：2789 1736

網址：www.manscultural.org

電郵：info@manscultural.org

發行

Kubrick

九龍油麻地眾坊街3號 電話：2740 4488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

地址：觀塘翠屏村翠櫻樓地下1-3a室

電話：2790 4848

網址：www.hkwwa.org.hk

電郵：workwomen@hkwwa.org.hk

本書版權為香港婦女勞工協會、文星文化教育協會及作者持有。除獲本書版權持有人允許外，不得在任地方，以任何方式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插圖。

©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文星文化教育協會 2006

## 目 錄

前言	04
婦女與經濟自主	05
自助組織的發展與社會資本的建立	06
四篇有關「工作導向福利」、「社會資本」、「第三部門」 文章的評介	15
Hong kong Women Cooperative as alternative Economic practice.	22
Economic Justice and women workers.	41
「第三條道路」，向左轉、向右轉	48
蒙德拉貢實驗	52
婦女與貧窮	57
房屋署實行最低工資對外判清潔工人影響調查	58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Clothing Industry And the Impact on Female Workers.	76
The Strategy of mobilization: The Community Approach to organize Sub-contract Cleaning Workers.	85
[落區故事] 不要在晴朗的一天出發了，就由今天出發！	94
運動與分析	107
女性主義運動與基層參與	108

自我弱化與充權	110	期望二十五週年慶祝	218
女性經濟自主	113	—— 速印合作社及膠樽回收合作社社員阿華	
全球化之下的女性生存空間	116	以前打工要聽話、而家人人有發言權	221
建立基層婦女運動的理論	123	—— 訪問中大女工同心合作社社員	
游走婦運與工運之間	131	“有人問勞工權益，我也有責任解答”	224
性別、勞動、族群與資本外移	138	—— 訪問清潔工職工會理事	
香港婦女勞工運動發展	154		
“自主團體的內部緊張關係” —— 學生與基層	166		
香港合作社運動考察	169		
		女工協會生活照	228
		後記	236
人物專訪	182		
女工做回自己的發言人	183		
—— 嚴月蓮（香港婦女勞工協會的創辦人）			
從工廠到社區	189		
—— 杜潔麗			
香港婦女運動勝於互相信任的友好關係	192		
—— 林慧霞			
走出學院，回到基層：從學生到學者	198		
—— 潘毅			
不示弱女人	203		
—— 林英卿（烏蠅）			
女工是個很流動的身份	208		
—— 林麗玲（joy）			
女主義可說是看社會的踏腳石	213		
—— 鍾婉儀（阿靚）			

## 前言

編者的話：

胡美蓮

2004年香港婦女勞工協會踏入第十五個年頭，也是女工協會面對財政危機最嚴峻的一年；那年頭難得認識一班有志探索女工運動的朋友，他們才剛認識女工協會，一腔熱誠地參與訪問和出版，多少是一種仗義行爲——協助一個基層婦女團體整理經驗出版、以及透過書刊籌款。一晃眼兩年，其實編委小組以大半年時間便完成訪問和編寫，接著的書刊後期製作，因為設施不足、軟件難題和義務專業朋友的轉工等，書刊一直延宕至今；這經歷也反映基層團體在專業技術支援上面對的困難。不過這階段並不凝滯，反而讓書刊文章和內容不斷豐富。

書刊出版了。最令人感動的是，這班關心基層婦女處境的朋友，都以不同方式投入支援和參與基層婦女運動。在這裏特別多謝編委小組的成員和一班訪問員，他們除了協助出版、還在漫長的出版期以不同方式支持著女工協會；同時也得多謝分別設計初版和新版的義工；而最想感激的是撰稿和接受訪問的朋友，靠著這班支持者的堅韌，女工協會的經驗才能與讀者分享。

這本書刊分五部份，「婦女與經濟自主」探索香港婦女在合作社經濟、和蒙德拉貢的歷史發展、也探索社會福利“第三條路”相關的工作導向福利問題。「運動與分析」從全球化的場景，考察基層婦女運動、工運和合作社運動，嘗試建立性別勞動與社會資本的理論。「婦女與貧窮」則是具體地研究香港基層工友的處境，從婦女面對製衣業轉移的策略到清潔工的保障爭取。「人物專訪」是透過前職員或執行委員的不同角度，去總結女工協會的參與經驗和反思女工協會的路向。

女工協會累積了前線組織工作和經驗，憑藉的是對基層組織力量的信念；基於人力所限，過去很少將經驗整理、分析和出版。這本特刊，希望你能讓你更了解基層婦女的力量，也祈願能吸引更多關心基層婦女的朋友加入我們的隊伍。

「工廠・廚房・垃圾房

・  
・  
・

——香港女工十五年」

# 婦女與經濟自主

自助組織的發展與  
社會資本的建立 ----- 6

四篇有關「工作導向福利」、  
「社會資本」、「第三部門」文章的評介 ----- 15

Hong kong Women  
Cooperative as alternative  
Econ practice. --- 22

The Economic Justice  
and women workers. ----- 41

「第三條路」，  
向左轉、向右轉 ----- 48

蒙德拉貢實驗 ----- 52

# 自助組織的發展與社會資本的建立 --兼論高茲

胡美蓮

(轉載自：2003年《青年研究學報第六卷第一期》)

本文以「中文大學女工合作小賣店」……一個小型合作社的經驗，發掘“社會資本”的“非資本邏輯”價值，並借高茲(Andre Gorz)理論，檢視“社會資本”與資源再分配、市場競爭、民間互助三者關係，透過比較“社會資本”與“自主經濟”的異同，建立一種社會批判角度。

## 一、“資本”的威力

資本是甚麼？

印象中好像是投資、賺取利潤工具之稱謂。

那生產的四個因素又是甚麼呢？

是資本、土地、管理，與工人；這是任何讀過中學經濟科都知道的事。但疑問是：為何不列水跟空氣，難道跟生產真的無關？後來，當環保越來越受重視之後，才知道，原來是問錯了問題。

“何謂生產的四個因素”不是真正問生產需要甚麼，而是問：作為一個生產者，那些因素你須付出“價格”（“當然”是以市場上的貨幣來衡量，換言之，那些無法用貨幣衡量、或不用“購買”的因素，便可全部隱沒在支出負債表上）。

那時“資本”家還毋須在空氣及水兩項因素上付出代價，所以就不用計算。不過，環保主義者告訴我們，“代價”還是“付”了，只是不用錢的形式，而是由社會所有人來“負”責/擔。

課本上的經濟學知識，不一定值得相信。

“付款”與“負責”之間、“計算”與“不計算”之間反映甚麼？

“付款”是一種“純”（？或應說抽象）經濟活動概念，“負責”則包括道德責任。“何謂生產的四個因素？”這種傳統話語形式，無視道德責任，將人視為物件，馬克思稱之為“物化”、“商品化”。

但現在卻面臨另一個難題。

若將道德也計算入生產過程，又會否將道德進一步物化，尤其以“資本”作為其衡量單位時（人的互助關懷何時成為投資、賺利的“資本”？“社會資本”？）。

馬克思說：是人創造了貨幣，但貨幣反控制人，使價格成為衡量一個人價值的標準。所以我對“資本”這類名詞很敏感，當“社會”與“資本”合成一個複合詞時，是“社會”吞噬了“資本”？還是“資本”吞噬了“社會”？弄不清楚。

即使心懷好意，我也攪不清好心之餘，是否也同時為資本主義文化霸權開啟綠燈，把還未完全納入市場邏輯的諸種社會關係（如人際互助網絡）加速“資本化”？我們怎樣討論全球（資本主義）一體化的呢？

我當然明白有些朋友提出“社會資本”的善意用心，所以不完全排拒這個名詞，但仍想問：

如果不用“社會資本”這個概念，那還有沒有其它的表述方法，可保留其善意內容呢？

## 二、自主經濟

法國社會學家高茲 (Andre Gorz) 的理論，與“社會資本”很有關係，但套路不同。我甚至懷疑他不會喜歡“社會資本”這個詞。以下將有關理論劃分為四個部分：

### [a] 經濟理性批判

高茲認為經濟是一項複雜的人類活動，只有目光如豆的經濟學家才會無視人類在經濟活動中追求各種價值，他在《經濟理性批判》(Gorz, 1989) 一書中指出，在各項受薪工作中，若勞動者只考慮物質利益的話，經濟活動根本無法進行。但許多經濟學家卻無視勞動價值，將工作貶低為供求率或邊際利潤上的一個變項。

高茲鼓吹由社區建立自主經濟，其分析是基於後工業社會技術突飛猛進，大量取代勞動力，根本無足夠工作崗位讓全民就業。高茲提倡酌量減薪，設基本工資保障，並大幅減低工時，以達全民就業。每人每天只需工作四至六小時，餘下時間，便可自願投入義務或非牟利的自主經濟活動。高茲認為，大規模生產的產品一式一樣，又破壞自然，由社區舉辦非牟利或義務活動(如合作社等)，可照顧區內不同社群需要。

### [c] 過渡社會戰略

高茲沒有否定大規模生產的重要性，他認為大規模生產能改善人類的物質生活，尤其今天，在自主經濟尚未能取代大規模生產的時候，大規模生產仍將扮演舉足輕重角色(對此，高茲提出工業民主化及工會運動以制衡大規模生產的異化及對社會及自然的破壞)。但大規模生產經濟應向自主經濟過渡，政府應協助民間建立自主經濟。當自主經濟得到發展，勞動者在自主勞動中得到滿足後，就不再倚靠過度消費來滿足因異化帶來的空虛，屆時，盲目的大規模生產便會受到消費者揚棄。

### [d] 邊緣勞工

高茲提出，後工業社會出現越來越多臨時、兼職的非技術工人，他們對工會

運動並不積極、缺乏團結，高茲稱之為“非工人非階級”。他們為數龐大，不少是婦女、新移民，及失學青年，浮沉於勞動力市場及社會救濟之間。高茲對這批工人寄予厚望，認為他/她不似正規工人深受資本主義邏輯薰陶；這點我並無高茲樂觀。但若從另一個角度看，婦女、失業者、半失業者與社區關係，確實較正規工人更為密切，正好是社區自主經濟的潛質對象。

這裏特別提到高茲，有幾個原因，除與“社會資本”相關外，還因為：

- (1) 在提出“社會資本”，是否需要小心隨時跌入資本邏輯的陷阱？
- (2) 討論“社會資本”時，如何才不會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忘卻社會的分析和批判？
- (3) “社會資本”如何定位？只是應付失業問題的臨時“水泡”，還是具有長遠意義的社會經濟企劃？

在第一個問題上，我想起女性主義“有償家務勞動”的討論。

由於家務勞動的價值在國民生產總值或政府話語中從來得不到表達，作為家務勞動者的婦女地位不受重視，故有歐洲女性主義者提倡“有償家務勞動”，建議政府應給予家務勞動婦女薪金。高茲對此表示憂慮。

高茲並不擔憂這將觸發政府龐大財政負擔，而是害怕家庭進一步商品化。

家務勞動價值如何計算？政府作為僱主，是否有權像灶君一樣進入家宅，檢查每位家務勞動者表現，再以金錢劃分兩個母親的愛心？同樣，高茲不反對政府向懷孕婦女提供保障，卻質疑女人生仔是貢獻社會的說詞。認為這樣既規限女性價值，更把母親與子女的獨特關係，以社會之名而買去、割裂開來。

有些婦女主義者因此批評高茲維護父權。

對高茲而言，社會是靠許多非關利益或非關短暫物質利益的價值來維持。當商品化不受控制，醫生不願懸壺濟世，只肯盡心救有錢人、或教師不再有教無類，而是斤斤計算一分錢一分貨時，大家的生活都不會好過。幸好我們還不致於此，高茲力證某些經濟學家過甚其詞，看不到勞動者在工作上，除物質報酬外所追求的價值。

倚此而論，失業救濟金或綜援並不是失業者的最佳防護，因失業者喪失的，並不單是一份收入。那些“綜援養懶人論”的提倡者，與麻木不仁的經濟學家並無二致。他們缺乏的不是學術或專業上的訓練，而是不瞭解“人”的需要。不過，高茲若停步於此，仍可能是個不折不扣天助自助者的浪漫保守主義派。但他沒有就此停步。他一方寄望於民間自主經濟，另一方面爭取工會支持縮工時、酌量減工資，但設立基本工資保障、爭取全民就業。沒有這個背景，自主經濟只會跌入窮人自救、貧者自貧的局面。（今天報章說：公務員工會接受裁員但不接受減薪方案。〈明報〉2002/10/28）

今天談到“社會資本”、“社區共享”時，我們又面向那裏呢？是意義深遠的社會改革？還是臨時掛個名牌、一時一樣兼走樣的濟貧方案呢？

### 三、作為自主經濟的合作社

自主經濟不以利潤為目標，而是以服務及勞動創造為根本，即我們所說的非牟利經濟活動。高茲在這點上沒有很多說明，我們可參考與高茲接近的意大利社會學家明治奧尼(Enzo Mingione) 看法。明治奧尼借用人類學家傅蘭尼(Karl Polanyi) 觀點，把社會經濟活動劃分三類：一是由國家統合的資源再分配(社會福利包括其中)；二是市場統合的競爭(打工包含在內)；三是民間互助。(Mingione, 1991)

這種不以直接報酬為基礎，含有禮物交換意味的民間互惠，即高茲所說的自主經濟。互惠並非就沒有“經濟”內含，它是維繫我們日常生活(包括經濟活動)必不可少的元素，甚至是協助資本主義社會建立起來的重要原則。(同上)。一個農民願意幫襯老遠店舖，為的是店主曾幫過他父親；你用較高價錢幫襯一個工匠，可能是因為他是你的親戚或一個你認為值得幫襯的人。(Mingione, 1985) 這種例子，大量存在於我們生活中。

這種“非資本邏輯價值”的存在，使高茲的自主活動、或我們今日所說的“社會資本”成為可能。至於如何聚合不同的“非資本邏輯價值”以建立自主經濟，則是以下要說的故事。

「中大女工合作小賣店」(下稱小賣店)成立於2001年尾，由香港婦女勞工協

會(下稱女工協會)向中文大學投得。女工協會以合作社方式，組織了一群婦女參與。小賣店地點在中大范克廉樓地下，學生會及泳池旁邊。這個不及二百平方呎的小店，由十個左右的社員打理，香港婦女勞工協會則一直從旁協助。有關小賣店的詳情，可參考她們的通訊(〈女工中大合作之路〉，2002)，這裏不再重覆。這裏想討論的是：不同的“非資本邏輯價值”，如何接合一起，構成小賣店這個故事/敘事。



#### [a] 基層理念與大學理念

這裏牽涉兩種不同論述的結合，一是基層理念；二是大學生對自己社會角色的看法。

2001年初，一批中大學生，在知悉校園將增設小食店後，由於不希望合約落在財雄勢大的連鎖集團手上，徒添壟斷之勢，於是以問卷諮詢同學意見，並游說校方：大學應負社會責任，在審標時將失業及弱勢人士因素放入優先考慮之列。結果在這種情況下，女工協會獲得合約(首中標的不是女工協會，後來中標者退出，女工協會從第二位補上)。

中標後，女工協會一方面著手招募及培訓失業女工，成立小賣店合作社，同時則籌募經費。當時，女工協會本身亦有財政困難，小賣店的資金，幾乎完全是透過支持合作社理念的個人及團體(包括大學講師)以捐助及免息貸款形式而籌得。另一方面，小賣店邀請同學交流，瞭解同學對小賣店的期望。同學中不乏對社會及基層問題有關注的，雙方覺得不妨將小賣店發展成大學與基層的橋樑，一方面將基層議題帶進校園(透過陳列基層團體刊物、活動傳單，及推介非牟利團體的環保及扶貧產品)；另一方面則鼓勵同學義務為女工舉辦課程(如英文班)，及輪流到小賣店當值，體驗合作生活。同學笑稱是“勤工儉學”。在此基礎上部份同學更組成基層關注組，跳出校園，主動走訪、探討不同的基層

問題。

可以說，小賣店之所以形成，首先是得益於基層理念與大學生理念的順利結合。而將大學資源與基層弱勢社群結合的概念更不斷漫延。不到半年，嶺南大學學生會將小賣部交給一個由單親婦女組成的合作社經營；而城市大學宿舍新設的小賣部，亦將在年底前交給一個由居民團體組織的合作社經營。

### [b] 大學社區

“社區”本來是基層團體的熟絡概念，但當婦女進入大學經營合作社時，社區的內涵又如何劃定？尤其婦女與大學生有著不同文化。

小賣店不特將自己融為大學校園，成為一份子，譬如提供無利可圖，但方便同學的訂報服務、聲援因示威遊行被起訴的中大同學、與學生會合辦勞工節、校園文化討論；還積極介入校園文化的塑造，如出版〈女工中大合作之路〉，向同學推廣合作社理念，及參與學生晚會，呼籲關注基層女工權益。小賣店得到了學生報導，及經常成為同學功課上研究的課題。而婦女亦經常“研究”學生，她們會主動與來幫襯的同學搭訕，瞭解現今大學生的價值；也會發出問卷，調查對小賣店的意見。

小賣店不同於一般店鋪的還有，同學見小賣店姨姨都平易近人，許多時便自己動手起來“整”食物，不需服務。像熟絡的村口士多。

### [c] 婦女就業與合作社

女工協會自八九年成立以來一直關注婦女就業問題。香港製造業自八十年代中轉型，生產線遷移國內，首當其衝是曾為香港繁榮作出貢獻的中年女工。女工協會的誕生，可以說，就是要回應這些問題。當時的工會及勞工團體甚少關注女工議題。

隨著九十年代經濟繼續惡化，更多女工（包括服務業）被擠出勞動力市場，而且有年輕化趨勢。面對這種情況，除繼續與其它團體一起透過集體行動，向政府反映意見外，更必須面對重投工作無望的女工的徬徨。於是自九六年起，女工協會開始以合作社形式鼓勵女工組織起來。

小規模的合作社試驗，自難取代正式工作，為社員提供足夠的生活保障；但透過

集體努力，女工既為家庭找到一份輔助收入，更可發揮潛能，建立女性自主的價值。婦女在籌組時交流到如何說服家人--尤其是丈夫阻攔加入合作社一等等；在編更時互相遷就，明白到家家有本難念的經，身為女性的尤其體驗到。

許多時，婦女都不夠信心及經驗，而將決定交給從旁協助的工作員（女工協會），當工作員將問題交回社員時，社員有時會有“被壓迫”的感受；而不同社員對合作社亦有不同的理解，社員與社員間、社員與工作員間，有時亦會存在緊張關係。要將這些緊張轉化，會是長年累月的工作。女工協會會鼓勵不同團體來探訪合作社，一來讓合作社經驗得到更多人的分享；二來也藉此讓社員總結經驗。



在合作社開會及接受探訪時，通常會有同學來小賣店義務當值。這些來自校園內及社會上的支持，除鼓舞起女工的士氣外，更使她們將小賣店經驗，與更大的社會脈絡聯繫起來。

## 四、總結

「中大女工合作小賣店」作為一個沒有任何資助的計劃，無論從投標、籌募經費、組織、到運作，全靠女工自己團結，及學生、教授、基層團體、婦女團體等社會及社區網絡的支援，才能成事。這點與“社會資本”的精神十分接近。

其中所提到的諸種理念：基層理念、大學理念、大學社區概念、合作社運動，及女工就業權等，就是作為自助組織的小賣店，在建立“社會資本”時（如果



這個概念仍然適用的話)，所動員的因素。

這些因素可籠統地說，都有一個共同面向--就是“非資本邏輯價值”。這正是我為這個特殊“社會資本”的例子添補的第一點註腳。

而第二點是，它必須有社會批判面向。民眾在社區價值重塑的過程中，是否擁有自主權，可改善自己的命運，繼而重塑一個合理公平的社會？而不只是被動的參加了一個善心的濟貧方案。

這裏還牽涉一個更大的問題，究竟崇尚社區共享的“社會資本”，在資源再分配、市場競爭、民間互助三者間扮演甚麼角色？如何協調？

會否出現借“社會資本”之名來削弱綜援保障？或一方主張貧者重建“社會資本”以自力更生、另方面則容忍強勢者繼續以自己強大的“社會資本”，進一步壟斷市場？

種種跡象顯示，“社會資本”，作為一個日漸受到關注的意念，仍有待進一步省思。

#### 參考文獻

- Enzo Mingione and Nanneke Redclift (eds) (1985). Beyond Employment.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 Enzo Mingione. (1991). Fragmented Societies. Cambridge: Basil Blackwell Ltd.
- Andre Gorz. (1989). 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 London: Verso.
- 陸俊(1998)：〈高茲：後工業社會的烏托邦〉，載陸俊著《理想的界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165-204。
- 基層大學網頁，內有幾篇文章論及高茲及明治奧尼。參考「點紅點綠工作坊專輯」，載基層大學網頁<http://www.grass-root>。
- 胡美蓮(2001)：〈游走於婦運與工運之間〉，載於陳錦華等編《差異與平等》，香港：新婦女協進會、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學系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出版，頁71-76。
- 〈女工中大合作之路〉(2002)，香港婦女勞工協會、中大女工合作社、中大基層關注小組聯合出版。
- 〈明報〉(2002年10月28日)。

## 四篇有關「工作導向福利」、 「社會資本」、「第三部門」 文章的評介

崔老頭

### 一、前言

以下四篇文章，均涉及「第三條路」相關的「工作導向福利」、「社會資本」、「第三部門」討論。茲引介如下。

### 二、「工作導向福利」反思

麥多威：〈關愛、金錢，與勞動性別分工：對英國「工作導向福利」的批判反思〉，原文見Linda McDowell, "Love, money, and gender divisions of labour: some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welfare-to-work policies in the UK,"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5 (2005) pp.365-379.

文章從幼兒照顧的角度，檢視英國「第三條路」的「工作導向福利」對基層婦女的影响。「工作導向福利」，據稱可協助貧困人士(尤其是年輕母親)重投勞動市場，改善她們生活，又使她們重投主流社會，不再被孤立。新工黨理論家的假設是，婦女不欲投入勞動市場，因要養兒育女。因此「工作導向福利」一方面削減失業津貼，另方面則向有養兒育女需要的低收入者提供優惠，助她們在市場上購買幼兒服務。

作者說「第三條路」是自相矛盾的。它一來塑造人人必須勞動(只在市場上)，不能依賴政府救助的公民道德；另方面則又極力宣傳養兒育女是家庭自己的責任。結果，基層婦女把子女放到託兒所，自己則從事低薪工作。諷刺的是，許

多基層婦女找到的，就是託兒工作，而且幾乎是最低薪的那種！。

作者說「工作導向福利」基本上是失敗的，因大部分婦女因找不到廉價託兒服務根本無法外出工作，但這還不是最重要原因。最重要是，即使有工作，有託兒服務，許多母親（及父親）仍會將養兒育女視為人生的最重要價值，而且照顧、關愛是無法由市場服務找別人來替代的。而在新自由主義的字典中，市場上並無道德這樣的字眼，而勞動者則被視為抽象的個體。

作者說部分人會認為「工作導向福利」是女性解放家庭束縛、改變性別分工定型的向前一大步，但作者說，能透過市場建立自己的事業，及透過市場購買有水平託兒服務的，只能是中產階級婦女。「工作導向福利」令婦女進一步階級分化。而且，婦女必須投入勞動市場才算完成自己責任的這種說法，實際上是貶低家務勞動、無償照顧的價值；勞動市場給予託兒服務員極低薪亦是例証。作者說，有統計顯示，若將家務勞動價值計算入內，英國本地生產總值便最少增加50%。

但這種計算方法也是危險的（似乎作者未意覺這點），正如作者所言，在新自由主義及新工黨政策下，幼兒培育及婦女平等問題已變成一項人力資源的問題。若將家務勞動也折算為貨幣，與投機、買賣放進同一帳目下，將是誰的勝利？

### 三、「社會資本」的語言政治

史密夫等：〈也許是社會？但為何是資本？「社會資本」的語言政治〉，原文見Stephen Samuel Smith, Jessica Kulynych, "It may be social, but why is it capital?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Politics and Society* 30, no.1 (2002), pp.149-186.

文章主要討論「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這個概念如何形成，及其意識形態內涵。作者先從「資本」(capital)出發。「資本」自羅馬帝國時代已出現，意指借貸中可獲得利息的本金，這個定義一直到近代未變。在19世紀的古典經濟學中，「資本」含有非常正面形象，但馬克思卻把「資本」的形象改變，把它連上剝削的議題上。不過，儘管大部分經濟學家不承認「資本」與剝削

的關係，他們也不敢將人稱為「資本」，因這有悖於社會上對人性的看法。首倡其說的可能是亞當史密夫，他將有生產力的國民稱為「資本」。其後的經濟學家不敢如此赤裸，只敢將一個人的教育、技術、健康視為「資本」，稱為「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人力資本」所指的範圍仍與經濟活動有直接關係，但「社會資本」則把概念擴散至人類活動有關的一切解釋上，學者甚至用之來解釋政治、人際關係。

「社會資本」一詞首現在20世紀初的美國出現，初指教育與社區發展關係。到世紀末發展為一套理論，當代最重要的理論家是科爾曼(Coleman)、普特南(Putnam)，及布迪厄(Bourdieu)。作者指「社會資本」理論(尤其是普特南)假設世界是個大市場，每個人都是資本家，資本家利用一切條件(包括人際關係、技能、教育……)進行投資，勝者為王。這套理論認為，在市場上名成利就的人，是因為懂得運用及累積「社會資本」(包括人際網絡)，而窮困者則多是欠缺「社會資本」的人。

作者指「社會資本」的大問題是含糊了問題的真相，令我們無法真正解決問題。作者問，當窮困者結連起來，它就能改變不公義的社會嗎？誠然左翼也叫工人團結起來，但團結起來做甚麼呢？就是要改變這個「各私其私，弱肉強食」的不公義世界；但「社會資本」理論卻不加區分地將大財團憑個人關係壟斷市場的行為，與弱勢者團結起來改革社會的行為等量齊觀；如「社會資本」理論所言是正確的，人人只顧自己利益，那窮困者為何會團結起來呢？

這裏插句題外話。儘管「第三條路」也使用「社會資本」一詞，但與前者是不同的。普特南要建立的是一個朋黨排斥的世界，但「第三條路」主張的是「公民社會」，就是看到排斥性的社群主義的危險。所以，「第三條路」的左翼路線雖然並不徹底，與新自由主義傾向甚濃的「社會資本」理論還有一段距離。今日香港社會服務界(即「第三部門」)談的「社會資本」，又是那一種呢？

那為何「社會資本」理論大行其道呢？我們從詞義可見，「社會資本」是一種金融投資的概念/世界觀。在全球化討論中，已有人指出：當下資本主義全球化，與之前的全球化分別在--金融資本已壟斷了資本主義市場。這個我們可從社會「資本」、社會「投資」的命名可看到。實際上，包括人際關係、社會福利、民主結社、教育及個人成長……的範圍，在不久前還不視為市場的一部分，現在卻被勒令遵從投資市場邏輯運作。「社會資本」理論實際上已成

為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一環。

不過，作者也指出布迪厄與其他「社會資本」理論的不同。作者說儘管的布迪厄也帶有將行動者個人化及理性化的傾向，但其「社會資本」仍帶有批判性。布迪厄將「資本」分為：「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及「文化資本」。當中「社會資本」指社會連結的能力，而「文化資本」指教育、文化的獲得。布迪厄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社會資本」及「文化資本」有時可演化成「經濟資本」，但歸根究底，「經濟資本」扮演著主導角色。而「社會資本」，布迪厄認為它扮演著權力、階級、地位的再生產角色。這些，普特南大都避而不談。

#### 四、商品化的「第三部門」

甘珍妮：〈扭轉商品化：非牟利經濟可以嗎？〉，原文見Michele Cangiani,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reversing the process of commodification: the scope of the 'non-profit economy'," in Eric Shragge, Jean-Marc Fontan eds., *Soci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debates and perspectives*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2000), pp.36-53.

該文甚長，這裏只引述作者結尾的觀點。「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作者指的是由非牟利團體構成的經濟部門。作者明言支持「第三部門」的建立，但同時卻提醒讀者，應區分兩種「第三部門」。作者問，為何政府及商界支持建立「第三部門」呢？因假定「第三部門」可幫政府慳錢、「第三部門」可提供更廉價的服務、人工更低。於是政府便可減少支出，也可降低商界的稅項。這些做法與新自由主義的提法完全契合。作者指，七十年代歐洲知識分子(如高茲)提出「第三部門」時，用意並不如此，而是希望建立一種替代(或平衡)資本主義的、以使用價值為本的、重建人際關係的社區經濟。

作者認為，在資本主義現行格局下，實踐另類經濟並不容易，而且也不能單靠「第三部門」便可改變資本主義。但諷刺的是，當下全球資本主義劇激競爭，資本家卻反過來借橋，建立名為非牟利經濟，實為私營化的「第三部門」。

「第三部門」在歐美不斷擴展，已佔美國勞動人口的8.7%，當中社會服務佔

最大比例。但結果如何呢？不少「私營化」了的非牟利組織，服務側重有財力的受眾，而將窮人摒棄門外，或使之接受次等服務。非牟利組織越來越仰仗於大財團，將市場原則引入社會服務，率先將工人合約化、零散化。作者說，歐洲教會便常扮演這種「先鋒」角色。

香港又如何呢？在經歷金融危機後，政府全面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2002年財政司梁錦松首次收窄〈基本法〉詮釋，把公共開支佔經濟的比重規定在百分之二十或以下。我們集中社會福利方面。同年，政府對社會服務機構實行「一筆過撥款計劃」；次年，推出新的「人口政策」，剝奪居港未滿七年人士享用社會福利的權利。之後，「社會資本」，「第三部門」，及近乎「工作導向福利」的政策陸續出籠。2004年，「社會資本」，「第三部門」出現在董建華的施政報告裏；一年後扶貧委員會成立，呼籲引入商界及「社會企業」扶貧；而早在2001年推行，近似「工作導向福利」的「欣葵計劃」(鼓勵單親綜援人士就業)，到2006年演變為「欣曉計劃」，強制全面推行。

題外話。當「第三部門」紛紛在「一筆過撥款計劃」下主動或被迫轉型為社會「企業」，並引用市場原則四周擴展的時候，這些受政府垂青的「社會企業」，與奉行非市場原則的民間互助自主經濟又構成甚麼關係。舉個例子，在工業轉型下，大量中年婦女失業。近年，民間紛紛以合作社形式鼓勵她們創業。合作社並不是一般小生意，而是奉行民主、公平，開放的原則運作。在這點上，更像甘珍妮提到的是一種替代(或平衡)資本主義的經濟形式。譬如說，我所知的一所在大學開設的婦女合作社，註冊股本只有兩萬，社員每月報酬不過三、四千元，五年之間，已向其它基層團體及受災人士捐款過萬元。合作社不特由社員民主管理，更重視學習及社會參與，社員經常參與基層的探訪、出席各種推廣及支援其它合作社的活動，並經參與社會行動(如國際合作社日、五一勞動節，及七一遊行等)。但今天，當她們向學校申請續約時，卻面臨有規模的「社會企業」來投標的威脅。

儘管同樣以弱勢社群為對象，這些「社會企業」絕不挑戰及質疑市場邏輯。它們的目的，在提供培訓，協助就業。我們應批評來「競爭」的「社會企業」嗎？當然不應該。但感到無奈。也許，應譴責的是「一筆過撥款計劃」，它收窄了社會服務團體的生存空間，迫使它們引入市場原則，互相競逐。從這個角度看，甘珍妮提出的兩種「第三部門」的看法，便發人心省。

## 五、凱撒歸凱撒；家庭(壓迫)及市場(壓迫)歸女性？

菲莉斯：〈市場帶來自由？烏克蘭的女性、非政府組織及社會企業〉，原文見Sarah D Phillips, "Will the Market Set Them Free? Women, NGOs, and Social Enterprise in Ukraine," Human Organization .64, Iss. 3 (2005), pp. 251-265.

有關民間組織(文章稱為NGO,即非政府組織)與「社會企業」的矛盾,菲莉斯提供了另一個例子,她說的是共產主義倒台後的烏克蘭。菲莉斯是個人類學家,她到烏克蘭本是研究徹爾諾貝爾核電廠大爆炸對人民健康的影響及政府的補救方案。由於接觸了許多民間NGO,尤其是女性的NGO領袖。結果,菲莉斯將研究集中在「社會企業」對女性影響的議題上。菲莉斯說,從某個角度看,「社會企業」在烏克蘭不是新生事物(當然,當時沒有這種稱呼,當時的名稱是「合作社」)。在共產主義時代,幾乎所有國營企業都提供社會服務,照顧弱勢社群(如設立託兒所、老人院、診所、社區設施、聘用殘障人士等)。但共產主義倒台後的「社會企業」則是另一回事。它們大部分是由西方基金資助NGO成立的。

菲莉斯說,西方「社會企業」基金提供的服務包括:提供資金及技術培訓「社會企業家」;幫助非牟利組織發展生意;鼓勵商業機構將生意與社會服務結合(如多聘用殘障人士)。這些基金非常熱衷資助東歐的NGO發展「社會企業」,是因為它們將「公民社會」視為「後共產主義社會」能否發展的關鍵,而「公民社會」是否有活力則端乎西方式的市場經濟能否建立。「社會企業」正是將「公民社會」與市場經濟融合的產物。

這又與婦女有甚麼關係呢?菲莉斯說,在共產主義時代,女性有較高位置,舉例說當時中央蘇維埃的代表有三分一是女性,地方議會中女性佔一半。但現在烏克蘭國會中,女性只佔5.3%。不過,菲莉斯發現,現在由西方基金資助的烏克蘭「社會企業」,大部分以女性為對象。那「社會企業」會否為烏克蘭女性帶來出路呢?

菲莉斯的結論是:不樂觀。首先,西方基金的意識形態是新自由主義,它們資助烏克蘭的「社會企業」是期望它取代政府在社會服務中的角色。所以西方基金一方面資助NGO,同時則鼓吹「小政府、大市場」的意識形態。而烏克蘭

人深知,現政府大副度削減社會福利,讓路市場經濟,正是貧苦大眾受苦的原因。因此,許多人都懷疑「社會企業」另有目的。

第二是,西方基金盲目相信市場,它們對受資助的「社會企業」提出苛刻要求,要求它們在一段短時間內自給自足,能在市場上生存,稱為「持續性發展」。結果,只有具備市場條件的NGO才得到西方基金的垂青。菲莉斯說了一個例子,一個西方基金邀請烏克蘭的NGO申請,結果所有申請都「不合格」,因基金的人認為申請者都欠缺「商業技巧」。結果基金先邀請其中45人接受「商業培訓」,再淘汰其中40人,最後只餘5個申請者獲得資者。菲莉斯說,那些弱勢的NGO,通常都不獲基金資助。菲莉斯說,這與「社會企業」的理念是一致的,因「社會企業」的理念來自商業意識形態,強調個人的競爭力、領導能力、運用自己的資本汰弱留強。也許「社會企業」與商業邏輯的分別是,它在前者的基礎上加上「社會良心」。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社會企業」否定烏克蘭人民過去的信念。在共產主義時代,人民認為政府向人民提供社會照顧是一種責任。但「社會企業」宣揚的是一套西方式的市場個人主義,它否定人民的權利,指之為「懶惰」、「不夠進取」。事實上,「社會企業」並無法取代政府原有的社會服務,尤其對那些無法參與市場遊戲的弱勢群體尤其如此。

菲莉斯說:「社會企業」給少數女性提供出路又如何?大部分的婦女跌到底層,並被摒除出公共事務。我們是否可這樣說:如果聖經說天主歸天主,凱撒歸凱撒;則今天新自由主義金句可能是:政治歸男性,家庭(壓迫)及市場(壓迫)則歸女性?

## Hong Kong Women's Cooperative as Alternative Economic Practice

33rd World Congress of Schools of Social Work on "Growth and Inequality" at Santiago, Chile on 28-31/8/2006

Chan Fung Yi, Pauline  
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al Science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sfychan@polyu.edu.hk)

### Introduction

During the post-colonial era of Hong Kong from the late 90s and when poverty and unemployment had a heavy impact on workers' livelihood, the local civil society has been actively searching for new strategies to respond to their economic hardship. Combining the intellectual resources to articulate the significance of 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academics and the commitment and organizing technologies of the local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different initiatives have been experimented with to develop participatory community practices to assist local people. The Hong Kong Women Workers Association, with a history of 15 years starting in 1989, is one among several activist agencies organising a women's cooperative comprising 10 members to run a tuck-shop at the campu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questions explored in this paper include the extent to which such a practice helps alleviate, or redefine, the problem of women's poverty? As well, what are the subjective experiences of the women workers and how do they interpret the meaning of cooperative work?

Habermas' no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originated in the salons and coffee houses of Paris and London, as centres of rational discussion of public issues, evolving a culture bringing individuals together in a public order. The tuck-shop, in contrast, is a space for the women to re-value their labour whilst also offering a bridge to connect students and the women with a grassroots agenda.

"It's a miracle!" exclaimed one woman when she recalled the setting up

of the cooperative five years ago and,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is 'miracle', I engage in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about the meaning of cooperative work as a form of emancipatory practice for women situated at the margins of our society. First, I outline the scenario of a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locate economic practices in a context where cultural changes are having a dynamic impact upon the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associated with women as a 'gendered' group. I identify an identity crisis for Hong Kong women workers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further aggravated by developments in a knowledge-based society. By drawing on theoretical concepts from discussions about work ethics, habitus, power discourse and through questioning the artificial culture-economy separation, the *culture of production* will be examined by reference to the women cooperative's practice experience. Interviews with the organizer Lin and with two members, Sum and On, provide some empirical data to illuminate the significance of such an attempt.

### Bringing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to the economic

Stuart Hall has brought to light the natur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ich is dramatically occurring at global and micro levels; "In particular, the means of producing, circulating and exchanging culture have been dramatically expanded through the new media technologies and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1] Equally, as du Gay (1994) asserts, ".....the new electronic media.....also deepen this global interconnectedness by annihilating the distance between people and places, throwing them into intense and immediate contact with one another in a perpetual 'present', .....they are no longer situated contextually in time and space." [2] Here the issue arises, as to how the *sense of self* as embedd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social' is being redefined and challenged

[1] Hall, Stuart (1997) "The Centrality of Culture: Not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s of Our Time" in Thompson, Kenneth (ed.) *Media and Cultural Regulation*, London / Thousand Oaks/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pp.209.

[2] Ibid, p.210

by the 'time-space compression' (Harvey 1999)? Can the 'virtual' human connection still carry the essential element of *trust*, which is supposedly to be bred' in local community living, among members?

The site of ongoing control and struggles of resistance also resides 'inside out' of everyone; Hall has depicted a 'final frontier,' conveying the image of a retrieval to the core, to the basic root of identity and subjectivity formation, in the midst of rapid dynamic changes, globally and in everyday life. The growing sense of difference among people from diverse cultural tradi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hybrid alternatives are results of more frequent cross-overs and they tell us that these are the resources for a re-newed identity which is, however, also constrained by old barriers. It thus requires a process, a *process of social connection* to bring people-of-difference in dialogue and in action together, especially when the awakening mind of the individual is called upon to reformulate one's attitudes, habits and imaginations.

What kind of *identity formation in the economic domain* can serve as an anchoring place for hybrid persons to redefine themselves in the ongoing flux of uncertainties? 'Economy' in our current reading, is monopolized by several associations inherent in capitalism and to do with the maximization of profit, with modern rational beings instrumentally calculating the pursuit of their individual best interests and protect their respective private property. The distinct separation between economy and morality implies that the common search for the good society and for a social order based on mutuality is excluded from the economic arena. The Darwinian ideology of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once again seemingly confirms the harsh reality that the 'economy' is a non-moral field, especially in the absence of social obligations for one and other. The dominant language within the relational field is that of the 'competitor', the technologies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of economics, accountancy, statistics, logistics and management, all providing an increasingly complex set of conceptual and operational tools to strengthen the individual agent's power to intervene in the market and in corporations for profit accumulation. Economic activities are represented through charts, statistics, investment reports, the image of 'exceptional performance' and the incomprehensible logic of speculation in the stock markets, financial jargon and assumed predictability of economic realities and future processes. All this seems to confirm that the economy is a world of myths and secrets, powerfully manipulated by a face-masked giant with an 'invisible hand',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the other players to have a better

guess of the rules of the 'game' than the giant himself.

With a shift in our epistemological perception towards a cultural paradigm, however, social realities can be reinterpreted by paying attention to " *the different classificatory systems and discursive formations* ", the " *taken for granted assumptions* about the fixed or given 'nature' and 'essence' of things are immediately open to question, in any final or absolute sense. " (du Gay, 1994) [3] The separation of culture and economy is then subject to new scrutiny and open to further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with social analysis in the 'cultural turn' giving " language a privileged posi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circulation of meaning. " Studying language, its structure, its shifting and re-structuring process and the particular situated contexts are all so important, as the sites of the interplay of different discursive powers all converge into a set of dynamically interacting 'pools' of knowledge, " *the product of a more complex genealogy.* " [4] " *Economy* " as a single entity, homogeneous and necessarily capitalist in nature, is then being challenged. When adopting a non-essentialist position, the material/physical and the cultural or symbolic factors become mutually constitutive instead of separated. There is a new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understanding that economic exchange *actually involves the process of meaning making in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

Feminist challenges to the discourses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have illuminated a more radical pathway to create alterna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practices, where a critical vision to re-examine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hegemony of capitalism can emerge from. " *Representations of capitalism are a potent constituent of the anti-capitalist imagination, providing images of what is to be resisted and changed as well as intimations of the strategies, techniques, and possibilities of changing it.* " Gibson-Graham proposes to " *inhabit a heterogeneous and open-ended economic space whose identity was not fixed or singular,* " where the hope is to envision more " *non-capitalist economic practices,* " " *a new anti-capitalist politics* " and " *a non-capitalist politics of class* " . " *Perhaps the totality of the economic could be seen as a site of multiple forms of economy whose relations to each other are only ever partially fixed*

[3] Ibid, p.221

[4] Ibid, p.224

*and always under subversion.” [5] “To envision the economy as an over-determined social location, no more susceptible to logical or active mastery than is the world in its contradictory fullness, proliferative rather than reductive of forms, profoundly unstable yet immovable from the fulcrum of economic intervention, is to forego the ecstasy of rationalism and the arrogant security of determinate effects. Yet it is also to give up the organic totality and its linear path of evolution and to see beyond reproducing capitalism with a human face” .*  
[6]

## Historical context o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Hong Kong women workers' identity crisis

The women's cooperative represents a collective local economic set of practices experienced within a 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text. The aim of the project is to provide new options for thos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to work together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and mutual respect, with the aim to create self-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through which to make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ir labours and to achieve social recognition. It is a source of local resistance aimed at reclaiming their 'space' in the society.

The role of women workers has traditionally represented a blank in the big contours of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s economic prosperity. A more popularly accepted 'truth' is the miracle achieved by laissez-faire colonialism, produced by the joining hands of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industrialists to create a best-fit option of an Asian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workers have, however,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export-processing light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since the 60s. The often youthful and docile female labour force, however, is missing from the development discourses about the

[5] Gibson-Graham, J.K. (1996) " Strategies " in *The End of Capitalism (As We Knew It)..... A Feminist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p.12.

[6] *Ibid*,p.119

legendary success of the Four Asian Dragons. Past colonial government has not taken responsibility for these workers and has not provided them with the material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to overcome the negative results of the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in the late 80s. Industries that were formerly nationalized have been de-regulated, require vast amounts of cheap labour and— hence - the production lines are shifted to other developing sub-regions in Asia, making Hong Kong women workers victims of the changing labour market, exposing them to the great frustrations of trying to survive the industrial changes and to the process of the casualization of labour. Work conditions are increasingly, then, characterized by low wages, poor working conditions, job insecurity and lacking legal protection. [7]

Sum, one of my interviewees, recalled that the labour market was gloomy during the late 90s, that age discrimination was so serious that it drove her to search for other options. It became a pathway of downward social and economic mobility, leading eventually towards unemployment, underemployment and casualization. The fast expansion of the service sector since the mid-80s does not offer satisfactory working conditions and benefits to absorb the former manufacture workers. They lag behind in the so-called digital divide; they have no special skills, age discrimination is evident, married women can only find part-time jobs with flexible hours and low wages,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are always perceived as a barrier for them to commit to their workplace.

From the position of a self-reliant worker in the electronic industry, Sum withdrew from the labour market to be a housewife and to take care of her small children. On, on the other hand, has been a garment factory worker before and after the industry turned gloomy; she took various part-time jobs that provide her with the flexibility to do domestic caring work. The workplace no longer offered the sense of certainty for both of them and the identity of a "woman worker" was fragile without adequate material, relational and symbolic resources. They cannot earn good income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shift work are not close, low-skilled/unskilled labour represents the negative label of a 'loser' in

[7] Sister Helene O'Sullivan, M.M. (ed.) (1995) *Silk and Steel: Asian Women Workers Confront Challenges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 Research Papers and Consultation Recommendations on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on Women Workers in Asia*, Hong Kong: The Committee for Asian Women, pp.17-105.

the present discourse of promoting 'achievers' aiming at 'excellence' in a knowledge-based society. Finally, the post-97 social tensions and associated anxieties in Hong Kong have also diverted frustration towards those thought of as 'undeserving poor'.

## Work ethic and discourse of self-reliance

Sum—with a big smile and assertively - remarks that "we are still the persons of 'use' who can contribute to society." She talks about the enriching experience of communicating, sharing things with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providing them with good food and warm hospitality;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Association which organizes visits to the cleaning workers and to other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doing similar cooperative work; building up better knowledge about and understanding of society and, sometimes, acting upon the issues of poverty and workers' right by joining advocacy campaigns. She is positively portraying an active citizen, a conscientious member of the working class and a caring worker, ready to serve the community.

In conversation, she starts to talk about the current issue of the tragic death of two school teachers, who had been exposed to too much pressure while having to take up additional job-related tasks during the period of educational reform in Hong Kong. "Actually, if there would be more cooperatives in Hong Kong for people at the grassroots, more of us could more properly accommodate both work and family caring duties. We could provide a good education to the children, without the need to solely rely on the teachers to do all the jobs, I feel so sorry for the teachers' misfortune; the higher-up officials are not leading properly....."

She realizes the importance of her role in cooperative work, i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even in 'informal' family education. As it is, the focus of the Hong Kong-wide school reform is increasingly put on institutional regulatory aspects, like setting up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structures to manage resources and procedures, accreditation system to set standards for qualifications and professional performance of the teachers. The cooperative's partnership with the *Grassroots Concern Group* at the university in organizing workshops and campaigns has given her new experiences and raised her awareness that women workers - even with low education (institutionally) - do not lag behind

and, when given opportunities for new exposure and active learning, they can and do produce knowledge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

She tells me that she sees herself also as a 'qualified' teacher, 'consuming' the social knowledge which is produced in the cooperative and that can be re-produced to help in the growing up of her own and other children. Cooperative members are both consumers and producers in circulating the meaning of social commitment and of societal knowledge.

The significance of her self-evaluation can be better articulated in a more developed conceptual discussion of *regulation and subject position*. Economic regulation theory proposes that the maintenance of a regime of capitalist accumulation requires a set of cultural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welfare system, schools and media, to manage the aggregate demand to maintain the economic order. At the same time, moral regulations also legitimize certain forms of identity, practice and association as 'natural' or 'inevitable'. The state is identified as the central regulating mechanism, attempting to exert a 'civilizing influence' over the lower classes and constructing legitimacy and normalcy, historically and socially specific forms of behaviour as universal. [8]

As in the case of Sum, to work hard and to earn material rewards for her labour is a basic rule for an industrial worker, that she learns in her everyday working life practice. In an industrial society, the 'working class' will evoke the recognition of certain groups of people having a proper role to play in society, making contributions and being rewarded accordingly. But in the post-industrial period, the conception of *labour* and the meaning of the *work ethic* have equally changed.

Bauman points out that the emergence of the debate about the work ethic is set against a backdrop whe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s measured by the replacement and elimination of labor" and the "stream-lined, downsized, capital- and knowledge-intensive industry casts labour as a constraint on the rise of productivity". Under the 'cover-up' of enthusiasm for and about a "healthy

[8] Thomson, Kenneth (1997) "Regulation, De-regulation and Re-regulation" in Thomson, Kenneth (ed.) *Media and Cultural Regulation*, London/Thousand Oaks/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pp.15-18.





sustained. She recalled that as a sewing lady in a garment factory, she coped well with the divisional work operation. There was no need to have much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workers and each is independently responsible for certain specific tasks. But now, she has had to learn to make decisions together, spending hours to state the reasons behind each choice of arrangement, to argue, convince and judge to make changes in contingent situations, e.g. in purchasing goods, stock-keeping, decoration, supply of food, making up a duty roster. On shares that she is not used to speaking up so much, as she believes that the mor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I can handle it myself well, that's good enough; I was not aware of the need to explain my situation so much. For example, sometimes when I am emotionally aroused in my family, regarding my emotional stir up, the organizer and other cooperative members tell me to talk about what happens in the family so that people better understand you, gradually I learn to disclose more .....*"

The challenge of close collaboration, more expressive communicative attitudes, the removal of the strict boundaries of work and family in workplace conversations, the mentality of being the boss and the worker at the same time, these are the new experiences that On treasures. *"It's good that I can work with good people, willing to share and having concern for others."* Regarding work behaviour, they do not just apply what has been previously instructed, but they have full commitment to the task, have a sense of intimacy between their selves and their work. *"We do everything directly, shopping around to find the shelf where goods are displayed, visiting the food production industry to check the hygiene of food making and tasting the food to assess its quality, visiting the organic farms in Hong Kong and China to see how the vegetables are planted in the fields before deciding to provide new services of bulk purchased organically grown vegetables."*

One's work habits are cultivated in a highly divisive manufacturing structure to maximize the efficient production of bulk garment work. The workers were isolated at the assembly line, automatically and mechanically in a work order of high stability. Cooperative work requires a high degree of inter-relatedness, a new set of social and managerial skills,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to achieve trust and autonomy. The concept of *"habitus"* as espoused by Bourdieu has helped me to illuminate this production. As an advocate of *"reflexive"* social science, Bourdieu has attempted to overcome the theoretical oppositions of

subjective/objective, culture/society and structure/action. His insightful discussion of the central concept of *habitus, capital and field* can help to further explain how structural constraints are embodied in women workers' cognitive, affective and behavioural constitutions and how—in the context of cooperative work—changes are brought to their practices, implying their conscious resistance to change in a new relational context. With its orientation towards *"structuring structures"* and *"structured structures"*, *"habitus"* is intersubjectively constituted in the person-in-action whilst also being a system of *dispositions*.

*"Bourdieu treats social life as a mutually constituting interaction of structures, dispositions, and actions whereby social structures and embodied (therefore situated) knowledge of those structures produce enduring orientations to action which, in turn, are constitutive of social structures."* [12] Domination is examined in everyday practice and resistance to domination is made possible and re-inserted in the daily structured routines in new sites of relational interaction.

### Calling, identity and social inequality

In Weber's discussion of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a disciplined work ethic calls for no waste of time, which is worthy of *"absolute moral condemnation"*, for every hour lost implies the *"lost to labour for the glory of God"*. Through the concept of *"calling"*, Protestantism has provided a moral basis for a *"this-worldly asceticism"*, which is internalized as labourers' self-discipline. It is the development of *"a rational bourgeois economic life"*, which works hard to accumulate wealth but restricts consumption to pursue a righteous life. [13]

'Calling', in Sum's sense, is the mission of the cooperative, the secular virtue of her labour to contribute to social well-being, the care for other members of the same grassroots strata. Her identity as a member of the grassroots is

[12] . *ibid.*, p.4

[13] Weber, Max (1992/1930) *"Asceticism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in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155-183.

affirmed in a tone of peace and mercifulness, she is enthusiastic to help and support the other needy. Class identity is both structurally defined, according to the material base and normative criteria identified in the specific local context. However, as articulated by her, it is in the process of running activities of the tuck-shop and having them elevated to a new social horizon, that she has subjectively developed a deeper sense of belonging to her class position. Her mentioning the friendly visits to cleaning workers is such a touching moment as is her subsequent reflections on the existence of suffering people living at the grassroots she has been unaware of for quite some time. From a materially and socially deprived class position, returning to that collective identity is a result of her own resistance to misrecognition and a wider concern of those connected 'others' in mistreated situations. There is also "a logic of connected meaning", the "routes" of talking about multiple identities when we are always telling ourselves what we were then, as compared to where we are now. The unfolding sense of the self is to trace the "routes", the different points by which we have come to the present moment, one is always making sense of the "sum of those differences" [14]

She seems to shed tears in her heart when she empathetically talks about the hard labours of the cleaning workers and their exploitation by the employers who are cutting their wages. Her new habitus of sharing a smile and saying hello to the cleaners in her place of residence is a social practice based on her class identification demanding her to act accordingly. She gives recognition to their labour in her everyday life routine, the bodily gestures carry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a ritual of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ooperative member, working in the tuck-shop and the cleaning worker in the estates' corridor. Reading a discourse of class exploitation, supporting the cleaners' organised activities and witnessing their "successful" push for the minimum wage through the politics of their collective movement, these elements are closely interwoven with her own experiential attempts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class struggle to change the reality of poverty in her workplace. Past origins and her recent participation in the 'heroic deeds' for social justice are mobilized to create a desire for the unity

[14] "A Conversation with Stuart Hall" (1999) (excerpts from a faculty seminar on April 15, 1999)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http://www.umich.edu/~iinet/journal/vol7no1/Hall.htm>

of a community in which she has a part. Here is an example of a re-generated class subject position coming to life, of a producer in the collective form of 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when the dialectic of structural constraints and activities of human agency is forcefully at work, opening up new possibilities of not being subjugated under a totalising domination. The cooperative donates \$4,500 monthly to other NGOs, contributes one-tenth of their profit to vulnerable communities annually, not to mention their occasional mobilization to collect funds for the needy, e.g. for victims hit by the Tsunami.

The culture of production is also creating a 'dreamwork' -type discourse; there is an aesthetic sense of appreciation of their product and their project, "It's a miracle!", "It's a blessing, the tuck-shop, the students, a place in the university.....", "It gives huge pleasure to me". For Foucault, power discourse is not just oppressive in nature; it can be resistant and counteracting to mainstream ideology. Power circulates, but does not "function in the form of a chain", "it traverses and produces things, it induces pleasure, forms of knowledge, produces discourse." He shifts our attention from the grand strategies towards the many, localized circuits, tactics, mechanisms and effects through which power circulates, the 'meticulous rituals' or 'micro-physics' of power. [15] Cooperatives, as organizational forms of practice, adopt a similar rhetoric of "self-reliance," that targets those struggling for survival during economic upheaval. But the other meaning of a cooperative as a "business" is to obtain ownership, autonomy, dignity and hope, together with a certain promise of material gain, which does represent a 'fantasy' to those disadvantaged women.

## We are the boss-workers, we are Different from the "outside"!

Du gay's observations of British consumer society as he researched the

[15] Hall, Stuart (1997) "The Work of Representation" in Hall, Stuart (ed.)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 Thousand Oaks/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p. 50.

practice of retailing offers strong reference points for a similar reading in the context of Hong Kong. Following Habermas, he claims that retailing has 'colonized the everyday' through a process of increasing 'market dependency'. He tries to explore the constitutive role of retailing in the 'dislocation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relations.' His study explains the important effect of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to produce not only the services but also the *seductive effect* of consumption. The retail sector continues to grow and its importance derives from the "symbolic expertise of marketing, design and advertising, underpinned by knowledges and techniques of subjectivity." They 'make up' the consumer, who is constituted as "an autonomous, responsible, self-regulating and self-actualizing individual actor", an "enterprising subject". The development is placed in the discourse of 'lifestyling', when commodities and services are transmuted into "desires and fantasies" and vice-versa. "Retail engineering" is a strategy to survive the battle for better market share and as "a struggle for the imagination of the consumer". They deliberately design a 'social map of desire' that identifies what people would like to be, to win over the target consumer group. [16]

In the highly competitive market, the search for labour flexibility has grown into "the dissolution of 'long-term employment relations' and the growth in its place of part-time and temporary labour contracts. Employment policies are driven to 'low trust' direction and surveillance of flexible, easily substitutable salesfloor labour." Employees' commitment and work effectiveness is no longer the concern, but the 'loyalty' between customers and their own particular retail 'offerings' are what really matters. The attitudinal shift towards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labour force has directed economic activities more towards consumption of the symbolic sign value of products and adopted the strategy of reducing labour cost to employ de-skilled labour. The active role of workers is increasingly ambiguous and insignificant.

The cooperative members well understand the un-favourable situation of being part of the low-skilled and unskilled labor market. They treasure the rare

[16] Du Gay, Paul (1996) "Retailing and the De-differentiation of Economy and Culture" in *Consumption and Identity at Work*, London / Thousand Oaks /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p.97-118.

opportunities to create their 'business' with a flexible timetable to match their personal needs and family obligations. "All of us are the Boss!" Doing their tasks and making decisions together reminds themselves of the intrinsic value of their labour: "We are different!" They have their own way of doing 'business', unlike the workers in the retail services, who merely listen to and obey the instructions of their employers.

## A cooperative, not a 7-eleven: production-consumption within a movement

My next questions derive from an imagined chain of co-operatives, from the issue of sustainability and the need to produce a powerful discourse of alterna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Do you want to have a second sister tuck-shop? Do you anticipate the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ves in term of locating in more sites, being bigger in structure, with more people joining to provide diversified self-designed/created services?" They make the remark that the tuck-shop is really 'popular' in the university and quite a number of people are attempting the cooperative approach, e.g. men in sam hong and working in renovations. "More NGOs are joining us and we are proud that we set the pioneer example to motivate more to join us." "It's a happy occasion to attend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other cooperative shop too." They are not too much concerned about expansion in scale, but exploring diversity of services for the students.

"Consumption does not arise from an objective need of the consumer.....rather, there is social production in a system of exchange, of a material of differences, a code of significations and invidious values." [17] The logic of consumption is a logic of sign value and production of differences. The food purchased at the tuck-shop is not just a matter of use value; rather it also presents as a symbol of a gift exchange between the 'caring aunties' and university 'children', offering

[17] Baudrillard, Jean (1981) *The Ideological Genesis of Needs* in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translated by Charles Levin, Telos Press, p.75.

a taste of a home-coming feast. The most popular item is the tea egg, which costs four dollars. The cooperative women select eggs of bigger sizes and of good quality, using special medical herbs and soaking them in the sauce for more than 10 hours. Eating at their tuckshop tells the difference,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insist on buying snack food in the tuck-shop, while similar items are also supplied in big supermarkets. The students make the choice to be a conscious consumer while buying and eating food; they are not only consuming the commodity itself, but it also carries the sign of virtue, of respect for labour, of relational trust and the 'flavour of human touch' (人情味).

The young consumers, members of the Student Union and of concerned groups will promote the shop via their information circulation system, e.g. students' publications and the mail network to promote the tuck-shop. The sign value can better be interpreted in an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which, with its own specific culture, supports their consumptive behaviour at the tuck-shop. In the "field" of an educational institute, the acting agents amongst students, academic and administrative staff carry with them the accumulation of a history in which the value of social obligations is more clearly articulated, given the inherited asset of cultural capital. When an alternative option was proposed to also be offered on campus, the students, the organizers of the Association and academic staff engaged in a discourse using the languag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serving the marginal communities", "against the monopoly of big corporations," to lobby in the bidding process. After that set of actions, the cooperative was successful in obtaining the tender to run the tuck-shop.

### Caring aunties and their children

The pioneering work of Janet Salaff (1981) depicted the image of the "working daughters of Hong Kong". These self-sacrificing ladies experienced truncated school education, participated in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sectors, and contributed to the family economic position. In a period o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their collective image has disappeared from the stage and their struggle for a decent living remains in the shadows, very often working on a more individualized basis rather than acting together as a force for community resistance.

Recently, the women cooperative organized a series of workshops to introduce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their tuckshop service, the wider vision of 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ir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offering visits to other alternative sites of cooperative work. It is a preparatory stage to present a stronger image of a group of caring ladies who have worked fully commitment and in partnership with university students.

Regarding the issue of representation, the members describe themselves as "caring aunties" and are also perceived as such on campus. They refer to a TV star, Ka Yin, who is conveying the popular image of a pleasant, open-minded and fashionable mother type, who is closely relating with the big children. The golden age of her movies was in the late-60s, when playing the role of a sweet little girl at a time during the industrialization period of Hong Kong. Now, mother Ka Yin re-appears on the TV screen, revealing her vigour and enthusiasm to attempt the peak experience again. After a long period of retreat from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she as a single mother went back from overseas and taking care of her children. Applying such an image suggests the tuck shop women's claim of their own 'Return!', redefining their competence and their contribution after a period of 'disappearance'.

This representation is understood within a family context, where there is the association of intimacy and love. They proudly cited the example of a student, who brought her parents to visit them after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and took pictures with them. The parents talked to them with words of appreciation and telling that their child had mentioned the food, the tuck-shop and the aunties often.

### The margin or the centre: rethinking the position of the cooperative experiment

The organizer claims that the success of the cooperative does not just rely on the enthusiasm of the members alone, however much a special asset this already represents. In the wider context of movements, the participation of students, women, other workers, unions and intellectuals is fundamental when

striving for reform. When saying that they are working at the margins, she insists that such a conception of 'marginality' is subject to re-examination. Yes, when the centre/margin binary is challenged, if the core is the locus of social movements gearing towards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and justice for members at the grassroots and for workers, the cooperative becomes a marker signifying its centripetal proximity to the centre, rather than being located at a detached margin.

"Cooperatives provide a new identity. It is not there to victimize the members, yet one is not totally independent and self-reliant; what is needed is a reform to have more policy support and that the environment can provide more incentives and resources to facilitate its work." How to spread the meaning of cooperative work in the wider society and to achieve a deeper sense of normative support, removing the barrier of legal regulations and creating more infrastructural support: the future challenges remain difficult and new possibilities are to be worked out. The cooperative has approached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versity to lobby for a new contract and the Alliance of Cooperatives has initiated a meeting with the Secretary for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They also suggested the setting-up of seeding funds for cooperatives and supported by government to the Chief Executive of Hong Kong during a conference. The cooperative experience tells us that the empowering activities have positively brought hope to the grassroots women workers. Moving beyond the split of culture/morality and economy, we will find more room to attain additional power to create and resist, despite the fact that problems and frustration will continue to occur and no-one promises that they will miraculously disappear in the near future.

**\* My research will be carried further to look into the various NGOs practising 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examine its implications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especially at the time of hot discussion/debate of "social enterprise" and "social capital" in our welfare sector to alleviate the poverty problems and activate community support networks.**

Thank for the Hong Kong Women Workers Association for their support to my interview project.

## The Economic Justices and Woman Workers----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and privatization on woman workers

chan po ying

### 1. The change of Economic Structure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From the mid 90's onwards, Hong Kong has transformed itself from a manufacturing centre to a global financial and sourcing hub.

With the widespread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promotion of trade liberalism with WTO's blessing,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s restructured in favor of the interests of footloos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TNCs). While more and more developing countries adopting the export-led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us accelerate the race-to-the-bottom movement, Hong Kong has positioned itself in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as a financial and sourcing hub. The transformation has the following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s. The first is an exodus of manufacturing activities to mainland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in pursue of the lowest-cost labor and resources. 43 % of the Hong Kong manufacturing and trade companies have reported to invest in factory facilities in China. About 53,000 factori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are either owned by Hong Kong capitalists or serving Hong Kong manufacturers by contract arrangement, and 5.59 million workers are involved [1]. The second is the growing magnitude of the service sector in terms of its share in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a rapid expansion of employment in the service sector, outstripping other sectors,

[1]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Industries (FHKI), 2004, "Made in PRD: the Changing Face of HK Manufacturers", Hong Kong.

and becoming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Hong Kong economy with the proportion of 90% of GDP. [2]

## 2. The Impact on Women Workers

The transformation to the global city serving the interests of TNCs makes the proliferation between rich and poor become more acute. The gap is expanded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and deteriorated to the worse. Gini Coefficient is 0.525 in 2001, the situation of economic inequality is worse than those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The phasing out of manufacturing sector made Hong Kong workers in general, and woman workers in particular become the hardest-hit groups. In 2002,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only accounted for 5.1% of total employment, a steep downward movement in contrast to 41% in 1980 [3]. The number of women employed has dropped from 424,000 in 1986 to 116,000 in 2001. [4]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fact that for those employees who remained, a large percentage

---

[2] Service sector is composed of the following components: retail and wholesale,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catering, transportation, communication, financial, real estate, commercial, social and personal services. In other word, except for primary, manufacturing and construction sectors, the rest is put under the category of service sector. After having become British colony, Hong Kong was functioned as China's enterpot. Service sector has had a long-lasting history and been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local economy. Even in the heyday of industrialization period during the 70's, manufacturing sector accounted for 31% of GDP while service sector was for 60%. In regard to the magnitude of labor force, the former was 47%, and the latter was 41% in 1970 (See HK Labor Department, "Hong Kong Labor and Employment" 1992, p.2). The magnitude of these two sectors is in reverse order since Hong Kong has been once again playing the role of an enterpot taking Mainland China as its hinterland from the 90's of the last century onward.

[3] Ibid., p.10. See also HK Labor Department, Hong Kong Labor and Employment p.2.

[4]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02, "Women and Men in Hong Kong Key Statistics", Hong Kong: HKSAR, p.48

of them were and still are clerical and non-production staff serving offshore production, thus, the blow on woman workers should be graver than what the above figure suggested.

Those displaced woman workers constitute a large percentage of the reserve labor for the service sector. The transformation to "knowledge-based economy" [5] led to the proliferation in the labor market. For those middle aged women who spent their prime time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found themselves being stigmatized as semi-skilled and low education level, and therefore, is incompatible to the requirement of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According to government figure, the lowest pay jobs are mainly on community, social and personal sector and wholesale and retail sector. Not surprisingly, these two sectors can be viewed as women sectors in the sense that a large number of the employees are women. 64.3% are in the latter, and 49.1% in the former. They also have the largest share (70.6%) in women employees. [6]

In fact, woman workers take up the majority of the working poor. Among the 405,000 workers who earn less than half of the median monthly earning, i.e. HK\$5,000 (US\$641), 74% are women. In other words, one out of seven employed women falls into the category of the working poor. Moreover, the largest wage discrepancy exists between the two sexes at the bottom of the employment hierarchy. The median monthly earning of female unskilled workers is just HK\$ 3,900 (US\$ 500) which is merely half of that of the male counterpart, being HK\$ 7,500 (US\$ 961). [7]

---

[5] Some mainstream economists argued that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are replacing capital and labor as the wealth-creating assets. It is contended tha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the increased mobility of information, wealth-creating work is transformed from physically based to "knowledge-based". The former is supposed on commodity production and the latter is on technology know-how where knowledge management is essential. See The Enterprise Development Website. [www.enterweb.org/know.htm](http://www.enterweb.org/know.htm)

[6]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02, "Women and Men in Hong Kong Key Statistics", p.48

[7] Ibid, p.61

Apart from low pay, jobs are difficult to find, especially for middle-aged women. Age discrimination is widespread in the service sector where a beautiful face and young looks are perceived as an asset in getting a job as a saleswoman or waitress. In contrast, middle aged women end up as cleaning workers and general workers in public housing estates, offices, restaurants, and fast-food chain shops, in other words, at the lower strata of the service sectors.

It is foreseeable that the employment prospect of woman workers would continue to be bleak. The more Hong Kong economy serves the interests of TNCs, the fewer jobs woman workers can obtain. According to the government projection on labour requirement, the growth of job demand in 2005 will mainly be in the upper segments of the labor hierarchy, specifically for trade or financial related sectors. [8]

### 3. The Privatization and the impact on woman workers

The ideology of neo-liberalism is prevailing in Hong Kong with the blessing of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for decades. The doctrine of *laissez-faire* was upheld as the non-intervention principle of the government to the market. After the return of sovereign to China in 1997, the new government follows suit. The non-intervention principle is further implemented under the policy of "keeping a minimal government but a large market". Privatization of public services in the form of outsourcing and corporatization are two main strategies to practice the doctrine of minimal government.

Public housing has a long history to outsource services to private company. Since 1987, the Housing Authority (HA) has contracted out cleaning services and security related services and confined to the role of management and

[8] 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2000, "1999-Based Manpower Requirement Projection by Occupation Category and Education Attainment within Economic Sector", Hong Kong: HKSAR, p.vi

monitor. The pace of privatization is further expanded in late 90's that the whole management is contract out to being in line with the downsizing of the government. As a result, the monitor role of HA is further undermined because a large number of frontline government officials withdraw from the Public Housing Estate (PHE). The monitor role leaves to private company which is profits-oriented. Therefore, the more widespread use of contract-out practices, the more deteriorated working condition is for cleaning worker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CCW put them in a vulnerable position subject to outright exploitation. According to our survey conducted in 1998, the component of SCCW is mainly middle-age women who have migrated to Hong Kong within seven years preceding the interview. Including those who have migrated to Hong Kong more than seven years, the percentage of SCCW with immigrant background go up to 90%. The rest of them are elder people having no alternative to look for other job, and a small amount is of local housewives.

The lack of knowledge of existing labor protection and social resources in Hong Kong make them an easy prey of unscrupulous employers. Moreover, as middle-aged women with children to take care of, they do not have so many choices at hand. It is clear that migrant, married SCCW not only need job to supplement the meager family income, but also need this particular cleaning job for its vicinity from home. As a result, they are in disadvantage position to bargain with the employers for fear of retaliation.

Because of their vulnerable position in labor market, SCCW suffer low wage which is far below the average standard of ordinary workers. The average monthly wage of cleaning workers is around HK\$5,000 (US\$641), but the average wage of SCCW is HK\$1,000 (US\$128) lower than the average. More worse, most of them are deprived of the statutory rest day and paid holiday day.

It is clear that SCCW is being exploited for their multiple identities as new immigrants workers as well as working mothers. Being new immigrant workers, they are unable to make use of the existing law and resources to safeguard their rights. Their plight is compounded by the fact that they are the principal child-carers that their choice on job seeking and thus the bargaining power is seriously hindered.



## 4. Policy Advocated to Address Problems faced by women Workers

From the picture depicted in the above section, we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women workers despite different nature of industries they are situated, common needs and demands could be drawn in facing similar setback from employment rights. As mentioned before, the number of casualized women workers will increase with the full-blow of privatization. It is clear that the reinstatement of employment rights for the women casualized workers should be put into agenda. Countermeasure should be set up to address the problems faced by most of the women workers

### 1) Protection of employment rights

- \* Remove "4.18" restriction which requires the fulfillment of 18 hours each week and continuously for 4 weeks as basic eligibility for labor protect. Introduce employment protection for workers in casualised employment such as part-time and temporary contract workers.
- \* Establish a minimum wage to ensure a reasonable wage for low-income groups.
- \* Set up a comprehensive insurance scheme which covers retirement benefits and unemployment benefits, and guarantees basic living expenses for the aged, and those person who are unable to make contributions, such as women workers with low income, unemployed and unpaid housewives so they could also enjoy some basic social protection.
- \* Increase the budget for social services. This could increase job opportunities on one hand while extending social services to relieve women of their heavy burden of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on the other.
- \* Stop sub-contracting public services to the private sector to put an end to the continued exploitation of labor.

### 2) Protection of equal opportunities in employment

- \* Legislate against age discrimination. Promote the elimination of ag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in employment.
- \* Implement the principle of equal pay for work of equal value to address the phenomenon of job segregation by gender and to ensure reasonable remuneration for women's labor.



## 「第三條道路」，向左轉，向右轉

撰文：崔老頭

### 一、前言

本文的源起本是討論歐美的「第三條道路」經驗，因一些朋友說，前線社工朋友對此感興趣，尤其與「第三條道路」相關的「公民社會」、「社會資本」、「第三部門」、「社會企業」都成了經濟學、社會學的當紅概念……但當我們細看香港的討論及文獻時，卻甚少發現「第三條道路」這個詞。如何解釋呢？

第一個可能是，在香港「非政治化」已成為一種時尚，論者不再理會「第三條道路」在歐美出現的政治語境，逕自移花接木，將「第三條道路」的「公民社會」、「社會資本」、「第三部門」、「社會企業」作技術化處理，嵌入自己關心的問題內。舉例說，以社會學家紀登斯(Antony Giddens)為例，儘管他揚言「第三條道路」是要超越傳統左右派政治，但仍將「第三條道路」定位為「現代化左派」立場，明確反對新自由主義，主張限制市場，實施資源再分配。現在，香港論者將「第三條道路」的左派傳統切去，「第三條道路」便淪為徹頭徹尾的新自由主義立場。

第二個可能是，將「公民社會」、「社會資本」、「第三部門」、「社會企業」視為「第三條道路」的資產其實是漂亮誤會。「第三條道路」運用這些概念建構自己，但新自由主義同樣將之據為己有。早在「第三條道路」運用這些概念前，新自由主義已在這些領域建立起闡釋權，使之成為戴卓爾推行新右政策的工具。因此，「公民社會」、「社會資本」、「第三部門」、「社會企業」朗朗上口，未必一定是「第三條道路」的同路人，有時甚至剛好相反。

因此，當有朋友說前線社工朋友對「第三條道路」感興趣時，還不知曉其具體情況。因此，我將文章的焦點改變一下，從討論歐美「第三條道路」經驗，轉向討論「公民社會」、「社會資本」、「第三部門」、「社會企業」等概念在香港的變種。

## 二、「第三條道路」、福利國家與全球化

在進入香港討論前，有需要釐清一些概念，尤其是「第三條道路」與福利國家及全球化的關係。紀登斯認為：「現代化左派」必需重建政府、市場、社會及個人的關係。他說政府可扮演更具影響的角色，但規模要縮少，將空間留給市場及公民社會運作。「第三條道路」贊成規管市場，維持政府資源再分配的角色，但紀登斯也認為，在全球激烈競爭下，跨國財團可撤資及轉移生產，因此民族國家必須與商界合作，提昇競爭力，才能生存下去。削工資、減福利、提升教育、協助商界……成為無可迴避的出路。

紀登斯主張改革歐洲的福利國家制度，認為政府不應再直接照顧有需要者，而是應鼓勵他們自立、自我增值，重投勞動市場(稱為「社會投資」)；否則要面臨扣減福利作懲罰(稱為「工作導向福利/workfare」)。「第三條道路」認為，傳統照顧周到的福利制度引起納稅人(中產階級)不滿，造成社會分裂，也加深人的隋性。政府因此應大規模退出社會服務，將責任交由非牟利組織(稱為「第三部門」)，以市場方式，或與商界合作來營運(稱為「社會企業」)。紀登斯指「第三部門」富有企業家精神，他並以「社會企業家」來形容這些部門的負責人。

在新的概念下，人人都是資本家，工人也是資本家。技能及知識成為工人投資的「資本」(甚至人際網絡亦被視為資本，稱為「社會資本」)。對貧窮的理解亦轉變，過去的看法是：貧窮源於制度不公平、源於剝削；今日的看法是：貧窮源於某些人缺乏「社會資本」。

要注意的是，並非所有支持「第三條道路」的人都支持上述看法。紀登斯便提過歐陸「第三條道路」的學者並不認同「福利國家」過時的說法。他引述一位芬蘭學者之言：從大多數北歐國家人民所熟悉並已經接受的福利國家觀念來看，英國根本不是一個福利國家。英國與美國一樣，有比任何已開發國家都高的貧富差距。(見紀登斯《第三條路及其批評》，p. 13-14。)

## 三、「非牟利自主經濟」的激進策略

「第三部門」、「公民社會」的概念可行嗎？一些評論者認為，「第三條道

「第三條道路」，向左轉，向右轉

路」並無創新之處，它只是整合了由新自由主義至社會民主主義的零碎概念，在溫和路線上（即不刺激既得利益者的情況下），爭取中產階級的支持。「第三條道路」摒棄了據稱是史大林極權路線的共產主義思維，而吸納了許多自70年代以降出現的「新左派」思想。譬如法國社會學家高茲（Andre Gorz）便常被提及。高茲之受重視，是因為他在七十年代便提出一套取代資本主義的「生態社會主義」策略，當中的「非牟利互助自主經濟」，近乎「第三條道路」的「第三部門」。

高茲主張建立廣泛「非牟利互助自主經濟」，平衡政府及市場經濟，其目標是建立以「使用價值」（而非「交換價值」）為本的社會主義經濟。高茲認為，目前市場的大規模異化生產仍具重要性，因它能夠為現代社會提供大量廉價物資，我們仍無法取締它。但當科技日益進步及勞動者不再追求過分物慾（以補償異化生活的空虛）後，大規模生產便失去主導經濟的作用。在這目標未達到前，則需工會運動去爭取勞動者的企業民主管理，及工資工時的規管。事實上，在現代化生產下，我們無需、也沒法安排所有人在市場上就業全職地工作。高茲提出的口號是：「縮短工時，人人就業」。這個主張，與「非牟利互助自主經濟」的建立有密切關係。

高茲認為，當工人得到基本工資及最高工時保障後，便樂意用工餘時間投入志願工作，無需再用商品以麻醉自己（因不會得到真正的滿足）。到時，大規模異化生產的商品再沒需求，便開始萎縮（不是消失）。高茲建議政府協助地區發展非牟利互助經濟網絡，這些經濟單位都是小型的、社區的，帶有志願服務性質的，以人而非以利潤為本的。高茲預言，「非牟利互助自主經濟」將在社會主義中成為主導的經濟及生活模式。

一些「第三條道路」的支持者認同高茲，認為大家是同路人。其實是南轅北轍。高茲反對以市場邏輯衡量人及社會，他甚至指經濟活動並不如主流經濟學所言是「純經濟」活動；他以醫生、教師、照顧者為例，指如果他們都唯利是圖，不特社會變得難以維持，一切經濟活動也無法進行。高茲因此反對以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角度衡量社會、物化社會（包括所謂的「經濟領域」）。但「第三條道路」又如何呢？只需看看：社會「投資」、社會「資本」、社會「企業」這些概念，便知市場邏輯已如何深入「第三條道路」的骨髓了。

## 四、恢復左翼的想像力

寫過《反資本主義宣言》的卡利尼克斯（Alex Callinicos）在《平等》一書做了一個比喻。他說：資本主義的既得利益者恐嚇：除非他們繼續獲得特殊報償，否則減少生產，到時窮人便遭殃。而綁架者則說：除非孩子的父母拿出贖金，否則他們的孩子將遭折磨。

卡利尼克斯說：今天我們就活在這種全球化的敲詐之中。一小群有錢人聯合起來，把資金從一個國家移到另一個國家，追求最大限度回報。他們能夠成功地要求公共政策調整至符合他們的需要。如果政府威脅他們利益，就會受到資金流失及投資下馬的懲罰。而敲詐之能夠得手，是因為過去20年我們的社會充斥著悲觀。在東歐、蘇聯社會主義垮臺後，已沒有多少人相信資本主義之外還有可能。紀登斯不是說過：「左派右派之分反映的是一個普遍相信資本主義可以被超越……這些條件在今天都已經不存在嗎？」（見《第三條路及其批評》，p. 33。）「第三條道路」正是在這種氛圍下出現。

「第三條道路」成為了那些不敢改變資本主義格局的左派分子忍辱負重/或偷生的權宜之計。公道地說，英國《新左評論》編輯安德森（Perry Anderson）批評「第三條道路」是披著左翼外衣的新自由主義；可能有點不公平。「第三條道路」並非不想重振左翼，只是，它沒有信心去碰觸那最基本的問題：資本主義。因而，「第三條道路」給我們的只是一種向市場霸權屈從的「選擇」。

卡利尼克斯說：要打破這種困局，我們必需重拾烏托邦（即追求更美好社會）的想像力，設想出一個高效率的、民主的、非市場的經濟合作體制來。（有關卡利尼克斯如何將公正、效率、民主，及可持續性視為反資本主義的最起碼要求，見《反資本主義宣言》第三章）。

香港，一個沒有多少左派，或沒有多少左派敢批評資本主義的地方，我們又怎樣打破困局呢？也許，現在我們還未能肯定地回答這問題，但期望這是一個持續討論的開始。

“蒙德拉貢實驗” (Mondragon Experiment)\*

## “蒙德拉貢實驗” (Mondragon Experiment)\*

亞蘇

作為勞工和擁有者，我們是自己經濟命途的主人

正當歐洲陷於喋喋不休的勞資談判及工業行動而無法脫身之際，蒙德拉貢備受世人注目。蒙德拉貢位於西班牙巴斯克地區，過去二十年，由一個平淡無奇的村莊，演變成西班牙最重要的工業重鎮。而蒙德拉貢亦是全世界工業合作社運動的最大基地。

巴斯克在歷史上曾經被西班牙帝國的主要民族統治，但是現今的二百萬巴斯克人都希望脫離西班牙政府統治並成為獨立國家。

在十九世紀時，由於巴斯克地區的人口增長，金屬手工業乘著本地化的開礦業和入口煤逐漸建立起來。使巴斯克成為西班牙經濟發展最顯著的地區之一。然而，1936年的災難摧毀了巴斯克人的成就。

1936年7月，內戰爆發。當時，西班牙成立了一個由民主派領導的政府，但一班由佛朗哥將軍領導的陸軍軍官策劃叛亂。巴斯克人很多是支持民主派政府的，因政府答應給他們成立自治區，並容許他們高揚代表巴斯克自治區的旗幟。因此佛朗哥將軍視巴斯克人為敵對勢力。面對強勁的大炮和軍隊，巴斯克人與敵軍苦戰3年。這是場絕望的爭戰。巴斯克自治政權最終被推翻了。34萬巴斯克人逃離居所，展開一段長年流亡在外的生涯，遺留一片廢墟，其中數以萬計的巴斯克人成為囚犯。

\* 本譯文部分取材自嶺南大學翻譯系98-99年度B. O. W. 科同學對Mondragon Experiment 一片的字幕翻譯，謹向各參予翻譯的同學致意。

“蒙德拉貢實驗” (Mondragon Experiment)\*

在囚犯中有一個叫阿里茲曼蒂的學生，出身農民家庭。1939年戰爭結束時，阿里茲曼蒂獲釋並返回維多利亞語言學院繼續神父課程。學院設在巴斯克，不單教授宗教，還教授巴斯克語及文化。阿里茲曼蒂關心經濟學和社會學，並將這些融合天主教的社會教條。亞里茲曼蒂既反駁亞當史密夫的放任資本主義理論，也反駁馬克思對革命和集體主義的描述。亞里茲曼蒂認為天主教教條既合乎社會主義，又保留了個人財產和自由。

1941年，當亞里茲曼蒂完成課程，成為神父，被派往蒙德拉貢。在1941年，蒙德拉貢幾乎是一遍蕭條。雖然到處都是教堂，但神父已被佛朗哥軍隊處決。不過最好的教堂仍獨自運作並繼續反對獨裁政治。當時“士華之華”金工協會是村莊主要的僱主，工廠有一所學校培養學徒。亞里茲曼蒂跑去執教。這所學校是蒙德拉貢唯一專上教育學校，亞里茲曼蒂想透過教育來改革工廠，他曾請求管理階級增加工人參予管理的權力，但遭拒絕。管理層認為，這會損害股東的利益。

1956年，5個畢業的工程師不滿工廠管理層的方法，離開工廠，合伙開創了自己的業務。在馬里茲曼蒂神父的支持下，這班年青人，得到約100名村民的借款開設工廠。最初，工廠只有24男及2女，生產由英國設計的石油加熱氣爐。其後，西班牙經濟復甦，他們便創立了自己的牌子法戈爾 (Fago)。

1957年，工人人數發展到100人。但下一步應怎麼辦？他們向阿里茲曼蒂求助。阿里茲曼蒂神父提意參考在19世紀推動工人合作社的羅拔奧雲的意念。

奧雲是一個工業家，他希望改革工業革命的弊病及創建新社會。他在自己的棉紗廠。推廣工業效率及工人福利，為童工建立學校。他相信透過教育，工人可管理自己及使合作社更繁盛。

亞里茲曼蒂神父建議蒙德拉貢採納合作社的架構，將工廠交由工人擁有。

以下是蒙德拉貢集團內一所合作工廠的組織架構。這裏每年召開一次常務會議，在會議中，根據每人一票的原則，選舉一個董事主席。每四年，董事局的成員會重選一次，半數的成員每兩年連任一次。董事局委任一位常務經理，他在會議中只是聆聽及建議，沒有投票權。這個董事局所關注的事包括合作社內一千名工人的福利。

## “蒙德拉貢實驗” (Mondragon Experiment)\*

他們在早上七時開會。會議結束後，他們又趕回工作單位繼續工作。會議中，他們討論合作社各項政策的事宜。常務經理接著負責執行各項決議。

每個部門選舉一名成員進入社員權益委員會。這個委員會與董事局一同制訂有關個人事務、規則、薪酬、工作環境及管理結構等事宜。

合作社內每個成員，入社時都需繳交入股金，這些股本在年終是會按合作社的利潤而分紅。另每個成員每月也有薪金，他們工作愈多，薪金亦愈多。但最高的薪金不會高于最低的3倍。而且，股息亦會固定于百分之六。

每年的利潤除部分作分紅外，百分之十會給予社區、學校及其他文化組織。百分之二十會存入合作社的儲備基金及再投資基金內。百分之七十會平均分給各個工人成員。

每個工人所得的花紅與他的薪金比例是相同的，但他們不可動用這些花紅，只可把它存入股份內以賺取利息。合作社跟其他私人企業一樣，都要面對籌集資金的困難，於是亞里茲曼蒂神父提出建立一所「合作銀行」的建議，當時反對的人很多，但銀行在1959年還是開設了。合作社只需付上相對正常利率的一半利息，便可向合作銀行借貸，因而有錢投資在合作社上，繼而生產更多工作崗位。今日，已有二十萬人存錢入這銀行。現在每個市鎮和村莊也有「合作銀行」的分行。銀行有九百名員工，功能是替工業合作社服務。他們稱它為第二級合作社，因整間銀行的架構都是從合作社的基本架構中改變來，例如銀行每個員工都在銀行裏持有股金按年分紅，相等於工業合作社的利潤。從銀行的一群主管就能反影它的合作社性質。十二位主管中只有四位由同業選舉出來；八位由工業合作社選出。合作銀行的另一個主要工作是替新成立的合作社策劃財政及業務發展方向，條件是合作社要遵從合作運動的原則及加入「合作銀行」。

以下是一個例子：三位「合作銀行」的財務專家派到新合作社裏工作，其中一位是臨時總經理，作為銀行的專家，他會為新的合作社工作2年。他首要工作是研究產品市場，今日他們要討論的是生產物料的供應。

當管理部門決定合作社的名稱後，建築家會設計廠房，亦會訂購機器和設計生產樓層的圖樣。新的合作社需要250名員工，這裏有充足的申請者。他們會被人事專員接見，跟著便要進行測驗。假如有需要的話，更要接受職業訓練。除了有關科技及生產外，還要在西班牙和海外地方進行市場研究。這個研究讓銀

行的領導員決定是否繼續支持該個合作社。如果銀行認為這間合作社不值得支持，合作社便要自己想辦法。但是銀行會答應繼續提供幫助，只是要合作社的每一個運作過程給銀行監管。

此外，由於西班牙政府認為合作社的員工是自聘的，不允許他們參與西班牙的勞工保險計劃。所以，自從1967年，蒙德拉貢便成立自己的社會保障合作社，這個合作社更擁有一隊小型醫療隊為員工提供醫療服務，亦會為個別員工進行定期檢查。蒙德拉貢更計劃建立合作社醫院，但由於專業人士、醫生拒絕接受低薪而寸步為艱。有見及此，蒙德拉貢建立起自己的工業學院，為合作社提供人才。工業學院擁有1,200學生，他們大部份是初中畢業。

在工業學院畢業後，他們會根據自己的才能，去選擇從事技工、技術人員或專業工程師等工作，一部份會在工業學院隔鄰的合作社大學繼續升學。在這裡，他們修讀工程學的大學課程，當中有很多學生最終都會在蒙德拉貢合作社工作。至於從事其他工作的，也可在這裡一嘗合作社生活的滋味。一時正，是位於學校裡的“聯合合作社”工廠的輪班交替時間。高年級的學生正在紀錄上班時間。他們上午上課，現在便利用下午的時間來工作。“聯合合作社”五百名員工，大都是學生。他們正在整理配件的電線，這些電線最終會賣給其他蒙德拉貢合作社。而其他人則造一些較先進的機器，作為電子學的教具。

這個合作社是由學生管理，他們來到這裡，均可得到工資。這使得學生在讀書的同時，可工作賺錢。

此外蒙德拉貢還動用了六百萬英鎊，興建了一所發展研究中心，它是一間擁有三十六位全職科學家的二級合作社，他們為工業合作社研究工程。根據外國經濟學家的研究，蒙德拉貢合作社工人的生產力，是西班牙最高的，甚至比最大、最有效率的資本主義私人公司更高。

在合作社內工人認為經理為他們提供著最好的利益，因為工人與經理同時在合作社里存在，工人沒覺得經理與他們之間有分別。即使在經濟衰退時，亦不會產生矛盾，因為工人被送回學校讀書。這班學生是烏歌爾的工人，他們的工廠暫時停工，他們正在上自動化的課程，當課程完結後，他們會重返工作崗位，或會在其他正在擴張合作社里找工作。現在蒙德拉貢已由一個鄉村，發展成一個擁有28,000人的城市。透過耗資龐大的房屋計劃，蒙德拉貢現在已經能夠以不太高的成本提供好的房屋。直到目前為止，他們透過銀行的幫助已建了14個

“蒙德拉貢實驗” (Mondragon Experiment)\*

婦女與經濟自主

屋苑(村)，全是由合作社管辦。其中一幢樓宇的下層是一間超級市場，它是一個零售業合作社分店，名字叫艾羅斯奇。艾羅斯奇是一個擁有650個工人的二級合作社。利潤除分給工人外，其餘的便分到顧客身上和用來減低價格。艾羅斯奇發展迅速，它有十萬個家庭顧客會員，佔了巴斯克人口八分之一。

另外一幢房屋的地下是一間照顧2歲至6歲兒童的托兒所，它是一間合作社學校的分支。這裏兒童唱的是巴斯克歌。內戰之後，這語言曾被禁止，為了保存這語言，大家只有組織秘密學校。其中一間在蒙德拉貢由阿里茲曼蒂神父領導。在西班牙恢復民主後，這些巴斯克學校不再是秘密。這些學校中，有927間成為合作社。

阿里茲曼神父於1976年逝世。他的一生，證明了十八世紀工業革命引伸出來的問題是可以在二十世紀用奧雲的主張去解決，又證明在普羅勞動人民幫助下，企業的領導管理與資金的矛盾是能夠解決的。

「工廠・廚房・垃圾房  
……

——香港女工十五年——

## 婦女與貧窮

房屋署實行最低工資對外判清潔工人影響調查

----- 58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Clothing Industry And the Impact on Female Workers

----- 76

The Strategy of mobilization: The Community Approach to organize Sub-contract Cleaning Workers

----- 85

[落區故事]

不要在晴朗的一天出發了，  
就由今天出發！

----- 94

# 房屋署實行最低工資對外判清潔工人影響調查

清潔工人職工會  
中文大學基層關注組

## 1. 研究背景及目的

### 1.1. 背景

政府外判清潔工人工資低、終年無休的情況經工會及傳媒不斷揭露後，受到社會廣泛關注。政府及房屋署終於在2004年5月通過新措施，並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發出財務通告5/2004號，規定外判工人工資不得少於統計處發表的季度性每月平均工資，以加強保障外判合約的非技術工人。自2004年5月起，政府所有外判新合約及續約，均要遵守新的工資指引。



房屋署雖然為自負盈虧的公營部門，但亦主動表示採納新的工資指引，估計至05年中，房署轄下158個屋村(包括房署直接外判清潔服務及外判給物業管理

公司)將全數受新工資指引規管，房署屬下約8千名外判清潔工人均會受惠。[1]

自從政府公佈對外判非技術工人實行變相的最低工資後[2]，社會上引起對最低工資制度出現正反不同意見的巨大迴響。最低工資作為一個香港各界長年關注的題目，一直就此議題爭論多年。正反雙方意見紛陳：例如樂施會2001年出版《最低工資文集》，詳細闡述支持最低工資的論點及外國實施情況；立法會秘書處99年出版《最低工資制度》報告，羅列正反觀點及介紹各國經驗。

反對意見的論點主要認為最低工資的倡議者好心做壞事，本該受惠的工人反得不償失。論者引用外國的經驗和數據，指出實行最低工資後，出現兩個對非技術工人不利的現象：一是僱主削減人手導致失業率提高，另一是造成低學歷及年長工人被淘汰，都是基於古典經濟學的市場供求的負面就業效應(dis-employment effect)。[3]

贊成者除了社會公義原則，認為工作必須給予合理報酬之外，亦指出上述的不利現象並非必然發生的經濟規律，其他類似的調查，也出現就業率不降反升的現象。[4]

- [1] 立法會秘書處提交給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的文件(2004年12月2日)及與房署高員開會內容。
- [2] 政府對外判非技術工人的工資指引並不是最低工資制度，而是市場主導工資(prevaling wage)，以投標時統計處公佈的清潔及保安工人每月平均工資作為承辦商投標的最低工資，低於此工資的投標將不作考慮。
- [3] The costs and benefits arising from minimum wages are subject to considerable disagreement among economist, though the consensus among economics textbooks is that minimum wage laws should be avoided whenever possible as the costs exceed the benefits. After the passage of the first Federal mandated minimum w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33, an estimated 500,000 blacks lost their jobs, replaced by higher skilled and more educated white laborers. See "Great Myth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Mankinac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 April 22, 2006."
- [4] The study conducted by Card, D. & Krueger, A. in 1992 is the most famous and controversial regarding the impact of the minimum wage on employment. They found that the increase in the New Jersey minimum wage did not lead to any measurable negative impact on employment. The research was published in 1994, Minimum Wages and employ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fast-food industry in New Jersey and Pennsylvani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4, NO. 4.

由於最低工資從未在港施行，正反雙方都只能引用外國數據經驗，而未有一項最低工資的量化實證研究。本地的討論大多引用外國的經驗和理據，唯一本地性的研究，也只是在2001年，針對勞僱雙方對最低工資的意向研究，總結出僱主並無強烈反對實施最低工資的結論。<sup>[5]</sup>

房署在2004年11月開始，第一批共17個公共屋村開始實施最低工資制，本計劃希望就此機會印證最低工資的正反論點是否合乎香港現實運作的情況，並對日後最低工資的發展提供數據性的、初步的討論基礎。

## 1.2. 目的

本計劃以房屋署首批推行最低工資的公共屋村為研究對象，基本目的旨在瞭解在政府提出最低工資指引後有否落實執行，及商家有否遵從。另外，亦希望初步驗證上述一些反對最低工資的論點是否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

本計劃的旨在探討：

1. 最低工資有否落實執行；
2. 最低工資對公司聘用員工數目的影響；
3. 最低工資是否會減少對某些類別，如老人，婦女，新移民的聘用；
5. 實施行業最低工資後公司的應對策略。例如增加工時，增加工作量等方式，以減少員工的實際工資；
6. 實施最低工資政策能否改善工人生活。

[5] Ng, Sek-hong (2001), *The Dilemma of Minimum Wage Legislation: A Trade-Off between Employment and Wage levels*.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2. 研究方法

本計劃的數據主要透過二種方法搜集，一為量化的問卷調查，第二是以文件作為補充資料。

### 2.1. 問卷調查

本計劃選取第一批推行最低工資的17個公共屋村其中9個屋村做調查對象，全部屋村均是房署直接外判清潔服務<sup>[6]</sup>。每一條村進行問卷調查2次，第一次在11月實行最低工資之前，訪問日期為04年9至10月；第二次是在實行最低工資後3個月，再落區做訪問。問卷以隨機形式進行，訪問時間選取日間及夜間各一次，盡可能包括所有工種的屋村清潔工人。

第一次的調查共訪問9條屋村，包括首批8條屋村（麗閣村、石硤尾村、樂富村、牛頭角下村、彩虹村、愛民村、坪石村、慈正村）及第三批（3月份）的白田村，共訪問工友100人。

第二次訪問在05年2月至6月期間進行，追訪問上述8條屋村<sup>[7]</sup>，包括彩虹村、慈正村、愛民村、牛頭角下村、樂富村、麗閣村、石硤尾村及白田村，共訪問了95位工友。

### 2.2. 文件搜集

本計劃向房署要求提供資料，特別是各村新舊合約規定的工人數目及工資，以補問卷調查之不足。

[6] 房署屬下的公共屋村分為由房署直接外判清潔及保安服務，另一種為將物業管理外判，由私人公司負責管理，包括小型維修、保安及清潔服務。本計劃以前者為研究對象。

[7] 首批實行新合約的9條屋村中，由於坪石村推遲投標新合約至05年4月，所以沒有進行第二次訪問。白田村由於發生工潮，在12月與工人做首次問卷調查，所以將之加入在受訪屋村中。



### 3. 調查結果

#### 3.1. 基本情況：工人人數及承諾工資

根據房署給予本會的受訪各屋村資料，新舊合約最大變化是承諾工資 [8] 除了慈正村之外 [9]，其他屋村的承諾工資都高於舊合約。

工人人數方面，以全職工人計，有一半(4條村)工人人數高於舊合約，另一半則低於舊合約。

表1：各屋村清潔合約資料

屋村名稱	現行合約資料		合約承諾工資 (每日工作8小時 及每月工作26天計)	前合約資料		合約承諾工資 (每日工作8小時 及每月工作26天計)
	大約工人人數 全職	兼職		大約工人人數 全職	兼職	
屋村潔淨務合約						
彩虹村	36(+33.3%)	9	\$5,030	27	23	\$4,000
石硤尾村	41(-2.4%)	8	\$5,030	42	14	\$4,177
慈正村	58(+7.4%)	17	\$5,030	54	23	\$5,200
愛民村	38(-33.3%)	15	\$5,030	57	5	\$2,500
麗閣村	20(-13%)	7	\$5,030	23	3	\$3,000
牛頭角下村	37(-5.1%)	3	\$5,030	39	2	\$3,299
樂富村	20(+25%)	11	\$5,030	16	16	\$4,200
白田村	33(+6.4%)	9	\$5,126	31	12	\$3,030

[8] 由於要改善房署外判清潔工人過份低薪的情況，房署由04年開始在外判合約上要求投標者列明承諾工資，即給予工人的最低工資金額，工人實收工資可以高於承諾工資，但卻不能低於承諾工資，此舉屬違犯合約。

[9] 房署提供的慈正村舊合約工資為\$5,200(每日8小時)，但是，根據我們落區實地調查，工人每日工作8小時，工資只有\$3,000至\$4,000，而且並無休息日例假。倒樓工人最高工資為\$7,000，但每日工時超過10小時以上。

註(一)：工人每日工作7小時或以上則列為「全職」，工人每日工作少於7小時則列為「兼職」。

(二)：所列的工人人數為一典型月份的人數。每月實際出勤人數或與此數略有不同。

(三)：全職人數後的括號為與舊合約比較的增減百分比

上述由房署提供的資料，只是給我們一幅總體圖畫；要了解工人實收工資與實際工時，需要進行實地的調查訪問。

#### 3.2. 工資整體提升

新合約的最低工資定為8小時約5千元的幅度，所以月薪在\$5,000至\$5,999的百分比，有超過一倍半的增長；相反，月薪低於四千元百分比，則由49%大幅下降至24.2%。但是，值得注意的是4千至5千元以下的比率亦有所增加，由25%加至28.4%。此現象相信與每日工作時間7小時的比例增加有關(見表4)，因為最低工資以時薪計算，如果每日工作7小時，每月工資約為\$4,400。

表2：工人收入前後比較

總人數：100(前)、95(後)

月薪 (\$)	前	後
2,999以下	14	4.2
3,000—3,999	35	20.0
4,000—4,999	25	28.4
5,000—5,999	13	34.7
6,000—6,999	6	8.4
7,000或以上	7	4.2
總數	100	100

#### 3.3. 工時變化

##### 3.3.2. 兼職工人下降

根據表1，約有2/3的屋村，兼職工人(每日工作6小時或以下)所佔的比例下降，相信是由於新制度限定兼職比例不能超過八分之三(即37%)有關。

表3：兼職員工佔全體工人的比例

兼職比例 (%)	前	後
彩虹村	46	20
石硤尾村	25	16.3
慈正村	30	22.6
愛民村	8	28.3
麗閣村	11.5	26
牛頭角下村	5	7.5
樂富村	50	35.4
白田村	28	21.4

根據本會的問卷調查，如果將兼職人數限於4小時或以下，兼職工人更顯著減少，由10%下降至2.1%。

表4：工人的工作時間

總人數：100(前)、95(後)

工時	前	後
4小時或以下	10	2.1
5—6小時	16	17.9
7小時	15	25.3
8至9小時	50	45.2
10小時或以上	9	9.5
總數	100	100

### 3.3.3 每日工作7小時的工作增加

7小時工作的百分比卻大幅增加，由15%增至25.3%，增幅60%。而8至9小時的工人卻下降了5個百分點(見表4)。

根據屋署提供的資料，以及我們用工種的資料去推算7小時職位的數目，細分不同屋村的情況，發覺不同屋村有不同的工時模式，但仍以全職8小時工作為主

的屋村為主。

表5：全職工人中每日工作7或8小時的比例

屋村	彩虹	愛民	慈正	樂富	石硤尾	白田	牛頭角	麗閣
7小時為主		✓	✓			✓		
8小時為主				✓	✓		✓	✓
約一半一半	✓							

### 3.4 工人假期福利改善

調查發現在最低工資實施後，工人在享受勞工福利及工資都得到改善。過去歷次的調查均顯示，不少清潔工人被剝奪了勞工法例所賦予的年假及勞工假 [10]，但是，在今次的調查卻發現實行新合約後，聲稱享有勞工假及年假的受訪者大幅增長，年假達96.8%，勞工假超過八成，其餘工人即是以薪代假，沒有人是完全無薪無假。

#### 3.4.2 工人享有法定假期情況

表6：實施最低工資前後、工人享有年假的比較

總人數：100(前)、95(後)

年假性質	前	後
有薪有假	41	96.8
以薪代假	6	3.2
無薪無假	53	0
	100	100

[10] Hong Kong Oxfam commissioned a survey on the working and welfare condition of contract out workers in PHE, including cleaning workers and security guards. The findings revealed that 25% of cleaning workers had no statutory rest day and paid holiday. More than half of the workers received wage less than HK\$4,000 (US\$512) which was lower than that the average wage in the private market (Source: Cheung, CH & Tam, KM 2002, "The Outsourcing System of Cleaning and Security Services in Public Housing", p. 4-6, HK: Oxfam)

表7：實施最低工資前後、工人享有勞工假的比較  
總人數：100(前)、95(後)

勞工假性質	前	後
有薪有假	44	81.0
以薪代假	7	15.8
無薪無假	49	3.2
	100	100

### 3.4.3. 工人獲得休息日例假

在實行新合約前，只有二成工人獲得勞法規定的休息日，但，實行新合約後，差不多百分之一的工人享有每月4天的休息日。

表8：實施最低工資前後、工人享有休息日的比較  
總人數：100(前)、95(後)

每月休息日日數	前	後
0	47	1.0
2	32	0
4	21	99.0
總數	100	100

### 3.4.4. 合約副本

根據新合約規定，公司必須向僱員提交由房署規定的標準合約副本，但是，仍有超過4成受訪者，在新公司上場3個月後，仍未有收到合約副本。

表9：公司是否有給你僱傭合約副本  
總人數：95

	百分比
有	56.8
無	43.2
總數	100.0

### 3.5. 年齡及性別

#### 3.5.2. 中年人仕比例增加

中年工人明顯增加，年齡由40至59歲的工人，由之前的53%增至83.1%。其中以50至59歲的增幅最大，達83%。相反，年齡60歲以上的工人大幅減少，由41%減至11.6%。受訪者平均年齡由53.6歲下降至48.8歲。

表10：工人年齡狀況的前後比較  
總人數：100(前)、95(後)

年齡(歲)	前	後
29或以下	3	2.1
30--39	3	3.2
40--49	35	48.4
50--59	18	34.7
60--69	31	9.5
70或以上	10	2.1
總數	100	100

#### 3.5.3. 性別：中年女性佔主導

清潔工仍以女性為主要的工作，不過，實行新約後，男性有輕微上升。增長幅度最大為50—59歲的男性(見下頁表：12)

表11：工人性別分佈的前後比較  
總人數：100(前)、95(後)

性別分佈	前	後
女	77	70.5
男	23	29.5
總數	100	100

### 3.5.4. 男性年長工人急劇下降

新合約實行前，男工的年齡偏高，60歲或以上的男性佔全體男工的73.9%，而女性只佔同齡組別的29.9%；實行新合約後，年長男女工人的比例下降至14.2%及10.4%，年長男工下降幅度很大，達76.5%。

新合約實行後，男工由年長工人佔多數改為中年男性居多，40至59歲的年齡組別由佔男工兩成(21.7%)增至八成(82.2%)，其中以50-59歲最多，佔全體男工的一半。

表12：工人以性別劃分的年齡分佈

年齡(歲)	女		男	
	前(77人)	後(67人)	前(23人)	後(28人)
29或以下	3.9	0	0	3.6
30--39	2.6	4.5	4.3	0
40--49	42.9	55.2	17.4	32.2
50--59	20.7	29.9	4.3	50.0
60--69	22.1	10.4	56.5	7.1
70或以上	7.8	0	17.4	7.1
總數	100	100	100	100

## 3.6. 工作量

超過七成受訪者表示，新合約實行後，工作量並沒有增加。但是，有接近兩成人表示新合約後工作量增加。

表13：工作量有沒有增加  
總人數：95

	百分比
有	18.0
無	73.6
不適用	8.4
總數	100.0

## 3.7. 工人性質變動情況

### 3.7.2. 工齡

兩次訪問均顯示工人工齡超過2年佔62%(前)及68.4%(後)，5年以上佔一半(前)和39%(後)。

表14：在同一屋村工作的年資分佈的前後比較  
總人數：100(前)、95(後)

工作年資(%)	前	後
1年以下	11	12.6
1-2年	27	19.0
3至4年	12	29.5
5至6年	31	24.2
7至9年	11	10.5
10年或以上	8	4.2
總數	100	100

第二次訪問裏，有9成以上受訪者表示在舊合約時，已在同一工作地點工作。只有8.4%是新合約實行後才受僱的員工。

表15：是否舊公司員工  
總人數：95

	百分比
是	91.6
否	8.4
總數	100.0

### 3.7.3. 居住地點

受訪者以居住在工作地點的屋村為多，只有極少數為越區工作，這種情況在實行新合約後並無太大改變。

表16：受訪者居住地點  
總人數：100(前)、95(後)

居住地點	前	後
本村	63	70.5
區內	32	26.3
區外女	5	3.2
總數	100	100

## 3.8. 工人對實行最低工資意見

### 3.8.2. 工人認同新措施增加休息機會

在政府實施最低工資後，清潔公司剝奪假期的情況大有改善。有96.8%的受訪者表示新工資政策令他們有更多時間休息。

表17：你是否認為實行最低工資後，增加了休息機會  
總人數：95

	百分比
是	96.8
否	1.1
無意見	2.1
總數	100.0

### 3.8.3. 工人認同新措施改善收入

在政府實施最低工資後，有86.3%的受訪者表示新工資政策令他們能改善收入

表18：你是否認為實行最低工資可以改善收入  
總人數：95

	百分比
是	86.3
否	10.5
無意見	3.2
總數	100.0

## 4. 調查結果分析

根據本調查所搜集的資料，發現：

### 4.1. 最低工資能落實執行

調查員在第二次訪問中搜集8個屋村不同工種的工人工資，並無發現出現違犯房署公佈的最低工資水平，符合以時薪計算的最低工資金額。顯示在新合約實行的最初階段，外判商能落實合約中規定的工資。

#### 4.2. 外判商基本上依法依約辦事

新合約實行後，在法定假期及休息日例假方面有很大的進步，雖然，由於訪問時大部份工人工作期剛夠3個月，仍未有機會放勞工假及年假，所以只是從管工口中或合約上知道會有法定假期福利。但是，此舉已是一大進步，過去，很多公司都不會主動告訴工人她/他們的勞工權利。而且在休息日上，絕大部份工人都可以得到休息日。雖然在第二次訪問期間，仍有超過4成受訪者沒有得到合約副本，但是，本會在05年下半年再探訪工友時，發覺所有受訪屋村的外判商均有向僱員提供房署規定的標準合約副本；在勞工假上亦依足法例辦事。

工人合法權益得到長足改善，主要是因為政府除了頒佈最低工資指引之外，亦在頒佈了扣分制度，外判商如果違法勞工法例或合約若干次，會被罰在一段時間內停止投標，房署更成立中央巡查隊，由中央派員到各區巡查，這一系列措施都使外判商不敢明目張膽公然違法違約。

#### 4.3. 弱勢工人並無因最低工資而被替代

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反對最低工資其中一個論點是：實行最低工資只會好心做壞事，提高工資令弱勢工人被條件較優的工人替代。本調查發現，除了60歲以上的男性工人有明顯的下降之外，公共屋村外判清潔工的主要特質並無很大變化，主要是中年(平均年齡為49歲)、和居住於工作地點附近的女性佔大多數。這情況與公屋清潔工作的內容有密切關係，公屋清潔工工資低(最低工資只是5千元，只佔全港工資中位數的一半)、工作時段分割(倒樓工人分早晚時段)，如果不是居住在工作地點附近，往返的時間和交通費，都會使工資所餘無幾。而且，公屋清潔工作工作條件較差，需要日曬雨淋或者要在密閉的大廈內工作，處理生活垃圾有很大厭惡性，所以工人如果有較佳條件，例如較年輕或者學歷較好，都不會選擇從事公屋清潔工作，對於年長、有家庭需要照顧的女性來說才有較大的吸引力。

#### 4.4. 外判商對應策略

反對最低工資的主要論點是：提高工資會令失業率上升，因為高工資令僱主減少聘用人手，利用其他管理策略例如增加工作量，增加工時等方法，使僱主可以用較少人手維持過去的服務水平。

本會曾去信及致電外判清潔商，希望能做訪問，以了解僱主對實行最低工資在管理策略上有何應變措施，但是均遭到拒絕。所以，本調查主要是依靠工人的問卷調查，及訪問工友來了解是否出現上述減人手或加工作量的現象。

#### 4.4.2. 僱傭人手

根據房署接得的資料，8個受訪屋村中，全職工人的人數增加或減少的屋村各佔一半。但是，過去由於房署監管鬆弛，工人數目有很多虛假不實之處。以減少全職人手超過3成的愛民村為例，我們在04年9月至10月進行第一次訪問時，工人表示傳聞房署要求外判商每幢



屋村大廈聘請2名倒樓工人，實際上卻只有一名工人負責。新合約實行後，全職工人下降33.3%，但兼職工人卻增加，增幅為百分之二百，以總體工人計算，工人人數下降率減為14.5%(見表：1)。估計新合約實行後，一方面由於監管嚴格，外判商不敢太明顯作假，另一方面，新合約的承判費以總人時計算，工人人數沒有規限，外判商犯不著在人數數字上弄虛作假，一幢大廈由過去名義上兩名工人，變為一個全職，一個兼職，以致令全職工人下降而兼職工人大幅增加。

#### 4.4.3. 工作量

調查反映有接近兩成受訪者表示新合約實施後工作量增加，與工人的訪談中，發現這個現象可能與外判公司的管理模式改變有關係，過去倒樓工人主要負責清倒生活垃圾，大廈內的其他清潔工作，由公司安排雜工去做。近期，有些公司改由倒樓工人負責整幢大廈的清潔工作，戶數小的大廈由一人全包，多戶數的由一個半人負責，可能因此增加了工作量，或者是由於工作時數減少，工作量不變所致(見4.4項)。但是，由於問卷設計所限，本次調查未能清楚呈現工作量增加與工作模式、工時改變的關係。

#### 4.4.4. 每日工作7小時的現象增加

調查反映7小時的工作大幅增加，百分比由15%增至25.3%。不少工人投訴工作量雖然不變，但是由於工作時間由8小時變為7小時，工作時間減少，所以實際上是增加了勞動強度；這種情況以雜工投訴最多。由於問卷沒有設問，所以未能反映確實的影響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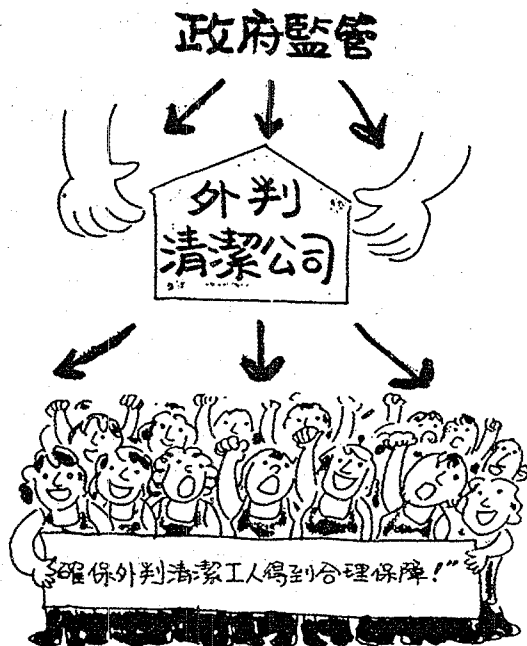
#### 4.5. 最低工資對工人的影響

超過8成(86%)受訪者表示實行最低工資會令她/他們收入得到改善。

#### 5. 調查的局限

· 第二次調查是在實行最低工資三個月後進行，最長相距不超過半年。所搜集的資料是工人和公司即時的反應和措施，外國一些調查資料顯示，公司的應變策略可能要在最低工資實行一段時間內才推行；再加上8個屋村中，只有2個屋村由舊公司投得，其餘均為新公司上場，新公司通常在合約初期，在各方面的執行工作都會相對嚴格，避免房署對其服務有負面印象，此舉亦會影響公司管理策略。根據本會實地探訪的觀察，05年末時，部份屋村的公司管理開始寬鬆，倒樓工人只做自認合理的工作量，又有些屋村，工人投訴實際工人人數減少，不法公司的慳錢策略才開始現端倪。

· 本次調查是用問卷調查方式，所以工人一些想法未能更全面反映，例如有些工人表示最低工資令她/他收入減少，但是，原因是過去工作超過10小時，工資包括所有假期，而新合約工人最高工時不能超過10小時，或者有外判公司避免麻煩，不容許工人在同一工作地點做多一份兼職，以至令工人收入相



對過去減少。

· 房署提供的舊合約工人數字，由於過去房署缺乏監管，工人人數作大成份很大 已是公認的事實，所以難於單憑數字去比較新舊合約的實際工人人數。

#### 6. 結論

6.1.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反對最低工資的兩個論據：弱勢工人被條件較好的工人替代，以及僱主會減少僱員人數，造成失業上升，這兩個現象在本調查中都沒有出現。原因可能有以下兩點：

勞動市場的供求關係並不是一個教科書的完全競爭和流動的模式：

· 勞動需求方面：本調查對象是房署外判清潔服務的公共屋村，外判商雖然是私人公司，但是，公司僱傭模式上並不能完全自主，而受房署外判合約的規限，例如房署雖然不限工人數目，但是有要求每週總人時，公司為要得到合約，不能在總人時(間接在工人數目)上任意縮減。

· 勞動供應方面：公共屋村外判清潔工作的特殊性質：工資低、工作時段分割、厭惡性強，都令到工人供應方面，主要由年齡較大(平均年齡54歲)、居住於工作地點附近的女性擔任，而公司的招聘模式，都是在將入至村時在該屋村公開招募，而不會刊登廣告，再加上屋村範圍大，管理人員少，外判公司通常都會繼續聘用上一手公司的僱員，因為對方熟悉工作內容及程序，比新入村的管工更清楚，所以聘請新員工的比例一直都是很少。

上述情況雖然在公屋外判清潔工作上最為明顯，但是，其他低薪行業亦會受到低薪(居住與工作地點遠近)、社會文化(厭惡性)、管理(工作時段)及招聘模式(是否公開招聘)的限制，無論勞動的需求和供應，也不會在像教科書中完全競爭和流動的情況。

6.2. 實行最低工資後對工人無論收入和休息時間上都有好的影響，這是無可置疑。

2005年10月

#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Clothing Industry And the Impact on Female Workers

Hong Kong Women Workers' Association  
Oct. 2005

## 1.A Brief Background of Hong Kong Clothing Industry

Starting from a modest beginning in the early 50's, Hong Kong clothing industry has been undergoing a tremendous change, with its share of ebb and flow while facing the turbulent global market. With merely 41 factories in 1950, clothing factories sprang up by leaps and bounds by an annual average growth rate of 24.9 per cent over the next twenty years, reaching 3,491 and employing 158,025 workers in 1970. The upward trend moved on hereafter. In 1987, the clothing industry reached a peak, consisting of 10,556 factories and employing 299,932 workers, accounted for 20.9 % and 34.5 % respectively of the total manufacturing sector.

In the 90's onward, the developmental pace of clothing industry slid to a down-slop fall and lost its leading position in Hong Kong economy. Despite it still manages to maintain a major role in the shrinking manufacturing sectors, its role as the motor forces of Hong Kong economy is replaced by the ever-growing service sector. The fall is huge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factories and that of employment in compare with the prime time in 1987, cutting by 77% and 86% [1] respectively between the peak and 2002. More than two-third of the

[1] The number of establishments and that of employees in clothing industry was 2,415 and 40,609 respectively in 2002; the correspondent figure in 1987 was 10,556 and 298,377. (source: Trade Development Centre, 2003)

clothing factories has either closed down their business, moved elsewhere or gone broke over that period.

However, the significance of Hong Kong clothing industry in the global market has not been shrunk. Despite it is no longer the top clothing exporter in the global market as that in the 80's, it still occupied the first three positions since 90's onward and takes up 5.1% of the total in 1999 with the first two countries, China and Italy taking up 16.2% and 7.1% respectively. Similarly, its contribution to domestic export dwindled but remained a significant position, amounting to 47.9% of total domestic export in 2002.

Accompanied with the relocation of production, export-import trading companies offshore clothing production sprang up. Trading companies working as middlemen between overseas importers and local manufacturers wa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local clothing industry. In 2001, there were 15, 335 establishments and 91, 863 employers in 2001.

## 2.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With the widespread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promotion of trade liberalism with the WTO's blessing,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s restructured in favor of the interests of footloos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TNCs). With more and more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adopted the exported-led industrialization, a three-tier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global production comes to the surface since the end of last century.

The new trend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decentralized arrangement of production. Roughly speaking, there are three tiers in production process. While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concentrate on higher valued-added activities, such as R&D, design and marketing, the newly industrial countries (NICs), position in the second tier, producing sophisticated and up-end market products, at the bottom of production chain, station the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which play the role as the contractors or subcontractors of TNCs or NICs for the basic, standardized items.



Hong Kong has positioned itself in the second tier of the global network as a financial and producer services hub. Hong Kong established itself as one of coordination centers for sourcing garment which function are for co-coordinating production and related services across broader, as well as for arranging financial and logistic backup.

Since the end of the 80's, Hong Kong clothing industry adopted a so-called "plant with shop frontage" (前舖後廠) model. More and more manufacturers either set up their offshore production plants or subcontracted orders outside the territory. The operation left in the territory is minimized for receiving orders and functioning as a coordinating hub of production network. The relocation process was accentuated in the 90's. 43 % of the Hong Kong manufacturing and trade companies have reported to invest in factory facilities in Mainland China. About 53,000 factori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are either owned by Hong Kong capitalists or serving Hong Kong manufacturing via contract arrangement, and 5.59 million workers are involved. Among the bulk of Hong Kong investment in China, the clothing industry took up 10.4% in 1992.

The capital outflow is no longer confined to the Mainland. With more newcomers emerged in the region of Southeast Asia, the investment destinations have extended to Vietnam and Cambodia where liberalized policy for foreign investment has been adopted.

### 3. Quotas System and Its impact on Clothing Industry

Apart from scouring the cheapest labor sources, the quotas system impos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for restricting the quantity of import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for Hong Kong capitalist to deport the production section out of the territory. As a tiny city with small size domestic market, the clothing industry has adopted a policy of export-oriented righ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e development was closely linked to the dispute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us the sequential anti-dumping mechanism. Since the enforcement of quotas system in the 60's, especially after the Multi-Fiber Arrangement (MFA) came to the effect in 1974, local capitalists mainly adopted

two policies to bypass quota restriction and explore new market access.

The first one is the outward-bound foreign investment. The process began in the mid 60's, triggered by textile import restrictions imposed by the UK in 1964. In the first phase, manufacturing was shifted to Singapore, Taiwan and Macau for their dominant population of Chinese and preferential status to European market being as former or encumber colonies. The second phase was in the early 1970. Once again, quota restriction was the initial impetus for shifting production overseas. Since the 80's onward, the investment from Hong Kong capitalists intensified covering all the Southeast countries as well as those far way countries such as Maruritius, Costa Rica, India and Bangladesh.

The main attractions were low labor cos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export processing zone (EPZ) where overseas investors enjoyed a number of preferential treatments such as tax holiday. More important was their access to export markets. Mauritius was a favorite for Hong Kong knitwear manufacturers for its preferential status of EU market, and Phillipine for its quota free status for fibers other than cotton.

The second is to exploit cheap labor in Mainland China but maintain a larger profit margin as Hong Kong-make products. The Outward Processing Arrangement (OPA) enables Hong Kong capitalists to use Made in Hong Kong label on their products, but a large part of the production are operated in Mainland China. Worse still, many local capitalists abused the requirement that all the production lines in fact have already deport to China, and the factories in Hong Kong are only empty-shell.

In view of this, Hong Kong capitalists are very flexible and cunning to bypass any restriction and make the most of loopholes existed to their own advantages. The above-mentioned policies are at the expense of both local workers as well as their counterpart in the Mainland and Southeast Asian. For the former, they have not only lost their jobs, but their hard-earned skill accumulated for a life time in the industry was viewed as obsolete. For the latter, despite they get a job, but the wage is low and the future of their career is uncertain for footloose TNCs are always on a move in pursuit of the cheapest labor and resources.

## 4. The Impact on Women Workers

The reversal with regard to economy magnitude of Hong Kong economy indicates the hardship faced by Hong Kong workers in general, and women workers in particular. Women workers are doomed to be the losers in this globalization process. The transformation to the global city serving the interests of TNCs makes production workers redundancy. In 2002, manufacturing sector only accounts for 5.1% of total employment, a steeply downward movement in contrast to 41% in 1980. The number of women employed has dropped from 424 thousand in 1986 to 116 thousand in 2001. Whil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fact that employees remained comprises a large number of clerical and non-production staff serving offshore production, the blow on women workers should be graver than the above figure indicated.

Those displaced women workers constitute a large percentage of reserve labor for the service sectors. The 90's witnessed the expansion of service sector and the massive exodus of workers from manufacturing to service sector. The change to service sector led to the proliferation in labor market. The service sector roughly divides into two parts; one is related to producers' services, such as export/import trade, financial and transportation logistic services. The other is said to be consumers' services relating to domestic consumption market, such as retail and wholesale business, community and personal services. For the former, it is perceived to be involved in the so-called higher value-added activities, and thus creating better pay and more secure jobs. The latter is depicted as labor-intensive sector employing mainly manual workers with low skill requirements and thus low pay jobs.

These low pay sectors can be viewed as women sector in the sense that a large number of employees is women. Not only half of the employees in these two sectors are women, 64.3% in community, social and personal services, and 49.1% in wholesale and retail sector, but also have the largest share (70.6%) in women employees.

The deterioration on wage level could be viewed more apparently in the lowest bottom of labor market. One out of six employed women falls into the category of working poor which,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definition, is referred to those workers who earn less than half of the median monthly earning

countrywide, in the case of Hong Kong is HK\$5,000 (US\$641) in 2002. Moreover, the lowest places in the employment hierarchy, the largest wage discrepancy exists between two sexes. The median monthly earning of female unskilled workers is just HK\$ 3,900 (US\$ 500) which is merely half of that of male counterpart, being HK\$ 7,500 (US\$ 961).

Apart from low pay, jobs are difficult to obtain and secure, especially for middle age women. Age discrimination is widespread in service sector which beautiful face and young looks is perceived as an asset in getting a job as a saleswoman or waitress. In contrast, middle age women end up as cleaning workers and general workers in public housing estates, offices, restaurants, and fast-food chain shops, in other words, in the lower strata of the service sectors.

It is foreseeable that the employment prospect of women workers would continue to be bleak. The more Hong Kong economy serves the interests of TNCs, the fewer jobs women workers can obtain. According to government projection on job requirement, the growth of job demand in 2005 will mainly in the upper segment of labor hierarchy, specifically for trade or financial related sectors.

## 5. Recent Development -- Post-Quotas Period

The scrapping of quotas system in January 2005 exposes the precariousness of globalized production of clothing industry. Instead of the triumph of free trade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ensured by WTO, international trade disputes intensify and protection measurements are once again brought in to against so-called dumping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in head-on crash. Both sides take the interests of workers as a pretext to sustain the argument. However, taking the recent outburst of Sino-U.S. dispute as an example, the use of protectionism for U.S. government and the upholding of free trade in the case of Chinese government are not something we workers could take side. Both sides fail to tackle the problem head on. The real problem faced by garment workers after the post-quotas period lists down as follows.

I. The ever-increasing down slop movement of wage level: After the accession of China to WTO, the price offered by overseas importers is cut by 41% on certain categories of garment products. The downward movement of price will deteriorate after the abolishment of quotas. As revealed by a director of one Hong Kong TNC, the price offered by overseas importers is 7% lower than that of last year's level and will be further low by 8% in the end of the year. The loss of profit will be offset by wage cut of workers.

II. The over-capacity of clothing industry in global level would make the competition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further deteriorate. In China, being caught up in the euphoria for the prospect of larger share in post-quotas period, the investment on fix capital of garment production has increased by 144% only in the first three months of 2004, 68% more was recorded in April. However, it is revealed that the growth rate of international market is only 4% in 2003. In fact, importers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already been a price-maker of the garment market when they could scour for cheapest suppliers around the world. The over-capacity of global clothing industry will make the race-to-the-bottom game exacerbate.

III. In the case of Hong Kong, the blockage of China's garment import by imposing safeguard quotas and the resurgence of export tax on garment products by Chinese government make Hong Kong capitalists relocate the production lines back to Hong Kong to evade the restriction. However, they try to limit the wage level of local workers to demand for the importation of labor from Mainland China as well as set a wage cap. It is an uphill battle for Hong Kong workers to safeguard the right as well as that of import workers.

## 6. Conclusion and Suggestions

The experiences of Hong Kong women workers foretell those of workers in other countries. Young women are dragged to the industry which labor-intensive production model needs cheap and docile women labor. They contribute the prime of their time in making garments for customers in more prosperous countries. However, the global network of production make investing capital more velocity to scour the world for the cheapest resource. Workers are more vulnerable in facing of footloose capital.

The trickle-down effect guaranteed by the mainstream economists does not fulfill as they have promised. For one thing, to earn money in the clothing industry should pay a high price, suffering from long working hours and intensified workloads for workers. Even this hard-earned money is short-lived. For the other thing, it is clear that giant overseas buyers and large corporate are the gainers in this race-to-the-bottom game. In the present global supply cha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confined to the low-value-added activities which are easy to be replaced by other countries. While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industry is to gain as much profit as possible, the development i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only serves the interests of giant game players. The so-called new practices, such as zero inventory, quick response are for the interests of retailers to pass down the risk to those who are in vulnerable positions, first to the manufacturers and finally, to workers. The shorter lead-time directly lead to the longer and frequent Over Time for workers.

It is clear that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is in fact interwoven with power maneuvering. Those who are more powerful in the chain get the upper hand and set the rule of the game. For workers who are situated in the bottom of the power structure can do nothing but waiting for being thrown out of the industry.

However, the picture can be change if more efforts are to be made for the interests of workers as well a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ince garment production is a global activity involving parties from different sectors, therefore, joint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ensure positive results.

## Demand for Workers to ensure a decent livelihood

\* Set up minimum wage to ensure employers should provide workers with livelihood not lower than the average living standard. The protection should cover all ranges of workers including short-term, casual workers and contract-out workers.

- \* Ensure import workers enjoy the same wage level and labor protection including the right to join trade union as indigenous workers.
- \* Co-opt unions and workers representatives to the monitor system to detect any abuse of import workers.
- \* Ensure the right of workers to join trade union, bargain collectively to resolve labor concerns.
- \* Improv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pension scheme to ensure the livelihood of workers in distress situations.
- \* Explore ways to monitor practices of local companies but operating regionally or globally.
- \* Integrate labor right in government trade policy
- \* Demand government to levy compensation from the footloose companies to the discard workers whenever they deploy production sites outside the country. Local workers' interest and livelihood should be take precedent to those of the companies.
- \* Involve overseas as well as local consumers to alert of the plight of garment workers, to convince them to make sure products they bought are produced in the condition that is compliance with the basic labor rights and the encumber labor law of the exporting countries. Take boycott action to those brand name companies and retailers who source cheapest products at the expense of workers.

# The Strategy of Mobilization: The Community Approach to organize Sub-contract Cleaning Workers

chan po ying  
Hong Kong Women Workers' Association

## 1. The general background

### 1.1. The de-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impact on women workers

Since the 90's of the last century, Hong Kong has transformed from a manufacturing site to a global financial and sourcing hub. Local manufacturing activities have been moved out the territory scouring for cheapest labor sources in Mainland China and other low-cost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of South East Asian. What remains are the financial and trading sectors servicing the interests of footloos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TNCs). For the displaced women workers who were cast ou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they found themselves situated in the lowest bottom of the labor market. The only job opportunities offered to them are in the service sector as a low paid, long working hours, unskilled worker.

### 1.2. The privatization of public housing management

The ideology of neo-liberalism is prevailing in Hong Kong with the blessing of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for decades. The doctrine of laze-faire was upheld as the non-intervention principle of the government to the market. After the return of sovereign to China in 1997, the new government follows suit. The non-intervention principle is further implemented under the policy of "keeping a minimal government but a large market". Privatization of public services in the form of outsourcing and corporatization are two main strategies to practice the

doctrine of minimal government.

Public housing has a long history to outsource services to private company. Since 1987, the Housing Authority (HA) has contracted out cleaning services and security related services and confined to the role of management and monitor. The pace of privatization is further expanded in late 90's that the whole management is contract out to being in line with the downsizing of the government. As a result, the monitor role of HA is further undermined because a large number of frontline government officials withdraw from the Public Housing Estate (PHE). The monitor role leaves to private company which is profits-oriented. Therefore, the more widespread use of contract-out practices, the more deteriorated working condition is for cleaning workers.

## 2.The problem faced by the sub-contracted cleaning workers (SCCW) in Public Housing Estates (PHE)

### 2.1.The profile of SCC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CCW put them in a vulnerable position subject to outright exploitation. According to our survey conducted in 1998, the component of SCCW is mainly middle-age women who have migrated to Hong Kong within seven years preceding the interview. Including those who have migrated to Hong Kong more than seven years, the percentage of SCCW with immigrant background go up to 90%. The rest of them are elder people having no alternative to look for other job, and a small amount is of local housewives.

The lack of knowledge of existing labor protection and social resources in Hong Kong make them an easy prey of unscrupulous employers. Moreover, as middle-aged women with children to take care of, they do not have so many choices at hand. It is clear that migrant, married SCCW not only need job to supplement the meager family income, but also need this particular cleaning job for its vicinity from home. As a result, they are in disadvantage position to bargain with the employers for fear of retaliation.

Because of their vulnerable position in labor market, SCCW suffer low wage which is far below the average standard of ordinary workers. The average monthly wage of cleaning workers is around HK\$5,000 (US\$641), but the average wage of SCCW is HK\$1,000 (US\$128) lower than the average. More worse, most of them are deprived of the statutory rest day and paid holiday day.

It is clear that SCCW is being exploited for their multiple identities as new immigrants workers as well as working mothers. Being new immigrant workers, they are unable to make use of the existing law and resources to safeguard their rights. Their plight is compounded by the fact that they are the principal child-carers that their choice on job seeking and thus the bargaining power is seriously hindered.

### 2.2.The challenge faced by the union movement

The characteristic of SCCW makes organizing them a challenging work. The prevailing organizing pattern of tradition trade union is inadequate to reach them, needless to mention to respond to their need. As mention above, they are passive to fight for their right for fear of dismissal. The lack of knowledge of existing resources adds more obstacles for them to seek outside help. Moreover, the dual roles as working mothers make SCCW find themselves almost impossible to join trade union activities. In fact, for most of SCCW, their activities restrict in the community they live and are not familiar with other areas despite they have been resided for years. The only way to reach them is to visit them on the spot they work, rather than let them take the initiative move.

## 3.Strategy of mobilization

### 3.1.Previous work done by HKWWA and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We adopt an outreach approach to get in touch with SCCW. It means not

only we pay visit to them to the work place, but also all the activities are organized in the PHE where they work and also, in most of the case, they reside. Besides to provide convenience for participation, the rationale of the approach is to cultivate a sense of commonality by addressing issues which would encourage SCCW to come together for collective action.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organize SCCW is at the time when the contract between HA and tender company expires. It is of common practices for tender companies just retrench workers without giving redundancy payment as required by the law. SCCW, most of them poor education, some even illiterate, do not have the knowledge to handle labor dispute, therefore, our involvement is crucial for them to fight for their right and interest. In 2002, through their experience to take action collectively, SCCW came to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the trade union for common identity and mutual support. Cleaning Workers Trade Union (CWTU) was then set up.

However, our work faced limitation that we find difficulty to mobilize SCCW to strive for better working condition while they are still on the job. Given the preponderant power position of tender companies over workers, they are hesitate to expose wrongdoing of their employers who they are still working for. Beside, through our experience, it may be more effective to appeal to the government body which is more responsive to criticism to than private company which concern is mainly on profit-seeking.

### 3.2.A new move of strategy:

To mobilize SCCW who are still on the job, we adopt a community organizing strategy in PHE. The rationale is twofold. Given the imbalance power position between workers and employers, to involve other social forces in the community is a viable way to tip the balance to the advantage of SCCW. As mentioned above, SCCW has multiple identities, a worker working in a community, a mother with immigrant background and a resident of a community. Before, it may see this multiple identities as a liability for it limits worker's choice of job. The new working approach takes it as an asset to cultivate commonality and bonding with other residents, and make demand of SCCW being more appealing. Those who live in PHE are from working class. They also suffer from low pay, intensified workload. To appeal for their empathy and thus supports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community organizing strategy.

The other rationale is to involve the government to the forefront. Government is supposed to take up the monitor role when they contract out public service. However, what is on the priority is for sanitary quality but not the welfare of sub-contract workers. They simply turn a blind eye to wrongdoing of tender companies. However, government bureaucrat is susceptible to public criticism and embarrassment. The exposure of inhuman working condition and the widespread violation of labor law would press them to take action in favor of SCCW.

In short, the community organizing strategy is exercised in two levels, one is in the community level to engage as much social forces as possible, including ordinate residents, district councilors, resident organizations etc. The other is on the wider social level to push government to safeguard the right of SCCW.

### 3.3.Organizing work in community

#### 3.3.2.Organizing SCCW in community

The new strategy was first implemented in a PHE. We had received complained from workers that after a new tender company had taken over the cleaning service, their wage had dropped by 24% to 33%, while their workload had escalated tremendously. The intensified workload was due to the fact the new company employed few workers. Together with university students of a grass-root concern group, we paid frequent visits to SCCW in the PHE in question. We have built up a trustful relationship with SCCW, fostered a sense of collective, and raised their consciousness of being exploited.

#### 3.3.3.Mobilizing residents in the community

To encourage on-the-job SCCW to come out, we have resorted to the support of residents in the community. We tried to establish a linkage between residents and SCCW by three levels.

\* To convey an ideal of fair deal: to convey a message that if we want high quality of hygiene, we should treat workers fairly in term of wage level, working hours and condition. The outbreak of SARS in 2003 has kept residents alert of public and personal hygiene.

\* o cultivate a sense of community among residents and SCCW: to emphasize that workers are part of the community not only most of them are residents of community, but also to keep the community being sanitary, residents and workers should join forces to make it happen.

\* To build up a common identity of working class among residents and SCCW: residents who live in PHE are ordinary workers belong to low class, like cleaning workers in restaurants, domestic helpers, unemployed, housewives and so forth.

The activities we organized to facilitate the above-mentioned goals

1. A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facilitate the understanding to the working condition of SCCW. We have successfully solicited support. The majority of interviewed residents expressed their view against further privatization of management in PHE and asked for legislation of minimum wage system to protect the low-paid workers in general, and SCCW in particular.

2. A Signature campaign was held to exert pressure to the HA. We collected 700 signatures in the PHE to support the demand of minimum wage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monitor system to safeguard the right of SCCW.

3. Meetings were held to facilitate the face-to-face contact among residents and SCCW, their view were shared on the roles among each other to create a hygienic environment, and the unfair treatment to SCCW by the tender company.

### 3.3.4. Mobilizing local forces in the community

Many local forces in the community, for example, district councilors, residents committee and residents groups in each Public Housing building, play an influential role in matters concerning cleaning services. We have approached the district councilors and member of residents committee to ask for their support. At first, the district councilor was reluctant to help, after the signature campaign, seeing that the voters were concerned about this issue, he had to take the matter to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the PHE for discussion.

### 3.3.5. Pressure from the General Public

To engage more social forces to support SCCW, we joined forces with other groups. Apart from the grass-root concern group of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other concern group was set up to ally with broader social forces. The concern group comprises Hong Kong Oxfam, university scholars, like-minded trade unions and individuals to exert more pressure to the government. We conducted survey in the territory-wide level to expose the widespread violation of labor law of tender companies and the ignorance of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which were supposed to monitor the contract-out system.

In this case, the concern group held press conference, and exposed the wrongdoing to phone-in radio program. The action not only arouse criticism from the general public, but also put pressure to the HA to take action to rectify the loopholes.

SCCW in the PHE took an active role in the above-mentioned activities, they were empowered by the support and the positive response from the society. They no longer thought that they were being ignored and in a weak position.

After the investigation, HA found out that the wage of SCCW was lower than the wage promised by the tender company laid down in the contract. As a result, SCCW received the higher wage stipulated in the contract, and the tender company had to terminate the contract, and withdraw from the PHE to avoid punishment.

### 3.3.6. The impact

The series of issues mentioned above set in motion for policy change in the government sector. The government was criticized for inefficiency and ignorance. Finally, government decided to set up prevailing wage system stipulating that wage in government contract should not be lower than the average wage in the private market in similar occupations. This move virtually offers a HK\$1,000 (US\$128) increases for SCCW. Moreover, a new monitor system was also put forth to have better supervision to tender companies.

## 4. Looking forward: future prospect and challenges

As being discussed, our community organizing campaign has made some

achievements,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fight for the proper welfare of SCCW and other marginalized workers. There are several great challenges to deal with in the coming future.

First, the number of SCCW being protected by the prevailing wages system is getting smaller and smaller. There are many public housing that are under the Tenants Purchase Schemes, which means that some residents have already bought their own flats. These tenants purchase estates are initially managed by the HA, but two year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chemes, the management will shift to the Owners' Corporations. This means that the prevailing wage system that now is applicable to the Estates will stop its effectiveness once the owners' corporation take over the management; the cleaning workers there probably will suffer from meager wages and lack of labour protection again.

Second, the trend of privatization in Hong Kong has become more penetrating and dominant. The HA is going to sell part of their asset, such as retail centers and car parks to private companies. If the plan of privatization will put into effect, workers over there will be deteriorated. It is because workers will no longer be protected by the prevailing wage system as they are now. Also, the private sector ownership and operation mainly focuses on profit maximization and efficiency, rather than the moral values that are used to uphold by the public services; the working pattern of labour will become even more irregular, casualized, and unstable, and their welfare will be further deprived.

Third, the prevailing wage system is now just applicable to the contracting out non-skilled workers of public services, which means that nearly two third of cleaning workers are not covered by the system.

It is predictable that the working conditions of labour will become more adverse because, on the one hand, the ideology of "a minimal government and a free market" forcefully discourages labour protection, and on the other, privatization will further create a large group of vulnerable labour.

The community organizing campaign is an attempt to response to the particular adverse situation of the most vulnerable workers. By solicit support from boarder social forces in the community as well as in larger society, marginal workers such as SCCW are able to have a better position to bargain with employers.

With the accelerating pace of privatization in public services, the interests among SCCW, residents and even government employees will be interwoven. For instance, the welfare of public housing residents will be endangered if the divestment of retails and car parking facilities is materialized and being owned and run by the private sector. The employment right of government employees will also be affected because their jobs should be endangered by the privatization. All these show that the lower class people do share the same exploitation and suppression imposed by privatization. In this content, the alliance for protection of labor right and the campaign against privatization will be broader.

8/2005



[落區故事]

# 不要在晴朗的一天出發了，就由今天出發！

中大基層關注組與香港婦女勞工協會合作落區，最初為沙士後的清潔工友打氣(2002年)、到進行全港調查，與清潔工一起打了一場最低工資保障的勝仗(2005年)，幾年來參與同學逾百。期間，同學寫下了不少感受。謹將我們的感受與大家分享！

## 一、黃大仙下村工潮 (阿米)

肺炎陰影下，傳媒只顧報導幾個殉職醫生，卻好像忽略了其他同樣在肺炎威脅下的基層工人……

### 1. 從一次記者追訪開始

在非典肺炎事件初期，有記者要追訪學生探訪清潔工派平安包的好人好事。終於由中大基層關注組三俊男(Walker、和平、德田Anthony)出馬，與幾位清潔工友的小女兒分頭探工友，首站是黃大仙下村。就是這次探訪交談打開了工友與工會的接觸。在第二日工會收到工友的電話：清潔公司在5月30日約滿，工友希望工會幫手。

## 2. 認識最年輕的清潔工友

介入工潮就需要密切的探訪，最好能接觸所有的清潔工友了解工友所關注問題，於是，早上8點、下午4時、晚上8時，你都有機會在黃大仙遇見我們！也就是這樣，我們認識了阿花(假名)，是我們所認識的最年輕的清潔工友。我猜想阿花是新移民，人很爽朗、反應頗快。她和其他工友一樣在清潔公司做了三年，根據法例超過兩年公司結束合約是可以取遣散的，不過要扣回公司供款的強積金部份。

遣散費是每年年資計三分之二月薪，做了三年的工友， $(3 \text{年年資} \times \text{人工} 000 \times 2/3)$ 的計法等於要補兩個月人工(8000)。但公司要替這批工友供強積金(每月5%)，而強積金可以替代遣散費的。於是阿花如果可得遣散費，最終落袋只有八百元，條數是：遣散8000減強積金 $(4000 \times 5\% \times 3 \text{年} = 200)$ 。

很多工友和阿花一樣，如果扣了強積金只得賠幾百，爭取的動力是影響了，但對他們來說有得賠也好過無呀！於是一齊開會、一齊聯署信給公司、一齊約公司開會……也是有的行動。

### 3. 遇上宿敵

清潔商會主席、清潔公司小集團阿頭這位清潔商會主席、清潔公司小集團阿頭，我們以前交過手，房署內談判過、勞工處對質過、最後上過勞審處。所以公司對法官會關注甚麼、甚麼法例觀點有利、必要做過甚麼步驟……等都識得下。因為他的家族成員分別擁有幾間清潔公司(形成小集團)，所以他的影響力也不少。不過唯一一樣是公司會忌工會幾分，就是他知我們還會做很多他估不到又會影響他日後投標的事(例如不單組織工友去爭取、還有傳



媒、房署、議員、村管會、其他村、政府……)。

#### 4. 工友的三座大山：公司心理戰、經濟壓力、對法例和工會信心不足

根據法例如果公司在附近地區能安排工友新工作，那就不用賠償，但公司最近的屋村要到麗閣村，那裏有我們認識的工友，知道無崗位。所以只要工友不簽名自動離職，公司最終要賠遣散。而誘迫工友簽自動離職書是公司最落力做的手段。試過有工友不簽名，管工一整個下午跟著他工作煩到工友簽名；也有工友在一小時內收到管工二十多個電話……。就在最後一個星期，不少工友受不住煩氣，(包括阿花)也簽了離職書！我們差不多每個星期和工友開會商討對策——如何堅持不簽名，也試過寫信給公司反駁離職，共認識的33位工友中，到五月底堅持無簽名的大約有一半人。一直出手的都是管工，但到最後一日，大老闆出現。我們其實預算了與工友一起入去跟公司談判，但到公司時被大家姐請走！這位大家姐也是追討賠償的，他只是怕公司誤會工會是由他叫來的，所以“請”我們離開！於是跟商會主席這回緣慳一面。他在公司內游說工友，我們在公司外守著工友，間中有工友來傾幾句。

公司話不簽名不出糧、公司話肯用車接送工友去開工、公司話無工開也照出糧給工友、公司話工友嫌遠就簽名離職……。大老闆落力游說下，又有些工友簽名離職。那時刻教工友不簽名的其中一個策略是靜靜走了，不用聽老闆講野。

原擔心工友因少賠償未必肯上勞工處追討，最終在6月8日(出糧日)公司自動賠償遣散，因之前公司手腳現就賠少了三分二工友，也不用上勞工處！可得賠償的是那些堅持不簽名、還有一批是簽名“跟”公司走但公司無安排的。

#### 5. 結果之後，還不能放過的是……

之後大部份工友失業了。因為新公司原來以一半投標價取得新合約，(據工友情報以前x記投標是40多萬、現x發是20萬投標)，於是新公司要以一半人工招聘舊工友，又或人工變相增加一半但工作量加兩倍半。舊工友都覺做唔過。

#### 6. 後記

在工潮期間，與理工、樂施會曾兩次約見房署署長和房委會委員，曾收到回

應話不會越判越低價！於是黃大仙例子正好打政府一巴掌！

新一批工友開工了，以大家最熟悉和常探訪的倒樓工作為例，現在在新公司安排下要包括：掃天台、洗每層垃圾房、洗每層垃圾桶、抹電梯、抹每層走廊窗、抹樓梯扶手、上二樓掃簷蓬、通坑渠、洗垃圾房連桶、抹樓下大堂、搬該座雜物……總之是該座的就全歸倒樓工友管。

工會打算鼓勵工友上房署或政府總部，正要與工友商量，到時又要各位好人好姐參與支援了。另外……

落區組努力呀！可能很多工潮等著我們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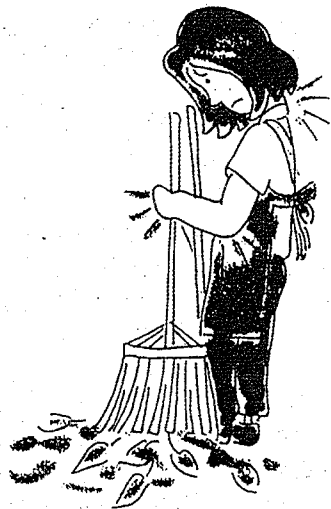


## 二、禾輦清潔工的故事 (Walker)

第一次到禾輦政府宿舍探訪清潔工是十二月十二日晚上，去的還有居樂及和平。他們早前也來過一次，知道這裡有幾位工友給上一手的外判公司拖欠薪金和譴散費，和女工會討論過情況，所以特別來進一步了解一下，看看有甚麼能做的。天黑黑的，甚麼也看不清楚，大概是五、六座約十層高的宿舍吧，據工友說，一座大約二百多戶，每座只有一位工友倒樓，還有兩三人是掃地面的，大概這兒總共有七、八位工友吧。

我們走到一座宿舍的暗處，大概垃圾房都是在這樣的地方吧。我們看到一間狹小的垃圾房透出了亮光，立時有些緊張，也有些興奮（找到了！）。自我介紹之後，開始問這位工友是否知道關於欠薪的事。這位工友看來很年輕，大約三十多歲吧（不知後來誰說：「佢都幾靚……」），她說自己是新來做的，燕姐和鍾媽才真的給害得慘呢！她嘗試打電話幫我們聯絡鍾媽：「鍾媽有一位弱智的兒子，以往是兩人一起掃地面的，兩人共欠了萬多元呀，你們幫到就幫下佢啦！」後來我們知道，新來的公司沒有再聘請鍾媽的兒子。「新公司揀人呀！」鍾媽無奈地說，但看上去廿多三十歲的鍾仔仍然協助媽媽工作，我們在討論問題的時候，他忙著給我們搬椅子。不過，這晚我們沒見到鍾媽母子，她們放工吃飯去了，於是工友著我們去轉角的大垃圾房找燕姐去。

燕姐在這兒工作已經二十多年了，原來廿多年從來沒有甚麼團體呀義工呀去探過她們。她們去年舊外判公司走的時候欠了她們最後一兩個月人工，舊公司臨走前的半年，經常拖欠薪金，要她們每次去投訴才出糧。後來我們約了所有欠薪的工友開會時知道，最後一個月公司原來開了空頭支票給她們，她們追了大半年都沒有結果，還給舊主管罵。她們試過去勞工處，但去的時候勞工處說她們太遲去，沒有給她們登記和跟進。事實是，欠薪過了多久都可以追討的，「都是血汗錢呀！」燕姐說，「錢不是很多，但工作了就得有工資！若不去追討的話他們倒會更得意，一定要教訓一下他們。」我們跟她說可能需要幾個月和花一些時間去追，這是她給我們的回應。臨走的時候，我們也問候一下她身體有沒有疼痛或者工傷，她說工傷沒試過，但不知是不是因為工作關係，五隻手指現在不能伸直了，看了醫生吃了葯就沒那麼痛。在漆黑的垃圾房門外，擺著滿滿的境坡車旁，我看著她黝黑不能伸直的手，忽然不知道該說甚麼，仿佛這雙手訴說了廿多年來拉垃圾車撿垃圾的所累積的辛勞。



### 三、記幾段令我感受很深的片段（和平）

據說，為了使其他同學，尤其是想了解清潔工的同學，對我們數個月來的落區工作有一定的了解，所以我應要寫點東西。我只集中寫幾段對我感受很深的片段。

我記得有一次落區訪問一位阿姐，她因住在較遠的地方，每天朝早六點便要上班，到晚上十一點才收工，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連一天的假期也沒有。這種生活，完全超出我的想像範圍以外。我記得我中五時曾在工廠做過暑期工，工作雖然非常艱苦沉悶兼異化（我的工作是不斷把一枝枝蠟燭裝進一個個盒子裡），但我總可以盼望每一天的放工，每個星期日的假期。我亦知道我工作只是一種手段（讓我有錢去玩的手段）。但我可以想像那位阿姐，她的生活除了工作外，其餘的時間就可能只剩下吃飯的睡覺，那不是很像反過來生存只是作為工作的手段嗎？當我把這次的經歷說給我的一個同學聽後，他驚訝地說：這簡直是奴隸！我所讀過的有關什麼剝削理論，現在真是活現眼前了。但給我最大衝擊的是，這位阿姐雖然表示工作辛苦，但對生活對前境算是十分樂觀開朗，使我驚覺到或許我以前給了太多清潔工“慘慘慘”的投射，把清潔工（甚至其他低收入社群）視為十分被動，十分無助的一群，落區“幫忙”清潔工固然是好，但把彼此關係看得太過單向，更很難避免變得自以為是了。

第二件事是，有一次，有一位同學為了要做一個非常厲害的東西，想我從禾輦帶一個垃圾籬回中大，由於垃圾籬上不了巴士以及校巴，所以我由拿著垃圾籬由禾輦村行去火車站，到了大學站再拿上小賣部，路程不算真的太長。雖然我較瘦，但也是手有縛雞之力（人稱黃大力就是在下），怎知做完這個垃圾籬運輸工人後，我的手接連三天也很痛。這件事一方面故然反映了有同學應請我食飯，但更重要的是，可以想像，對於一位手裁比我矮小，年紀比我大的阿哥阿姐來說，清潔的工作對他們做成如何的身體勞損。工作坊那份先前覺得有麻煩，關於職業安全的問卷，忽然地感到是如何的切身。

第三件事（其實應是數件事）是，當我自己讀到有關團結工人的理論時，常會讀到因為工人階級看不到自身與資本家的矛盾，因此知識份子的責任，就是鼓勵工人，讓他們看到自身真正利益所在。然而，在我數次落區中，我經常能從工人口中聽到他們對老闆的種種不滿，老闆對他們的種種不公平。然而，他們

不去對抗老闆，卻是出於一些更實際的問題，有些因為不想丟掉飯碗，有些沒要煮飯湊仔，沒有時間，有些不懂得有什麼途徑可以去對抗，更有些可能因為工友自己某些私人的不和，以致到不能團結。這使我感受到，要修練處理上述種種問題的技巧，要去明白實際工人要去為自己謀幸福時的所遇到的種種問題，就不能只拿著書本自我冥想，而是要透過自身的實踐與參與。

看到這裡，大家當然明白這篇文章的目的是鼓勵大家參與工作坊，知識如不經過實踐的深化，我相信永遠只能是死的知識，同志們，Hey a Hey a Hey a，Hey a Hey，團結一心有新轉機，那怕是萬尺風浪，都可挽手衝天飛……

#### 四、初次落區——惡劣工作環境和剝削慘況令我震驚 (亞美)

落區工作是什麼？其實沒有什麼概念，第一次接觸是朋友的分享，他曾於非典肆虐期間參與派口罩行動，又曾探訪清潔工，每當提及清潔工的狀況，他都表現得十分無奈，適逢這次朋友提出邀請，我也想嘗試親身去接觸，看看事實。

朋友在未開始就為我做好心理建設，說垃圾房裡如何的臭，垃圾槽如何危險，叫我小心，更慎重其事的問我是否怕蟑螂和老鼠，雖然心裡有點不太舒服的感覺，但口中當然說不怕。只是，情況是怎樣？即使再多的提醒，真實的畫面還是難以想像的。

這天去的是黃大仙下村，與同伴在幾棟樓來回走了幾次，都未見到清潔工，他說這是正常，因為此時，他們大多數都在進行「倒樓」工作。朋友口中的「倒樓」過程令我驚訝，原來垃圾是這樣處理的，由三十多層高的樓房上的一道槽，向地下的垃圾房傾倒，衝力大得可怖。而且三十多層的清潔工作竟然只由一個

人負責，這是我之前完全沒想到的，即使是朋友親眼目睹後的描述，驟耳聽來仍有點不真實的感覺，到底這是什麼工作來的？

我們走進第一間垃圾房，迎面而來的是一股惡臭，加上又濕又熱，即時感到胃氣翻騰，有點想嘔吐的感覺，即使之前已做了心理準備，還是有不大舒服的感覺。正當我強忍著希望表現得自然些時，砰砰砰，突如其來的幾聲巨大的撞擊聲，把我嚇了一跳，這就是垃圾槽，一個約一平方大的缺口，下方擺放著垃圾筒，一袋不知是什麼的垃圾，掉下來，可能從十五樓，也可能是從三十樓掉落的，飛濺出一些東西，也不知是什麼。清潔工走出來，光著的上身，滿是汗，我只在想他怎能忍受得住這個環境，但事實上他每天都在這樣的環境下工作。

走出來後，同伴說，那個垃圾槽的情況不算差，很多時候，飛濺出來的，可能是玻璃或鐵之類的硬物，會造成他們很多的身體損傷。其後，在榮禧樓等待該座大廈的清潔工時，垃圾槽內傳出一些類似鐵枝撞擊的聲響，真的很震撼，他們的工作有多危險不難想像。



這次落區接觸清潔工，他們的惡劣的工作環境和被剝削的慘況實在令我震驚，但是感受最深的，卻是清潔工對這些境況的回應和聽到他們的一些「小糾紛」。同伴說這個區的清潔工的不滿反應，比他早前遇到的都激烈。這次是我的第一次接觸，無法作比較，只是，他們在表達不滿憤怒時都對工會（至少我們掛名是工會的義工）有一份信任。有一名清潔工更拿出身份證，給我們抄下名字作聯絡之用，雖然事後她亦有擔心，並致電工會人員確定我們的身份，但是她當時直接的反應可見她的信任；另外還有一個清潔工表示曾想過去工會求助，但是不知怎樣去，最後作罷。

[落區故事] 不要在晴朗的一天出發了，就由今天出發！

還有一些關於他們的「糾紛」，例如其中一棟樓的互助委員會與清潔工之間的糾紛。互助委員會主席因美觀理由，堅持拒絕在大堂擺放垃圾桶，使清潔工的工作量增加了，最後清潔工幾經交涉無效，憤而辭職。在失業情況如此嚴重的時候，她仍選擇辭工，可見在她對給額外加上的沉重的工作的憤懣。

另一次聽到的則是保安管理員與清潔工之間的糾紛，保安員以惡劣語氣指責清潔工人的工作做得很慢，並不體諒她在工作量大增之後的苦況。雖然保安員和清潔工都屬於社會上低收入、被剝削得最嚴重的工人，但他們卻並沒有團結起來，反而是互不相滿。清潔工人組織的工會，可能因為大家都了解對方的處境，故團結起來以集體行動的方式去爭取自己的權益的機會較大。但同屬基層卻處於不同工作崗位的人（例如管理員）呢？他們可能由於工作的關係需要壓迫其他的基層工人，到底需要什麼力量才有機會將他們團結起來爭取更合理的待遇？

## 五、秀茂坪落區小記——“無奈”成為應付的策略 (亞堂)

今晚人丁單薄，只得積奇，阿淦和我到秀茂坪村探訪清潔工友。

在大垃圾房遇到兩名分屬兩種大廈的女工友，年約三四十歲，一個人負責整幢四十層樓宇，月薪三千七百，假期都算齊，清潔公司叫x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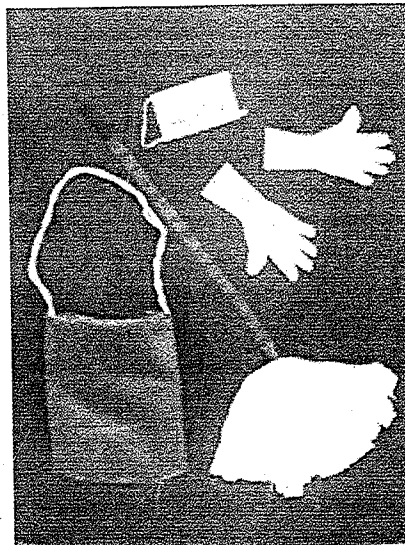
言談間少不免提到工作的辛勞，但辛勞於他們來說似乎已成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語氣只有無奈，並無抱怨，或許這正是社會不知不覺加諸於他們身上的枷鎖：低薪，高工作量，缺乏保障。但是這些問題對清潔工友來說都不算得是甚麼，勞動市場的不公義，不平等也覺得是理所當然——無奈地接受成了

唯一應付的策略。

在沙士的期間她們對區內的議員和居民有所不滿。居民對社區衛生的要求在議員的協助下獲得充分滿足，另一邊廂卻又不盡其保持環境清潔的義務，結果當然是令清潔工友的工作百上加斤，工友與居民之間的隔閡在這情勢下非常明顯，看來要在社區建立對清潔工身份的認同仍然有一定阻力——既要在居民與工友之間建立互信，也要消除工友本身認為自己低人一等的心態。

公司提供的口罩依舊不足，不夠的當然要自掏腰包購買。唯一比較好的是公司半年來都沒有減人工（我想再減的話工友也生活不了吧！單是公屋租金已二千多元！）。假期似乎都放齊。當我認為假期方面已十分不錯的時候，身旁的淦哥提醒我這成本其實已經在三千七百元月薪中計算了，我不禁問自己到底將合理工資標準定在哪裡？是否只因為其他工友被剝削得更嚴重才覺得這種假期待遇已十分不錯？還是我對這種勞動市場的不公義，不平等也覺得是理所當然？

工友對外判商壓低人工的事並非無知。其中一位做了十多年屋村清潔的工友表示，以往在藍田工作月薪也有六千多元，在多次外判合約及轉到新屋村工作後，現在只剩下三千七——由六千減到五千，五千減到四千，四千減到三千七，工友確實感觸良多。「你唔做大把人爭住做！」這個市場定律她比我這個主修經濟的學生還要熟悉、體會還要深刻。所以不能怪她每當我們提到工會時，她都不禁皺起眉頭，因為怕的是失去僅有的工作。值得欣慰的是工會的工作也受到工友的認同，畢竟工友勢孤力弱，工作時面對的冤屈氣往往只能啞忍。故此工會的喉舌作用工友們亦十分受落。但與工友組織起來進行抗爭卻仍有一段距離。



## 六、今天很不開心 (elaine)

今天和彩虹的工友到房署總部請願，房署只派出一名保安人員出來接信。本來連站近橫額也不敢的工友也憤怒了，很大聲的說「是否看不起我們清潔工人」。

權貴的麻木不仁、對工友的漠視及不肖，實也令人心痛及難受。彩虹村的工友本來是很怕事的，以往見到工會的義工會會加快跑走。很難得她們肯走出來，今次她們不純是為了自己利益的.....

其中有一位工友，公司已答應賠長期服務金給她，共萬幾二萬元，但她仍堅持要去追公司假期錢，這等如把那萬幾元押下去賭一次。她說「做事要做到底，不可半途而廢」。也有兩個工友，公司說給萬幾元和解金，我們本以為她們會放棄追討的(若我是她我一定不會去追的).....但她們也堅持.....

彩虹的工友以前很怕管工的，但上次開會，竟然說「管工和工友也是一樣，也是這一份人工，不用怕他」。

今天(近來)經常想起「尊嚴」兩字。

其實工友真的很老實及純品，只要你尊重她一點，對她禮貌一點，或是讚賞她一下，令工友「順番條氣」，她便可以為你「賣命」。但偏偏很多老闆/官員也是麻木不仁.....今天很不開心.....

(幾天後.....今天出彩虹)

上星期五彩虹的工友、基關組的同學及清潔工會到房署總部請願，抗議清潔公司欺騙及強迫工友簽署放假證明及自願離職書。雖然當天房署沒有派出與物業管理相關的人員出來接信(原來這是房署的習慣，很多團體去請願，它也只派保安接信)，但我們與工友的努力是沒有白費的.....

以下是彩虹事件的新進展：

1. 有四五份報章報導了該天行動
2. 白田、樂富、石硤尾及彩虹的地區房署已經接觸我們
3. 勞工處已經著手調查白田村工友沒有假放的事，已有數位工友表示會作証

4. 舊公司知道事情的嚴重性，主動找工友和解，但仍堅持只肯賠償原先約一成的假期錢，遣散費也不會賠.....大部分工友不肯接受這賠償，公司說再考慮提高賠償金
5. 在這些彩虹工友的示範作用下，有一批原先沒有追錢的彩虹工友，主動找工會協助追討利興
6. 樂富村以前的公司也是利興，有六位工友決定向利興追番遣散費
7. 我們現正約房署總部開會，討論中央巡查、工友被迫簽名等一大堆問題  
我們的努力是不會白費的唷.....

## 七、落區感愛--不要在晴朗的一天出發了，就由今天出發吧 (達初)

記得我第一次落區是5月的事，想不到9月就要開始帶新同學落區。坦白講，可能出於自己的偏心，所以很多時都只能顧及向社工系的同學宣傳。以我對社工系學生文化的了解，我們在yr1入學初期都會非常積極參與不同的「義工活動」，以增加自己的見聞，並提昇將來工作的本錢，所以我們很多時都會為了知多d野、取多d經驗而參加活動。這是我在向社工系同學宣傳時的憂慮。

雖然同學出席基關組活動的人數好像不斷遞減，其實這是可以預計的。或許我都不期望每次活動的出席人數都爆晒棚，但我卻樂於見到新同學由最初完全不認識清潔行業，直至現在會反思存在的東西未必合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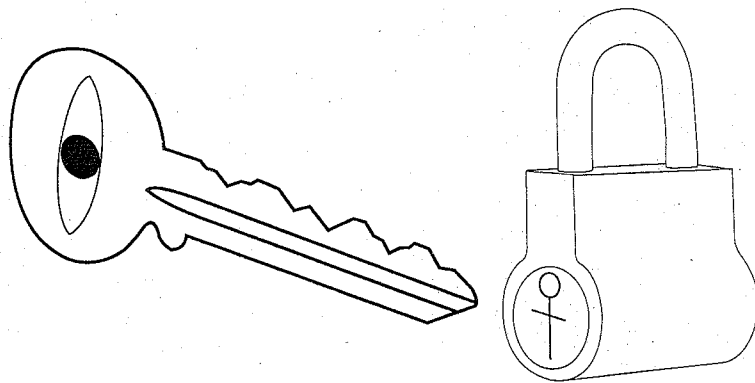
由學生訪問清潔工的確有好處有難處，好處在於我們的學生身份，令工友更會信任我們；但同時，我們是否真的了解他們的處境？我覺得自己尚未可以和他们建立關係，可能因為每次見到的工友都不同啦。但的確，我們的其中一個身份是大學生，許多人都覺得我們和他們好像大攞扯不上，沒有一個大學生想做清潔工人，這份被視為低下、骯髒的工作。許多「道理」告訴我們低薪工作是

【落區故事】不要在晴朗的一天出發了，就由今天出發！

婦女與貧窮

自然現象，但今天工友除了繼續忍受低薪外，他們還有其他選擇嘛？他們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嗎？但或許在爭取最低工資的同時，我們是否都應該從他們作為人的尊嚴設想呢？這涉及我們怎樣看待不同職業的價值，我們是否會接受一些人以「淪落到做掃街佬」來勸小朋友努力讀書？在落區的過程中，我看到絕對有必要和他們爭取合理的工人福利，但同時我認識到他們的故事，有的家人有病、有的家人失業……。不是要標籤他們，而是他們給我看到在香港繁榮的背後，原來有很多人犧牲了休息時間、應有的工資為我們服務，但他們都被隱蔽了。一個個生活艱辛的故事，展現了他們的生命力，如果他們不能失去這份工作，他們還有背上的家人要照顧，他們對工資絕不是貪得無厭。有時想，當清潔工會否為他們帶來心理上的負擔？別人、親戚會怎看他們？整個社會文化其實都在歧視這些最基層的工作！或許在資本主義社會裡，人們只看到清潔工的交換價值，而看不到他們和醫生、律師的使用價值可以是相等的。

為要保持清潔工友的尊嚴、為要保障他們的基本福利，不要在晴朗的一天出發了，就由今天出發吧。



「工廠·廚房·垃圾房」

# 運動與分析

——香港女工十五年——

女性主義與基層	108
自我弱化與充權	110
女性經濟自主	113
全球化下女性生存空間	116
建立基層婦女運動：介紹hooks	123
游走婦運與工運之間	131
性別、勞動、族群與資本外移	138
女工運動發展	154
一學生與基層	166
香港合作社運動考察	169



## 女性主義運動與基層參與

撰文：阿古

香港的婦女團體對於是否應讓男性參與沒有爭論，甚至也有男性參與團體核心組織；因為在本土女性主義分析中，男性在“男性主導”的社會中也是“受害者”，男性也備受“男強女弱”的角色要求所害。所以，爭取性別平等，不在乎是男人還是女人這一生理性別，只要求“有性別意識的自覺”。

對參與婦女運動的男性，是要求能省察自己在兩性角色差異所獲得的優越位置、要學習理解被社會評為太瑣碎的所謂女人生活……、甚或也要求習慣好辯要強的男性在討論中少一點發言，因為女性在社會訓練中這方面比較弱，需要多點空間去實踐……。很多男性認同這種分析，所以婦女運動不乏男性支持者。

反而，現時的女性主義運動最缺乏的是“基層”的參與。

活躍的婦女團體，近年爭取的包括婦女事務委員會、平機會、消除歧視公約、性別觀點主流化……等被稱為全港性的“大政策”問題；基層婦女無興趣參與，粗略有幾種分析，一種認為議題太“離身”，與基層生活沒有直接相關；第二種認為關心基層婦女權益的團體，埋頭為婦女爭取切身利益，無力提昇婦女政治水平；第三種認為婦女團體“非政治化”情況嚴重、團體本身不想涉政治問題，以致難發動婦女關注。

如果這些講法都是真的話，該如何面對？女性主義者要做些甚麼？

有人提出基層需要“提昇”，女性主義者要協助基層團體做多些宣傳教育工作，而關注基層婦女權益的團體也要提昇、要有政治視野，多參與爭取政制民主（甚至應參政）等。

在基層團體中工作，對於提昇，並不反對，更認為這是每個人都應該做的。所以對於知識份子女性主義者，我是覺得，因為缺乏一種基層視野，所用的是



西方的女性主義理論，在本土的爭取議題上結合不到基層婦女生活；所以需要提昇一種階級分析。不過我的這種講法並未找志同道合的女性主義者；因階級進步並不表示就有兩性平等意識（如工會頭頭並不支持婦女權益等）。也有人認為社會改革的力量並不一定來自基層，婦女運動的方向現在是爭取政治勢力，在更高層次中推動爭取婦女議題……。更有人認為階級理論分化女性（姊妹情誼）的團結……。

無疑，在女性主義提昇階級分析能否推動基層婦女的參與，是未可知的。但是我總覺得不可迴避現時不少女性主義者都是中產婦女、知識份子這一事實；而且婦女運動不應忽略基層婦女的力量的重要性。

與主流女性主義者的種種「分歧」，成為我參與基層女性主義學習組的動機。





## “自我弱化與充權

### --談“弱勢社群”的稱謂

撰文：司徒米

跟一個資深婦女工作者討論到婦女作為“弱勢社群”的問題時，他一臉不悅，他很不想我用“弱勢”兩字，“女人並不是弱者，女人能力很高的”他和我爭辯，認為我用“弱勢”是標籤婦女、甚至有睇少婦女……。心裏閃過一句“好中產自由主義腳”的話！

我爭辯認為是社會處境對婦女不利，地位、地勢都弱，結果之後我仍會用“弱勢”兩個字，不過很小心，多數是文字上，對著具體的婦女，我還是避免的，一來太唔好聽也不順口，說時要加解釋的倒不如用通俗的形容算了，同時也的確因為覺得會是標籤。

“讓婦女推銷悲慘形象搏取同情！”

這種情況應該常見於傳媒，“清潔廁所七蚊一個鐘！”、“受虐離婚婦女無安置被迫與施虐前夫同住！”……。記者常要找慘情的故事，動機是要煽情多過真正的關心同情。試過有女工接受訪問後，那記者很感慨不停向那女工說你真慘啊，那女工不明但感覺不舒服，佢話“我都唔覺得慘，做乜講到我咁，我唔想俾人話我慘”。自此，每有記者訪問，必先聲明，要找悲慘故事免問，因為大多女工都唔想“被”可憐。當然自此很少見報，要推動的議題也少人知。我有時也覺無奈，沒有煽情的故事加上不出名的團體，即使幾十人行動都吸引不到一個記者，是我們的經歷，但“傳媒是要教的”是一位朋友說得最合心意的一句。

還有以下其他的故事：

某朋友做店員，店由復康團體培訓復康人士來承辦。但顧客不知店的來頭，



因為他們有意迴避不想人知，甚麼殘障、康復者也要發展空間的議題更不會在這裏提，因為他們有意隱瞞不想別人知，他們要證明：我唔講你不知我和你的分別，證明“復康了的”我”都有能力不用你來同情……。

有女工五十歲離婚又失業而又未有新單位（即每日返去舊居和丈夫一齊），每次來到都呻到樹葉落晒，將自己的不幸放大幾十倍，有時會比較其他女工硬要說他最慘，其實他真的需要同情、關心和幫助，事實我對他的幫助很少，我只能盡力告訴他“你不是咁慘我也會幫你和關心你，只要你覺得你想……其實你唔係最慘……”。

我是真心的覺得他不是最慘，但我相信自己不是因為佢唔夠慘所以幫唔到佢。我絕少跟慘情故事中的婦女一起傷心或哭起來。其實在那刻我好大壓力，曾令我疑問點解我無投入到去呢？我冷靜還是冷血呢？後來我知我也感情豐富的，我也會喊和痛哭，不過仍然不是那些慘情故事。能觸動每個人心扉的不一定是最慘，更多時是那些能令人鼓動、激昂、激憤、情感澎湃的……。

不過有外地團體、交流團等探訪時，我這個工作員就不遺餘力的抹黑香港繁榮、努力展示推銷女工的最差處境、最惡劣條件、最不公平、被忽略、被壓迫的一面。點解？可能那時我不是對著實在站在面前的“好慘”的女工，而是向“外人”肆無忌憚地描劃我眼中的香港女工處境。有分別嗎？有的，我想。

一個離開受虐的、不開心婚姻的婦女，要面對的生活難題真的不少，那些婦女向傳媒訴說的悲慘經歷故事，我覺得當中有幾多其實是述說著或投射著現在艱苦的生活。逃不出的不是過去而是當下的惡夢。離開不如意的處境不可以輕鬆嗎？恐怕是離婚後生活的困境和壓迫才更令人為婚姻的破碎而深感不幸。既然悲慟是來自“現在”，那麼現在如果能有力量或勇氣支撐著去面對和承擔當下的艱難，婦女的悲慘心境是否可以減輕呢。要承受起這刻的不幸所需要的力量來自何方？不斷對過去的不幸放大控訴、對現況不公的申訴指責，是將自己置於一種“被動”“受害”的位置。從實效角度來審視結果，那個婦女多數會得到比較可接受的安排，不過，被動受害的位置還是被動受害。

可以唔係如此的。

一個工人指控老闆時不一定話自己好慘也可以理直氣壯，因為他隨時搬出“老闆剝削我！”就無人反對，即使面對一個好人老闆，剝削關係還是存在



的，還是老闆對工人不公平。因為老馬(馬克斯)的理論大，工人爭取權益時，總算有個強勁後台(當然要你真的信佢)，有個龐大的分析理論。但我們女性主義在現在香港就唔夠力水，婦女爭取權益時，性別關係不公平、恐怕連婦女自己也不夠說服，更有很多團體中人也質疑；如何能足以支持婦女理直氣壯、不用賣慘去提出訴求？！

最後，以雄仔叔叔的一句話作為互勉！

“我……寧願見到你的‘失敗’，也不想見到你只滿足於一些你本來就可以做到的……”

# 女性經濟自主與生存空間 ——女工角度

杜潔麗

(轉載自：新婦女協進會2001年《差異與平等——香港婦女運動的新挑戰》)

要談經濟自主，必先說經濟來源，無錢又何來自主？近年女工的生活狀況每況愈下，女工失業持續，經濟能力減弱，連帶社會地位、家庭關係和個人自信也受挫。勞動市場就業機會很缺乏，即使女工努力參與再培訓或嘗試新工種，結果是無論在任何行業，中年女工都只能找到低工資，低技術的工作，更有一批工作長期不穩定或持續失業。全球一體化下，女工的就業空間變得更加狹窄，從事非固定工作 (irregular work) 的女工愈來愈多，例如做兼職、散工、合約工、外判工等，都是工資低、不穩定、無保障的工作。收入不穩加上在市場上的議價能力低，不少女工都生活在失業的惶恐中。



一批工作長期不穩定或持續失業。全球一體化下，女工的就業空間變得更加狹窄，從事非固定工作 (irregular work) 的女工愈來愈多，例如做兼職、散工、合約工、外判工等，都是工資低、不穩定、無保障的工作。收入不穩加上在市場上的議價能力低，不少女工都生活在失業的惶恐中。

「工廠·廚房·垃圾房·……——香港女工十五年」



除了就業上的經濟來源大幅下降外，已婚女工的另一經濟來源——家用——的情況就更惡劣。丈夫沒有工作、收入不穩的時候，整個家庭的經濟壓力就落在婦女身上。做丈夫的不願做低收入的邊緣工作如倒垃圾、洗碗、清潔工等，做妻子的就不得不從事這類工作來維持家計。對這些女性來說，除了養家還要照顧家人和丈夫的情緒和需要，試問何來「空間」可言？

女工協會曾經嘗試用合作社的形式，希望能為女工創造就業機會，但在缺乏經濟支援下，始終未能為女工提供全職或半職的工作作為養活生計的出路。雖然合作社仍可以給予失業女工自尊和精神上的支持，但卻未能減輕她們的生活壓力，而合作社在現時的环境下，生存空間亦非常有限，往往要依賴團體的支援才可維持下去。

除了以上的困難外，由於女工缺乏議價能力，很多勞資問題出現，如懷孕被解僱、不合理的解僱、更改合約、加工時、減工資等的情況更見普遍。對低收入和失業女工而言，女性的經濟自主談何容易！面對如此困局，實在需要就著現時的情況作一些策略性的考慮，以下就此作一些總結：

### （一）確立對邊緣女工身份及處境的理解

面對全球化的影響，邊緣女工不再是一班過渡的群體，中年女工所面對的問題如長期失業、工作不穩、缺乏保障、雜散工種已令她們成為一個特定的社群，而有關她們處境的分析有待整理和建立。女工亦需要將自己的身份在社會上確立並意識到問題與全球化的關係，瞭解這經濟體系如何影響她們的就業處境和如何將工人分化，特別是導致本地勞工和外勞以及新移民的對立問題。

### （二）建立邊緣女工的社群生活

在確立身份的同時，要找出邊緣女工間的差異和她們的共同需要，將她們連結起來，求同存異。雖然邊緣女工有不同的就業情況，面對不同的問題，但她們都是生活在很不穩定的處境中。故此，她們共通的問題就是就業機會、勞工法例的保障、社會保險制度如老年退休保障、醫療、失業援助、培訓機會及資助等。把邊緣女工的社群連結起來，建立交流和支援的網絡，透過瞭解彼此的生活處境，找尋共同的關注點，利用多元化的方法如戲劇工作坊，將邊緣女工的共同處境表達出來，建立邊緣女工的文化和互相支援，這種組織方式是可行的。

### （三）培育團結的基礎，找出連結的空間，爭取政府的承擔

團結力量、爭取權益——說時容易做時難；但在全球化的形勢下，確實有需要探討新的策略。現在老闆可以在不知不覺間逃去無蹤，或者利用外判、遷移資金、承包、合約制等方法擺脫對僱員應負的責任。在這形勢下，誰來承擔對工人的保障？女工在現時的處境中缺乏工作和生活上的保障，爭取設立一些中央機制來保障女工的生活和就業權是必須的。因此，在邊緣女工共同關注的議題上團結起來並建立邊緣女工聯盟，作為爭取全面保障的力量是很重要的一環。然而，要團結各種邊緣女工，先要打破彼此間的差異和矛盾，並且要衝破婦女因缺乏議價能力所面對的種種限制。



# 全球化之下的女性生存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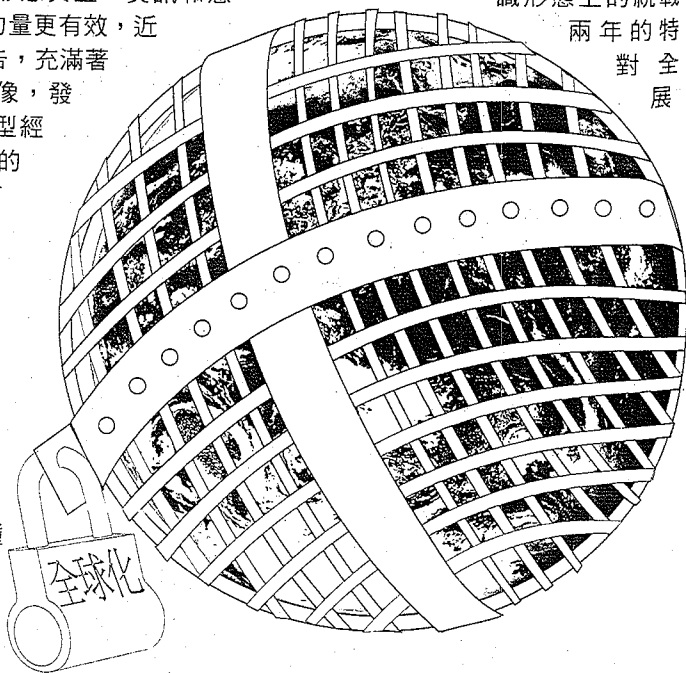
撰文：潘藝

(轉載自：新婦女協進會2001年  
《差異與平等—香港婦女運動的新挑戰》)

## 前言

全球化不單是一種政治經濟，更是一種西方主導的意識形態。它代表著一股新自由主義的力量迅速地影響著各地的統治策略和經濟運作模式。二十世紀末的網絡革命不單加速了資訊社會的來臨，更導致一種西方主導的意識形態能更快速地跨越地域的滲透。全球化是一種新的殖民主義，是西方在後殖民主義時代建立的一種新統合策略。全球化蔓延於九十年代，它剛好填補了本港後過渡時期的意識形態真空。資訊和意

識形態上的統戰  
比武力和經濟力量更有效，近  
兩年特  
區政府施政報告，充滿著  
對全  
展  
全球化城市的想像，發  
高科技和資訊型經  
濟更成為香港的主  
導思想。有  
形的殖民地統  
治者自九七  
年離去後，  
無形的殖民地  
者靜悄悄地  
進來，我們  
的社會要  
如何發展，  
已被暗地裡  
劃好了藍圖。  
在這種藍圖  
下，女性的



生存空間有多大？

香港在過去四十年內，無論在經濟、政治、文化上均經歷巨大的轉變，不少人相信工業化發展會使女性從傳統、家庭等束縛中釋放，透過教育和就業的參與，會使兩性關係更趨平等。經過七、八十年代工業發展，直至九十年代服務業成為經濟最重要一環，女性外出就業不斷增加，她們在經濟上能取得若干的回報，不再只擔當無酬的主婦工作，但她們的權力是否真的有所增加呢？男、女在就業上又是否平等？兩者在就業生涯上會否有不同的際遇？或許正當我們暗忖兩性在教育、就業上統計數字漸拉近時，香港社會正面對全球化急劇的衝擊，這使我們進一步問：在這個資訊科技爆炸的時代，性別角色是否有所改變？女性的生活空間是否在擴大？

全球化已經是不可逆轉的事實，無論願意與否，它已實實在在地影響香港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所謂經濟全球化是指全球經濟趨向一體化，市場成為資源分配的主要機制。新自由主義學者更認為全球經濟已經變成「無疆界的世界」，甚至宣稱「地域已死」。他們斷言在這無疆界的世界裡，市場取代國家成為唯一有效率和成效的經濟管治機制，國家與其限制資本在其市場的運作，不如積極改善營商環境，確保本地資金不外流和吸引外來投資，這才是促進經濟增長，保障人民生活的最佳辦法。

這種「小政府，大市場」的觀點是建基於「大市場」是一個完全自由競爭的市場的假設上。不少學者指出，市場化確實帶來競爭，但並不是所有企業均能直接參與和在其中生存。在汰弱留強的競爭中，規模宏大和科技先進的跨國企業成為最大的得益者，結果是全球市場化助長了資本高度集中。這不但削弱競爭，更導致小市場和非正規市場無法存在，而政府為了減少公共開支，亦會把各項公共服務私營化。

## 高度分化的社會

全球化的經濟體系鼓勵高度競爭和弱肉強食，恰好是本港經濟面對轉型的時刻。一方面是服務性行業向「高增值」、知識或資訊密集的經濟轉型；另一方面是勞動密集的製造業向南中國轉移。由於製造行業的勞工多是女性，她們屬



於低技術工人，根本無法轉變為適合資訊社會的高技術勞工，因而淪為服務性行業中更低技術和更廉價的勞動力。再加上近年勞工供應充足，僱主往往只給予很低的薪酬。更甚者，這些工作通常以散工、兼職或短期合約方式出現，而大多以招聘女性為主。

這種貧富兩極化的趨勢不禁使人認為後工業城市是一個「分割的城市」或「二元的城市」。當然在最高與最低的階層之間，還存在一個差異甚大的中間階層，他們在全球化下的境況各有不同。但總的來說，隨著企業競爭越來越激烈，企業都轉向利用資訊科技取代傳統的中層人員，在一片縮減規模和靈活管理的改革聲中，不少人均須面對轉合約制、裁員、超時工作和減薪的危機。在大多數中層人士面對工作不安定的情況下，低下層向上流動的機會變得越來越少，而他們的人數也不斷上升。

在工業城市中，非正規經濟一直是低下層的生活的最後防線。透過做不同類型的散件工作或小販等，他們也能在缺乏政府支援下勉強生活。可是這些空間因不斷受到政府和大型企業的打壓而變得越來越小。在政府「決心」整頓市容去體現全球大都會的發展，超級市場、連鎖店等大型零售企業一步步侵蝕這個非正規經濟之時，低下層的生活亦變得毫無保障。

因此，在全球化下的城市中，低下層勞工是被邊緣化的一群。政府可以大量投資在吸引外來資金和人才上，給他們各種有形或無形的利益，卻吝嗇給予低下層的生活保障。究竟後工業城市是誰的城市？究竟那些因經濟轉型而失業或開工不足的女性工人，和那些低工資的服務業工人是否城市的一員？為何他們空有公民的身分，卻被社會邊緣化，逐步喪失基本生活的公民權利？

## 性別與香港就業

回顧香港六十至八十年代工業化，大量婦女外出就業，婦女的經濟獨立被視為男女平等的一個重要指標。故此，引起了不少學者進行研究，以瞭解現代兩性地位的轉變。其中吳俊雄等（1993）指出，在香港工商業發達蓬勃的八十至九十年代，男女的勞動參與模式仍然出現頗大差異。男性由十五歲起勞動參與率開始飆升（見圖1），二十五至二十九歲時達到高峰，約97.3%就業，直至五十五歲才顯著下降。而女性則在二十五至二十九歲時達到高峰，但中年時便急速下跌，一般研究相信女性因婚姻及生育而退出勞動市場。而比對八十年代

的模式，一九九八年的女性在四十歲後的勞動參與率沒有回升，這可能歸因於勞動力需求的下降，香港生產工業北移，服務業僱主又未必願意僱用已婚的中年女性。女性縱使家庭條件許可，也未必能在勞動市場中謀得一份全職工作。因此，女性平均就業率仍普遍低於男性，兩性就業率較接近的年齡組別是二十四歲前的組別（吳俊雄等1993）。

此外，工作上呈性別隔離是另一個主要特徵。根據《香港婦女檔案》（吳俊雄等1993）的分析，兩性就業上出現性別「水平分隔」和「垂直分隔」。女性較多處於「外發工」和「無酬工」的工作類別，而男性則集中在「僱員」和「自僱」類別。在行業分類中，女性大量集中於製造業、批發、零售和服務業，尤其是文員；而男性的就業模式則相當分散，但其中的水電煤和建造業可說是「男性行業」，形成了「水平分隔」（horizontal segregation）。在職業分類中，男性多為技術工人，女性多為半技術工人；在「專業」中，包括幼稚園教師、護士、醫生等，亦有性別分隔之現象。而行政人員之兩性比率在一九八六年達5:1，可推論存在著「垂直分隔」（vertical segregation）。

九十年代服務業已有相當多男性的參與，這可歸因於九十年代香港工廠北移，部份勞動人口移往服務業所致；但有關機械操作之行業仍是男性為主的行業，女性則以文職工作為多。此外，在經理及行政級人員的男女比例為4:1，令人懷疑職業上繼續存在著「垂直分隔」（vertical segregation），但我們不能忽視兩性距離的拉近，這可能是由於婦女在社會冒升努力的成果，或職業結構轉變，有關這方面的論斷應對婦女在社會流動過程中的際遇作具體的分析。此外，另一令人關注的問題是：能晉升至被視為男性主導的行業中的女性是以何種性別演繹出現？她是否以男性姿態取得其地位呢？

## 女性勞工邊緣化

九七年後，香港勞工面對嚴重邊緣化。根據黃洪和李劍明（2000）的研究，近年勞工被邊緣化的現象日益普遍，勞工向下流動的機會多，而向上流動的機會則愈來愈少。勞工一旦面對失業及就業不足，一方面很難重新就業，而另一方面由於現時新增的職位亦多屬散工、臨時工、合約工、兼職工、外判工等邊緣工種，失業勞工要重新就業，便要被迫接受這些非正規工種成為邊緣勞工。他們說，「邊緣勞工」是相對「主流勞工」而言，邊緣勞工是指那些在職業、

「工廠、廚房、垃圾房」——香港女工十五年



性別、族群分工過程中處於劣勢的勞工。而作為邊緣勞工，很多時會感到被主流社會所排拒，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特別是在聲稱高科技的社會。

根據他們研究的結果：在1999年，香港共有近六十五萬名（643,000）邊緣勞工，約佔全港勞動人口三百四十八萬之兩成（18.5%）。其中有三分一（33.8%）約二十二萬（217,000）是失業人士；有半數（50.2%）約三十二萬（323,000）是貧窮勞工（月入少於4500元）；另外，有六分一（16.1%）約十萬（103,400）是就業不足人士，其中有七萬七千人屬開工不足，即因工作量不足、原料短缺、機械故障而工作時數少於三十五小時；另有二萬八千人是不能找到全職工作的非自願兼職人士。

若看性別分佈，在三十三萬中年（三十至四十九歲）邊緣勞工中，女性的比例佔大多數，有二十萬，而中年女性則主要成為貧窮勞工，共有十五萬七千名中年貧窮女工；成為失業者及就業不足者只有二萬八千人及一萬六千人。而中年男性邊緣勞工則多面對失業及就業不足，分別有六萬九千名及四萬六千名中年男性失業及就業不足，只有一萬六千人是貧窮勞工。在邊緣勞工中共有十一萬

（109,700）屬年長勞工（五十歲以上），其中有六萬四千人

是男性；有四萬六千人是女性。男性長者較大機會成為失業人士及貧窮勞工，共有二萬八千名年長男性勞工面對失業；有二萬一千人屬貧窮勞工，而年長女性則多屬於貧窮勞工，共有三萬五千名年長的貧窮女工。



他們的研究最有價值之處是指出在全球化底下，在邊緣化的過程當中，男性較易面對失業及就業不足，女性則較易成為貧窮勞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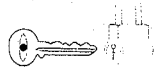
他們又指出，由於不同性別的勞工集中於不同的行業及職業，這些行業和工種出現不同的轉型，男性和女性面對邊緣化的過程亦不相同。男性邊緣勞工多是建造業、製造業的技術勞工，由於工廠北移，製造業勞工的就業機會不斷縮減，面對失業的威脅，而建造業勞工則多以承判及散工的形式受聘，近年由於樓市不景的影響，建造業工人普遍面對開工不足，所以男性邊緣勞工較容易出現失業及就業不足的狀況。一九九六年男性失業者只有五萬八千人，到一九九九年經已大幅上升至十四萬九千人，而在一九九六年男性的就業不足者共有四萬一萬人，到一九九九年增加至七萬七千人（黃洪、李劍明2000：18）。

女性勞工較集中在貧窮勞工的類別。由於本地女性貧窮勞工多是服務業中的非技術勞工，本地女性貧窮勞工的數目在經濟發展時出現明顯增長，一九九六年本地女性貧窮勞工共有八萬三千人，至一九九七年上升至十一萬六千人的高峰。一九九八年經濟衰退初期，僱主只裁減部份低薪的女性員工，不少服務業的女性也面對減薪變成貧窮勞工，所以本地女性貧窮勞工數目只輕微回落至十萬二千人。經濟衰退持續令更多的貧窮女工面對失業，一九九九年本地女性貧窮勞工的數目下降至七萬八千人，但外地傭工由一九九六年的十六萬四千人，增至一九九九年的十九萬一萬人，期間每年以一萬人左右的幅度持續增長（黃洪、李劍明2000：19）。

香港經濟結構走向紐約和倫敦式的後工業國際大都會，並沒有為女性的生活空間帶來良性的發展，反之，製造了更多女性邊緣工人的問題。後工業經濟對傳統製造業的技術需求甚少，故此經濟復甦不能解決傳統製造業的工人的問題。事實上，她們在九十年代早期已經被邊緣化了。後工業經濟注重服務行業，可是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城市與城市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互相競爭，非技術和非知識型的工作亦會受到工資下調的壓力，或以散工和兼職的形式出現。故此很多低下層所能獲得的服務業工作也未必能保障她們的生活情況。

## 新移民和女性生活空間

由於政府竭力將香港轉型為全球化城市，大力鼓吹外地高科技人才進入本港



工作，卻對內地新移民十分歧視，使他們在港的生活困難重重。根據統計處的報告，近年來港的新移民中，年齡在十一歲或以上的超過七成是女性。由於她們近四成年齡介乎三十歲至三十九歲之間，沒有受過職業培訓，被列為低技術和低學歷人士，使她們在勞動力市場上倍受歧視。

新移民婦女來港後，為了負擔家庭經濟，一般都需要尋找工作，但可供她們選擇的工作少之又少，她們只能擔任服務業中最低下的職位，因而新移民的家庭入息遠比全港家庭入息中位數為低。根據政府的統計數字，全港家庭入息的中位數為一萬七千元至一萬九千元，但新移民的家庭入息中位數只有六千八百元至八千元，其中家庭收入的差距高達一萬元 [註1]。

## 結語

以上數字都說明香港的女性，特別是低下階層的女性和大部份的新移民婦女，都沒有在香港經濟轉型或趨向全球化的過程中有所得益。反之，近年的城市發展，進一步導致社會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除了小部份能在資訊科技的淘汰賽勝出之外，女性的生活空間受到種種的限制，特別在職業選擇方面。過往受聘於製造行業的女工和新移民婦女更是處於弱勢。

最近的經濟復甦只顯示香港經濟結構走向紐約和倫敦式的後工業國際大都會。這種經濟增長未必能惠及女性勞工和新移民婦女。

## 參考文獻

- 吳俊雄等編（1993）《香港婦女檔案》，香港：新婦女協進會。  
黃洪、李劍明（2000）《香港邊緣勞工近年的發展》，香港：香港樂施會。

註1. 請參看 Special topics Report no.22: Hong Kong Residents with spouses / children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1999

# 建立基層婦女運動的理論—— 介紹《女權主義理論：從邊緣到中心》

撰文：司徒米

## 一、前言

Bell Hooks 是美國黑人女權主義者（以下女性主義與女權主義不作區分，可交叉使用），她的著作《女權主義理論：從邊緣到中心》最近譯成中文，立刻吸引了一些香港基層團體留意、閱讀、分享。

Bell Hooks 的理論，對香港的婦女運動有很大參考價值。以下簡介書的內容，並附上感受。這些感受，並非全部是筆者個人意見，很多都從分享會中得來，與會者包括工會、基層婦女團體活躍分子，及大學生。

## 二、建立黑人婦女的女權主義理論

美國女權主義起步很早，但 Bell Hooks 認為，美國女權主義運動多由白人中產女性組成，習染不少階級及族群偏見，因而令黑人女性卻步。白人女權主義慣將女性被壓迫的原由單單歸咎於父權，但對族群及階級壓迫卻略而不提，反映了中產白人女性本身也是美國這個族群壓迫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中產白人女權主義專心一致希望爭到中產白人男人一樣的地位，卻並不理解非白人女性（尤其基層黑人女性）受到的壓迫與如何尋找解放之道。

中產女權主義相信「有錢」的女性與領福利金的女性都是共同的，因為她們同受性別壓迫，因此同樣慘。女權主義喜歡強調：「所有女性大聯合！」

這令我聯想到一些香港基層團體的工作者對現時婦女運動的看法：女性主義



在基層婦女(甚至基層婦女團體)中無法引起共鳴。女性主義吸引到的大多數是中產及知識女性。女性主義者的分析甚少有關基層角度，也很少探討階級問題。

對於上述情況，不同人會有不同反應。有人認為階級分析已過時，不提也罷；也有人認為，單消除階級並不會自動消除性別歧視，所以現在應強調婦女團結，突出婦女共同面對的性別壓迫問題；也有人覺得提出基層與中產知識女性之別的法是存心製造分歧。也有人提出運動方向不應只集中基層關注的具體生活議題，應爭取高層次的民主，如議會發言權等。不過這些說法很少受到基層團體認同。

作為一個關心香港基層女性的我們，又應怎樣面對？

還是先回到Bell Hooks。

Bell Hooks認為，不同種族和階層的婦女在物質生活和社會地位上有很大的差異，她們的經歷不會是一種共同的東西，把女性所面對的壓迫概括為性別壓迫是一種本質主義的做法。譬如黑人婦女由於位處社會低層，受剝削和壓迫嚴重，這些切身經歷使她們的世界觀與那些在現有制度享有較多特權的人完全不同。她們意識到自己處於邊緣，她們所挑戰的是造成社會不公的制度的種種根源，包括：種族壓迫、階級壓迫，和性別壓迫等。Bell Hooks認為，黑人女權主義對美國白人女權運動的持續批判，為女權運動做出了獨特和有價值的貢獻。

### 三、重新思考工作

Bell Hooks認為，對「工作」的不同理解，也反映著主流女權主義的中產偏見。中產女性認為，女性能擺脫家務，找份有薪水工作，才算是解放自己。但「工作」對許多基層女性來說，既與尊嚴無關，也不能導致自給自足，它只是剝削。Bell Hooks認為，單強調「工作」可解放女性，卻又不批評不平等僱傭關係，其實是維護著這個不平等的體制。

女權主義一方面要求父權社會應給予家務勞動者報酬，另一方面卻從不重視

家務勞動的價值。Bell Hooks說，良好的家務勞動可培養個人的責任感(包括男性、女性、兒童)；一個重視家務勞動的人，也會以不同態度面對工作。

不過，另一方面，Bell Hooks對「家務勞動有償化」表示擔憂，怕此舉會進一步將女性角色定型，及將家務勞動的意義建立在酬勞之上。(現時香港一些婦女團體亦提出「家務勞動有償化」建議，這問題在基層團體中很分歧，很值得進一步探討)

順帶一提。看來Bell Hooks回應的是女權主義中的自由主義派，所以她沒有在書中表達對女權主義中的後現代主義派的看法。Bell Hooks說，在一次座談會中，她聽到有女性主義者慨嘆運動失去勢頭，是因為人們的同性戀恐懼。發言者說，女性主義一直是同性戀運動的同盟軍。但Bell Hooks卻說，不見得同志/姊妹就喜歡加入女權運動，其實雙方有著不同心事，同性戀者並不維護性別這議題。她說未見過婦女因恐懼同性戀而拒絕加入婦女團體；倒是女權運動中的族群與階級因素，令許多黑人婦女卻步。

在知識系譜上，同性戀運動較近後現代，都傾向拆解「男性」、「女性」範疇，而提出「流動」、「游走」概念。後現代對「性別」、「民族」、「國家」、「階級」各類宏觀話語提出質疑。但Bell Hooks卻在保衛這些範疇(「階級」、「族群」、「性別」是她分析基層/黑人/婦女的三大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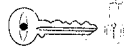
近年，香港一些進步的女性主義者都傾向談情慾自主、另類生活方式。當中，沒Bell Hooks所說「強調工作是婦女自主出路」的自由主義傾向，相反，洋溢的是對工作排拒的後現代想像。我不想說這種想像跟她們不是來自基層，或本身不難找到「不錯」收入有關；但這種生活感受，恐怕也難為基層女性所瞭解、共鳴。

至此，我們面臨著一個問題：究竟中產女性主義與基層、女性主義如何才能否打通關節，有締結同盟的機會呢？

### 四、重新思考暴力

Bell Hooks說，男性對女性的暴力，與整個社會的暴力是連系一起的，不





見得女性一定偏好和平(如教細路時使用暴力,對軍國主義的支持等)。但一般女權主義卻簡單地將暴力歸咎男性。男性被界定為:不是本質上也是潛在的施虐者;而女性則是弱者、受害者。

就如討論工作與女性解放時一樣, Bell Hooks將暴力問題指向社會制度。她提出一個耳熟能詳的問題:為何基層家庭常發生暴力?其中理由是基層(不獨是女性)整天都活在不同形式的暴力壓迫中,家庭暴力只是其中之一,所以對基層而言就沒有甚麼「大不了」。當然,基層女性(尤其非白人女性)所佔位置,又在基層男性之下,受的暴力就格外嚴重。

Bell Hooks提出「暴力循環」的概念。男性在公共環境受盡各種侮辱,為了生活,又不敢反抗(如向僱主忍氣吞聲),累積的壓力,便在能夠「控制」及不怕報復的環境下釋放出來——通常是家庭。資本主義樂見工人找妻小而非僱主出氣。

這裡又想起一個故事。在討論中曾有朋友說,六十年代美國學生到黑人社區組織社區力量時便碰過:激進的白人學生自然反對警權,貧窮的黑人男性亦然。白人警察濫權,常欺壓黑人,所以黑人男性都反對警察;但黑人男性也欺壓黑人女性,因此許多黑人婦女歡迎警察來保護她們。

族群、階級、性別確實互相糾纏。

## 五、自我弱化

但 Bell Hooks又不是只站在黑人女性立場批判主流的女權主義。作為一個參與者, Bell Hooks亦經常對黑人女權運動提出建設的批評。譬如,她提到基層婦女常出現自我弱化傾向。

在〈革命的黑人女性:自己爭取成為主體〉一文中,她說了一次出席黑人女性主義全國籌備會的經驗。故事抄錄如下(文章譯得不好,現略作修改):

大部分人只是坐在那裡傾聽某某黑人社區如何被殘酷對待的故事。[我]為反對建立一種生硬一統的經驗,[……]提出:我就生長在一個封閉但令人舒暢的

黑人社區[……]。我的話還未講完,就被一位「著名的」黑人婦女打斷,她斥責我企圖以不同經驗抹殺其他婦女的痛苦,聲音充滿敵意及憤怒[……]。

黑人女性主義的「本質主義」旗號在那個地方建立起來。它容不得不同意見[……]。那些訴苦話說得最多的,也是判斷別人時最刻薄、最愛堵人咀巴的人。一些不屬於核心圈的黑人婦女從而學懂了,如果不知甚麼是「合適」的,你最好別說話[……]。

為甚麼號稱「反本質主義」的Bell Hooks,也像白人種族主義者一樣,覺得黑人女性有股怒氣呢?且看她的話:

《女性的詩》宣言中:「我不是臭狗屎。如果你與我論長短,你肯定比我更下賤。」這話直接道出了受壓迫、受剝削的人的憤怒和敵意[……]。當黑人女性彼此間發生問題時,常常如此。

實際上我們許多人都生長在這樣一種家庭中,在這種家庭中,我們完全接受暴力是對危機的一種相互反響的看法:在這種環境下,黑人婦女在語言上出現辱罵[……]就不足為奇了。我們(這群人)關於黑人婦女相互戰鬥的最生動記憶都發生於公共場合。在這樣的地方,女人必須與男人或閑言碎語進行艱難的周旋。這群人中,沒有人不曾看到過黑人婦女相互戰鬥的場面。(同前)

Bell Hooks並不因而將黑人婦女本質化、標識化。在提到《互相諒解:黑人婦女、仇恨以及憤怒》一書時, Bell Hooks一方面讚賞它的洞見,另一方面卻提醒小心當中的本質主義。Bell Hooks說:

文章表達了對處於未康復階段的「受傷」黑人婦女彼此相互傷害的理解。這使我們看到,具有控馭作用的性別歧視和種族主義是如何決定我們彼此看待你我的方式的。她[指作者]對內在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如何貫穿於黑人婦女社會形象的描繪著實令人折服[……]。

[Bell Hooks說]文章認為,黑人婦女共有的經驗是一種被動地接受、吸收自我仇恨信息,然後,又把怒氣和敵意最強烈地相互施與的經驗。我由衷地承認,許多婦女的感覺和行為的確如她所描繪[……]。

「工廠·廚房·垃圾房」——香港女工十五年

但同時我又對她的推斷中連續使用集體人稱的「我們」而不安。她所說的是所有黑人婦女共有的經驗 [……] (同前)

Bell Hooks一方面強調黑人婦女有多元的經驗(所以她在大會上唱反調),但另一方面, Bell Hook卻沒有否定眼前存在於黑人婦女中--暴力,這種「普遍現象」,並把問題追究到性別、種族、階級等結構上。

## 六、重新思考女性形象

這裡,我且引用另一篇文章:俞彥娟的〈從母親角色爭議看第二波美國婦女運動中的種族歧視〉,來補充 Bell Hook的說法。這篇文章同樣提到美國白人女性主義與黑人女性主義間,在女性形象--尤其是母親形象上的分歧。可作 Bell Hook《從邊緣到中心》一書的補充,也有助於思考本地“基層女性主義”。

此篇文章分析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美國白人女權主義者(即所謂第二波婦女運動)與黑人女權主義者在“母親角色”上的分歧。

作者說,在十九世紀第一波婦女運動中,女權主義者多強調神聖“母親角色”來合理男女平權;但到了第二波女性運動,女權主義者便轉為攻擊“母親角色”,認為是父權迷思(即女人都喜歡成為母親、母親是小孩的最佳照顧者,及母親必須全職照顧小孩等)。

第二波女權主義者認為,“母親角色”迷思把女性框死在單一角色上,限制了女性選擇自由。因此主張去除性別歧視,讓女人能像男人一樣接受高等教育、進入職場、參與政、經、社等活動。在“母親角色”上,她們提倡以親職(parenthood)替代母職(motherhood)(即男女都有共同責任照顧小孩)。

激進的女權主義者更指傳統婦女角色是資本主義與父權制度合謀下產物,使女性成為性玩物、生產機器、家奴、廉價勞工。但大部份黑人婦女團體對這場由白人女性發起的運動並不積極。

作者說,當時參與運動的女性主義者,大都是年輕中產階級白人女性,多未

婚,或已婚而沒小孩,或仍是大學生。她們不能接受像自己母親一直忍受的女性角色。尤其隨著美國經濟發展及教育提高,白種中產女性在社會上已有能力參與更多事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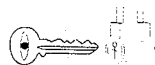
除激進的馬克斯女權主義者肯將性別議題連上階級外,大部份白人女權主義者只專注性別問題。但黑人女性主義者則往往將種族、階級、性別連在一起思考。

黑人女權主義的對象多是基層黑人婦女,她們觀點常與前者不同,例如:

- a) 白人女權主義常批判男性,但黑人女權主義者對黑人男性常表達一種愛和關懷;畢竟,黑人男性同是種族壓迫下的受害人;
- b) 白人女權主義提出工作權,但基層黑人女性並不缺乏工作,黑人女性自少就從事低薪沒尊嚴的工作。她們希望得到的,是工作待遇及環境改善;但白人女權主義很少關心這些;
- c) 白人女權主義爭取獨立、能幹的女性形象;黑人基層婦女卻要擺脫社會上認為黑人婦女都是“聲大夾惡”、“粗魯”的偏見。這種偏見源自一些白人社會學者的“發現”。這些學者認為黑人男人不長進,與自少生長在女性主導的黑人家庭中有關。黑人女權主義者反駁,黑人的女性家庭文化是經歷美國早期黑奴制度而來,當時黑奴沒有人身自由,可像貨物般賣來賣去,於是拚死照顧子女的責任便落在女性身上。當代黑人婦女一身兼數職,背負重擔,卻不被表揚,反被認為是男性不長進的証據,成為代罪羔羊。

在“母親角色”上,二者也極為不同。當白人女權主義提出女性有墮胎權時,黑人女權主義也支持,但理由不同。白人女權主義多關心個人自由、對自己身體的控制;但黑人女性關心的是貧窮、越生越窮的問題。儘管黑人女性也支持墮胎運動,卻對白人女性帶領的墮胎運動充滿戒心。因為黑人貧窮,嬰兒夭折率高,黑人女性常在公立醫院遇上不情願、卻由醫生自行決定的絕育手術。黑人婦女懷疑,當中有種族滅絕陰謀。

黑人女性也不認為“母親角色”削弱女性地位,相反,她們認為“母親角色”可為女性增權。尤其對許女黑人女性來說,當自己的階級、族群,及性



別都不為社會肯定時，“母親角色”成為了自我肯定的主要來源。

另外，“母親角色”對黑人女性來說，也不是指單單作為自己子女的母親而矣。在黑人傳統的窮貧文化中，親族及鄰里互助十分普遍，“母親們”常互相照顧各人家中的小孩老弱、打點族群及社區事務，使生活“過得去”；黑人女性覺得，只有整天困在家裡，悶得無聊的人才會參加“女性主義運動”。黑人女權主義者認為中產白人的“女性主義”是個人主義，會破壞黑人的團結。

作者說，黑人女權主義和白人女權主義的割裂局面到七十年代中得到改善，原因是白人女權主義運動為了擴大團結面，開始與黑人女權主義互相對話，並將後者的部份主張，吸納到自己綱領中，譬如對“母親角色”的重新肯定便是一例。

## 七、結語

大洋彼岸，我們所知不多，這篇書評屬姑妄言之，姑妄聽之。

香港情況如何？香港女性主義運動發展已有一段時間，說它主要流傳在年輕知識份子當中，缺乏基層女性參與，應是不太離譜說法（不是說完全沒有合作、沒有聯繫）。這並非貶意，事實上，在男女平權及眾多社會事務上：如新界土地繼承權修改、聯合國婦女公約在香港的落實及監察、平機會及婦女事務委員會的監察等，香港婦女運動貢獻良多，證明香港女性主義運動的發展。但問題是，如何將女性主義運動擴大到基層婦女之中，似乎尚欠努力。

可從那裡入手呢？

在這意義上，Bell Hooks提供了一個入手點。

# 迷走在婦運與工運之間

撰文：胡美蓮

（轉載自：新婦女協進會2001年《差異與平等—香港婦女運動的新挑戰》）

各種神祇都同樣地盲目自信，它們惟我獨尊的意識就是這麼建立起來的。它們以為惟有自己不同凡響，其實它們彼此極其相仿……它們各自的方法論如出一轍，這個方法就是重複虛構。

——馬原《虛構》

## 1. 由中心到邊緣的女工運動

有人問：婦女議題轉移了，女工問題不再成為尖銳問題，女工團體怎麼辦？

九十年代初，幾十萬曾為香港經濟貢獻青春的製造業女工被摒出市場時，被指是個人質素、學歷和技術跟不上社會發展。當時社會普遍關注基層婦女就業困難，也有行動反對如：輸入外地勞工、製造業北移、搵工年齡歧視等政府“政策”。學者開展調查發掘中年婦女生命歷程，讚揚婦女就業與生活安排的經歷和能力，及正視婦女對社會、家庭的多重無償勞動。而政府不斷推出轉業再培訓計劃、就業選配、甚至資助僱主聘請中年婦女等治標不治本的對策，以期將失業責任個人化。婦女團體強烈批評勞動市場將婦女作為後備軍，譴責政策忽略中年婦女多重角色（家庭照顧者、母親、妻子及工人等）及所面對的限制和歧視偏見，連串行動針對就業市場年齡歧視，婦女就業機會不足和政府漠視……等。



九十年代末，金融風暴，失業浪潮席捲各階層；整體工資下降、就業機會減少、社會福利大削，以致更多弱勢社群的處境漸趨惡劣。就業困難的性別因素被其它因素掩蓋。

失業既成為“整體勞工問題”，還有必要提出女工運動嗎？

我的答案仍然：“是”。

婦女就業問題不再是社會焦點，但女工處境形勢並沒改善反更惡劣。政府要發展科技行業，僱主寧聘請十多歲年青小伙子而非中年才入行電腦的女人；政府將部門私營化、服務外判，價低者得，判頭公司聘請的員工大多是低薪、兼職、散工的中年婦女；培訓局雖提供大量針對中年婦女的訓練，如家務助理、安老服務照顧員、清潔等，不過市場上這些工作大多外判，低薪而工時長。即使如此，行業中仍存在性別分工現象，低技術、低工資、低保障和低發展的工作多由婦女從事。在雷厲推行的強積金計劃中，無償勞動的家庭主婦及從事家務助理的婦女都被摒於保障之外。婦女成為邊緣勞工的主要成份。

在傳統主流的工會運動裏，兼職或半失業婦女很少加入工組織或被工會吸納，工會並沒有組織對策吸納這批女工，她們的工人身份模糊，她們只站在邊緣（包括勞動市場位置和勞工法例保障）。然而就業模式的零散化（casualization）已是大趨勢，邊緣女工將不斷增多，她們所需要的法例不同全職工人；她們對工作和生活的關注點有所不同。所以我的答案是：我們需要建立結合基層女工與邊緣弱勢群體力量的運動。

## 2. 女工工作社區化

在社區中組織工人本不值得驚奇，驚奇的是“勞工社區化”竟成為近幾年一些勞工團體的新興口號，反映了過去勞工團體與社區的疏離。在勞工工作社區



化的勞工團體實踐中，團體接觸工人的場景由工廠區、工作間轉移到工人居住的屋村。權益話題也由工廠制度、工作條件等增添到房屋、居住、子女、家庭等。目標是嘗試在社區集結工人力量，鬥爭對象除了資本家、還有地產商、房屋署；除了反剝削，還包括爭取社區資源等。簡單來說是將勞工運動結合到社區運動。

今日提出女工工作社區化，是要面對就業模式的零散趨勢。女工現多以兼職、臨時工或外判受聘，兼職女工對“工人”身份的認同模糊，傳統理解全職才算是正式工人。一部份兼職女工還想找一份全職，加上兼職的勞工保障一向缺乏，間接影響兼職工人對正式工人身份的認同。例如：連鎖零售店以每週17小時聘用女工；超市持續於上班3週後就解僱工人，一週後再重新聘用使工人不算連續受僱，失去法例保障；又如：清潔工人以兼職身份做全職工作量，還有以外判形式迫成為自僱，是工人還是自僱往往要上庭才能解決；或如：站於百貨商場零售檔口的不屬商場員工、也不算百貨店職員，有時甚至只是透過電話聘用而不知真正僱主等情況時常出現。種種聘用手法都令工人的“正規工人”身份受到挑戰，也令受僱工人脫離勞工法例保障範圍。這是促使女工邊緣化的成因。

爭取法例修訂以保障權益一是透過集體行動，二是透過法庭案例以彌補法例灰色地帶。零散化聘用的工人集體行動最困難，加上經濟壓力也增加了工人對行動的猶豫。至於法庭追討程序費時，最少也半年九個月，加上兼職工人在法例身份上含糊，所以傳統工會介入工潮以集體爭取的手法對組織兼職工人難以奏效。

兼職女工上班時間不一、分佈行業廣泛，要透過工作地點或行業來組織有一定困難。反而公共屋村是接觸兼職女工、半失業或失業女工的最理想地方。而且屋村還有一批家庭主婦，當子女漸長大她們將是一批待組織的待業婦女。

## 3. “邊緣勞工”：為女工運動重新定位

近期“邊緣勞工”的討論很多。有人抗拒此身份，認為邊緣是對應中心而言，接受“邊緣勞工”身份無疑要工人自我邊緣化。也有人認為此名稱含糊不清，



兼職、失業女工是邊緣、低收入家庭主婦又是、新移民婦女也是、性工作者更是、即使單親婦女也屬。而且被包括在內的婦女雖被人邊緣化，卻可能有份參與邊緣化其他婦女。結果以“邊緣勞工”身份凝聚弱勢群體的意圖並不成功。事實上，團體對“邊緣勞工”名稱不是不接納，團體都樂意以“邊緣”自居，但問題卻是大家都希望自己成為邊緣的“中心”，以突顯服務對象的處境和自己的重要性。結果目標議題無法一致而散失陣營。

“邊緣勞工”能否發展成一個運動，除上述提到的論點外，還在於邊緣群體或團體如何將自己的議題與“邊緣勞工”結連起來，並在這種身份中找到力量。我便有興趣“邊緣勞工運動”（如果有的話）如何能為女工運動創造出一個新的議題，以建立自身的支點。

在勞工社區化下，邊緣勞工仗賴社區網絡建立力量，並非單靠工作間建立力量。邊緣勞工運動需結合社區的家庭主婦、小販或小商戶等，在社區發展互助合作關係，凝聚社會改革力量。但如上述，“邊緣勞工”的論述尚存分歧，仍有待更多討論和行動才能定位。不過，有些團體（包括女工會、勞工團體及社區團體）近期已開始聯合綠色運動團體在社區以推動廢物減少及回收行動，實踐建立居民網絡、社區參與和合理的勞工就業。也有團體積極探索發展社區經濟，促進民間互助力量的建立。各種力量：婦女、勞工、社區網絡、綠色運動能否結合共同闖出／創出新社會運動的苗？正待更多的討論和實踐。

## 4. 如何將家庭主婦激進化

在社區中接觸和組織女工，不單是場景轉換及服務內容範圍擴大，還要對“女工”身份重新界定，即家庭主婦是不是“勞動婦女”，這不單是理念問題。歷來許多“搞基層運動”的朋友都不認同社會服務機構為“家庭主婦”舉辦的“煮飯湊仔”課程。如：烹飪、教子女良方、夫妻相處等。這些活動在婦女運動圈中評價很低，認為既鞏固婦女照顧者角色、對父權社會沒批判，又沒有促進兩性平等目標，更缺乏權益方向或鬥爭對象等。

最近，政府縮減福利機構撥款，有社會服務機構將婦女就業、勞工權益工作部納入家庭服務部，聽到的人無不搖頭。有機構的社工不忿氣被否定，質

詢“點解教女工爭權益才是進步？教女工煮靚飯俾老公仔女就保守？有些女工真的希望做好妻子角色，然後再跟她討論兩性平等的相處關係……這不也是一種方法嗎”。

說實的，對“家庭服務”的批評話，我也說過。但當我將女工議題與社區結合後，開始有另一些想法。我嘗試從婦女實際生活經驗或話題入手，探索如何透過多元化形式實踐權益推動的理想。女工運動議題不能脫離婦女的生活經驗，更不應否定婦女的日常生活經驗。我們可做的也首先是分享互相的經驗，然後共同探索權益及出路——方法可以很多。不過我仍然認為現時社會服務機構對兩性平等問題或者對婦女的家庭照顧者角色仍存在很多保守觀念，一個煮飯活動可以講很激進的議題，也可以極保守，視乎負責的社工和機構取向。

## 5. 合作社是經濟單位還是互助組合

在勞工社區化及“邊緣勞工”討論同時，這幾年亦有基層團體組織失業工友辦合作社。雖然不同團體想法和期望迥異，但也是以此回應當前的失業問題。實踐幾年，我想從有限的經驗中提出一些看法。首先，那些試圖以合作社作為一種生意業務解決或舒緩社員經濟問題的組織，恐怕至今都面對一個問題，即合作社如何與私人營辦商競爭？如何在資本主義市場上尋求出路？

有人以資本主義市場邏輯去考量發展成果、以成本會計方程式去計算賺蝕，認為工人合作社是不合格的經濟單位。我則認為：合作社不是一盤生意咁簡單，而是經濟合作互助的組織，更是社區力量的聚合點。如果要做生意賺取經費，不妨效法部份機構辦超級市場、蛇宴、旅遊公司等。但我不以為這些是合作社，或這些均與邊緣社群的社運議程無涉。

大部份基層團體辦合作社都同時賦予一些超越“生意”的原則，如：合理工作條件、合理工資、平等分工、互助學習、社員學習不同崗位工作、實踐共同決策、共同承擔等，以期在營運中重構社員關係，打破勞動市場中工人互相競爭，只著重個人成就的那些根深蒂固的關係模式。因此，如要比擬生意，則合作社是一個要求超越生意的經濟組合，成果不能用市場經濟標準來衡量，因為這樣將隱沒了合作社的意義。在營運當中，社員之間能否建立互助關係比



接到多少單生意來得更重要。這就好比基層團體透過互助或共同理想團聚成員而不是透過利分配攏絡會員一樣。尤其，在香港目前基層團體處弱勢下，合作社自難遍地開花，因此我寧將合作社作為一種邊緣勞工的社會運動，而非解決失業問題的靈藥。

## 6. 對女性主義的自我質疑

一次討論會中有人問我：你是否女性主義者？即時反應是充滿猶豫。

對我來說這是個難答的問題，有段日子，曾認同作為一個女性主義者並因找到身份而感到自信自豪。那時剛離開勞工團體，跑在學院聽女性主義課，每聽有批評男性、男權中心的理論時，就會因為自己不懂得這樣想和批判而有點慚愧。回想過去在勞工團體生活，從沒懷疑當時團體中男性佔大多數、核心成員也是男性所可能隱潛的男性中心意識；也沒挑戰為何會議中發言的男性總會講高大理論，而積極的女性都只在實務上表現出色。所以，當聽到女性主義所提出對男性／權的批判時，總覺得也是批評自己的過去。我重新認識到將女工等同男工看待是缺乏女性角度、習慣了的開會模式原來是男性化的……。女性主義讓我進行反省，所以，一下子迷上了這個身份。

但為何到今日會猶豫起來呢？

在1993-1994年間婦女團體為新界女原居民爭取丁屋繼承權是第一件令我迷失和矛盾的事件。那些敢於站出來爭取權益的新界女性是令人敬佩和難得的，但那些與男性原居民站在同一線反對修例的新界婦女被標籤為受男性蒙蔽，又或界定為受傳統思想毒害的受害人。這點我一直有所保留和質疑。在爭取女原居民有繼承權的支持者中，有幾多是贊成新界人有丁屋權？又有多少人要求撤消原居民的丁屋權？我不知，試過問參與爭取運動核心的朋友，只回應未有機會談，而且說在這情況下談可能削弱了力量……。我疑惑那些反對修例、要保衛原居民權益的男人們，是害怕女性的入侵損害了原居民身份，還是恐慌政府藉著開放丁屋權而打擊原居民土地權利？那些站在男人同一陣線的女人們是跳不出封建枷鎖、還是保衛土地使用權？在爭取男女平權的過程中，不可能等所有問題都解答了才行動，我知的。但我只是害怕一種情況，就是當有人反對修例就被理解為保守；當有人提出保留傳統就等於封建……等等，這種情緒和評價堵塞了討論空間，在這情勢下的女性主義令人透不過氣。

這件事中我的女性主義者立場動搖是因為我不知如何放置那班站在對立面的女性原居民，我不想隨便將她們理解為男權盲目追隨者。於是，在找不到對立面的“他者”後，我迷失了自己位置。我害怕自己掉入一個簡單化的邏輯：在傳統思想中的女性就一定是保守、或女性主義就等同於前衛或進步，非女性主義便等於保守或落後。

## 7. 只是一串串的疑問與反思……. 您應該知道甚麼叫迷走了。



# 性別、勞動、族群與資本外移\*

撰文：司徒米

(轉載自：1997年《基進論壇第一期》)

本研究以深入訪談形式(In-depth interview)訪問了十位女工，訪問重點在工業轉型下女性工作生涯與家庭照顧的變化，及當事人如何面對及理解這種困難。訪談於一九九五年八月至一九九六年一月進行。被訪的女工原職製造業，在近年的“工業轉型”中失去工作，現時從事臨時、兼職及時薪的工作。

直至目前為止，已有二萬五千間廣東工業企業與港資聯系，合共聘用了三百萬當地工人，等於香港工人總數的4.6倍。(見HKTC, 1992) 港府公佈最新失業率為3.5%，即近十萬人失業，另就業不足率亦達2.5% (七萬七千人)……(東方日報17/10/95)

將技術水平要求不高及經濟效益較低的工序遷往成本較低的地區……實際上是科技進步和貿易及投資市場自由化所導致的全球生產革命的一部份，而且是不可逆轉的。(工業署署長，見明報27/12/95)

香港最早有計劃及大規模地輸入外地勞工，始於二十年前的菲律賓傭工……現時在港工作的菲律賓家庭傭工已達十餘萬……九零年政府放寬輸入外勞政策……差不多是任何行業都可以申請……。(不過)有人指出……真正搶去本地工人飯碗的是非法勞工……。這些種種都是令香港工人飯碗失蹤的原因。(快報12/10/95)

\* 註：是項調查在1995年至1996年推行，由香港婦女勞工協會主辦，亞洲婦女勞工連繫贊助。

## I. 誰打爛了飯碗？

### (一) 外地勞工

「反對輸入外地勞工」幾乎是香港勞工界回應失業問題的一致口徑。這種要求，在我們的訪問中亦經常聽到。

#### a) 蘭秀

「星島日報話：勞工要樂觀睇失業，香港有必要輸入外地勞工，唔可以當外勞唔係人，又話外國失業率比香港多……呢d說話，我話係多餘既！」

一提起失業問題便勞氣的蘭秀，有廿年製衣經驗，三年前才因製衣廠北移而失業。蘭秀丈夫是大廈水電維修員，月薪一萬塊，拿一半薪水回家不足以作家用。蘭秀必須另找辦法。但是她再也找不到工廠工作，在家呆了一陣子，後來替寫字樓做清潔散工，每天一小時。最近，多接一份清潔，於是每天做大約三小時，人工是二千多元。

蘭秀認為，做成香港工人失業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無良僱主將工廠外移；二是輸入外地勞工，搶了本地工人飯碗。

#### b) 玲瓏

同樣看法普遍存在於工人當中，不過玲瓏的感受更加複雜。

「都係老板唔好(指將工廠搬返大陸)，焗住工人要返大陸做野，慳返d錢(指老板)。d男人本來係好既，返左去，都變左唔好喇，上面咁寂寞……。」

這個與外地勞工怎樣聯上呢？

「個時諗住結婚，結婚有老公養，其實都唔係既，原來咁樣諗係錯既(指現在想來)……d男人都係靠勞力，唔識咁多字……行業息微，再加上外勞！以前一個男人唔識字都仲可以靠勞力，但依家有外勞，男人想用勞力搵錢都唔得。」



玲瓏八歲開始打工，十二歲從事製衣行業，至廿五歲結婚，丈夫是燒焊工人，卅歲那年，玲瓏生下一個兒子。為了多賺點錢，丈夫到大陸工作。可是不到一年，丈夫變心，玲瓏很困擾：

「佢返大陸做左一年，返黎後，變左好多。初時我諗住呢自己，但情緒差，成日做錯野……。」

玲瓏被解僱後，找不到製衣工作，她先後做過快餐店員及清潔工，現時仍失業，正計劃與丈夫離婚。

### c) 翠蓮

翠蓮十四歲開始打工，先做錶，接著轉製衣、車衫一共做了廿年，直至今年(1995年)被遣散為止。

翠蓮已婚，有一子一女，丈夫在餐廳工作。翠蓮被遣散後，只能在製衣廠做工，專做“潛水貨”。「其實佢(指老板)唔講你都知，大陸既野，係“潛水貨”，有咪叫你去佢做兩、三日；有時會去第二間，因有海關查，要有人坐係度，二百蚊一日，無野做，車布碎。有時三百蚊一日，好無聊，海關睇完咪出糧走……佢(指老板)知海關黎查，因海關打電話俾廠，講到明係幾時查廠，講明係咁。」

(問：做“潛水貨”心情如何?)

「梗係唔開心，人地正式有工返，我就係度呢人，又呢埋自己，覺得咁樣落去，都無了期。」

(問：是甚麼原因導致搵工難?)

「主要係工序搬上大陸；另外係“外面d人”(指外地勞工)來香港打工。」

(問：外勞影響咁大?)

「真係好多，尤其係運輸行業，另外菲傭都有影響，影響低下階層既女人(指搶左香港低下階層女人從事女傭工作的機會)。」

不過，翠蓮對外地工人的心情也很矛盾：

「其實佢地(指菲傭)都一樣俾人壓價，都好慘，不過佢地又無形中壓低人工(指本地工人人工)。好似美國咁，果邊都會覺得香港人搶走了美國工人既飯碗。」翠蓮的丈夫曾打算移民美國(在八十年代)，後來作罷。

## (二) 移民勞工

除了給定性並抬升為運動口號，“公認”是導致香港工人失業罪魁禍首的“外地勞工”外，香港工人內部亦充滿了其它的競爭及矛盾，其中“移民勞工”一項，亦常常被提及。

### a) 詠娟

「我都唔想日日加班，連星期日及公眾假期都要加。但你唔加，其他人都會加，科文會唔鐘意你。」

做了十五年電子廠的詠娟先後在1988年及1992年嚐到工序外移失業的滋味。在四十歲“高齡”(電子廠一般不會聘用卅五歲以上女工)找回電子廠工作，理由也很簡單，工資低及勤力。

「我做果間廠大部份係福建人(指帶福建口音的新移民)，佢地好勤力，全年都唔休上幾日息，又聽話，又拼搏，你唔可以慢過佢地太多，唔係公司會唔鐘意。而且我地成四十歲，見工時已經講明，以後唔會加人工，要搵錢就只有靠做多d，唔休息。」

詠娟的職位介乎生產線與科文之間，屬有技術工人，可以自由走動。她抱怨經常俾科文鬧：

「有時佢地做野唔合格，(指福建人)，科文唔高興，叫你“又點、又點”，但係d福建人唔聽你講，“局住”俾人鬧(指詠娟被科文罵)。」

### b) 香棠

本地工人與新移民工人的矛盾，亦可在新移民工人口中反映得到。香棠是





福建人，在廿一歲來到香港，很快便在當時蓬勃的電子業找到工作。香棠有中學程度，有售貨經驗，在電子廠，兩年內升為組長，但這次升遷卻不是一帆風順。

「公司升左兩個人做組長，加五蚊，我地呢d剛來香港既，唔同人爭，總之有野就做，後來有人替我唔值。佢教我話，遲d搬廠，公司唔升你就唔好做。當時我蠢蠢地，真係去講，講既時候只係話第日搬廠我唔做。上頭問點解，我話做得好辛苦。佢話知我意思，即係話佢升左兩個人都唔係真係做得好好，只不過佢地係香港人，而我地係新移民。當時十幾個新移民當中，只有我識講廣東話……過左新廠，佢真係加我五蚊。」

(問：同本地工人溝通有無困難？)

「初初入去(指電子廠返工)，鬧出唔少笑話，果時好多福建人都唔識講廣東話，有隻產品叫“TV”，個個都唔鐘意睇，所以公司話輪住睇。有次輪到我，我用廣東話講“我剛剛睇完，又叫我睇？”，其實我未睇，點知佢真係信，其他人唔識講，明明睇左，但科文唔記得，又要再睇。」

「我覺得同土生土長既溝通唔到，而家已經九年，興趣始終唔同，你地(指土生土長的)鐘意睇戲，我地一年都唔睇一套，無乜野事都唔行街……平時傾偈，要“就住就住”。」

(問：你平日接觸的人當中，有無歧視存在？)

「多少都有d……。」

### C) 秀菊

秀菊為我們提供另一種例子，顯示移民工人當中又有著不同族群隔膜。秀菊是緬甸華僑，在1978年移民香港。

「阿爺那一代走難去左緬甸……。我幫老豆睇書局賣雜貨，生活算過得去；後來緬甸排華……。老竇間書局俾政府收歸國有，血本無歸，佢又話我老竇係僑領，捉去坐左幾年監……。」

秀菊形容到香港的第一份職業：「初初果時，講話又唔係咁通，我雖然係廣東人，但講既係台山話……。當時係電子廠好旺，電子廠唔講廣東話唔緊

要……我比較手快，佢地唔識聽台山話，於是我講國語，佢地以為我係台灣人。」

秀菊結婚後，轉做車襖、車時裝，最後又轉回電子，但1989年及1994年連續經歷兩次搬廠遣散，之後找不到工廠，轉行做寫字樓接待員。

「我間公司d客多數講國語，福建話，台灣話，佢見我識講國語都好鍾意(指老板)。」

來港已經十年的秀菊說她已習慣香港生活，再也沒有溝通問題。明顯她已溶入成為“香港”的一份子。不知是否這個原因，她與公司內的福建移民相處不來。

「裡面(指員工)有幾個福建人，好衰，成日篤背脊，好少野都去投訴，真係好煩。」

### (三) 工人其他(內外)矛盾

本地工人同移民工人的矛盾在這幾年被突顯出來，一來因近年工序外移，二來因大陸移民配額提高，但工人間的族群矛盾，在工業蓬勃的七十及八十年代也一樣存在，只是不表現在“移民勞工”，而是表現在“城鄉矛盾”上。這點在電子業尤為明顯。

#### a) 珍珠

珍珠住元朗郊區，父母是耕田的，到珍珠那一代，男人都出市區工作，女人只有少數到工廠工作，都留在村裡。不過，到了七十年代，情況慢慢改變。近郊的荃灣被列為新市鎮，人口不斷遷入，工廠亦不斷增加，尤其是大型的工廠，最願意設在新市鎮的廉價土地上。

與荃灣新市鎮相隔一小時車程的元朗鄉郊因而改變；

「大概七十年代中，就開始有廠車開到元朗，請大批女仔去荃灣返工，多數係做電子，貪佢有廠車接送，有午餐。」



珍珠本來在元朗一間小型玩具廠工作，後來跟親戚到葵涌當電子裝配員。珍珠說那是間有五百工人的日資廠，一半女仔都來自元朗，她那一條村便有十幾人，其中許多是親戚，大家都是客家人，講自己的方言。珍珠說“來自村的”與“來自城的”工人文化截然不同。

「我地唔鐘意同佢地玩，覺得佢地係飛女，講粗口，佢地係廠都玩到癲，有d做幾個月就唔做。」

珍珠口中，“來自村的”比較“城市”的勤力、聽話、對廠忠心，許多年資超過十年。“農村的”自己走在一起，互相結拜，有自己的“花名”，像奶媽、大老婆、小老婆、大佬……等。（事實上她們不少人便有親誼關係）。

不過，截然劃分的二元世界在1986年的一次事件中改變。那一年公司易名，月薪工人（管理層）都得到賠償，但生產工人卻沒有。工人發動了一個月工業行動，最後幾十人被解僱。不過無論是解僱的或復工的都取得額外賠償。

問珍珠的感受（她是其中被解僱的工人領袖之一），她說最深刻是“患難見真情”。

「有d工友，一齊做左幾年，都有乜打招呼，依家變成好朋友，有d平時對妳好似好好，有事就走左去……。」

工潮令廠內原有的社會關係改變，以「城鄉」族群為軸心的界線轉移到「階級」的軸心上。

#### b) 月荷

月荷做製衣已有十一年，三年前遣散轉當戲院售票員，最近收到通知，戲院很快便會結束。

月荷已婚，與丈夫在1981年從大陸來港，月荷徬徨，因丈夫也正在失業。月荷丈夫（林先生）去年被公司調派到大陸分廠，是一名絲印師傅，也協助行政工作。今年，林先生被調回香港，工資減半，林先生反對，後被解僱。

林先生說，其實在大陸分廠時已萌去意，只不過香港求職不易，才忍氣吞

聲。林先生說在大陸是提心吊膽：

「睇報紙新聞都知喇，d廠火燭，燒死人，政府就捉負責人頂罪，我間廠附近咪試過有咁例子。我同老闆講，叫佢改善安全設施，但佢唔鐘意。佢唔交電費，工人宿舍三個月無電，工人叫我買洋燭，我諗真d，第日火燭燒死人，一定怪我，所以我唔敢俾錢佢。」

月荷同丈夫移居香港前，丈夫在大陸當幹部，負責工業安全，瞭解工人情況：

「我知道係有工人偷公司野，但總唔可以封實所有逃生門，宿舍窗口全部上鐵枝，火燭一定死人……。我無在工廠食飯，鹽水撈飯，加一兩片菜，食完我就肚痾，港商無良，地方幹部都無佢辦法。」做過幹部的林先生同情幹部的處境。

「又有一次，有個工人病倒要入醫院，但醫院要先收錢，收醫藥費，我知道問老板唔會俾，所以響車間發動籌款，點知老板知道之後，鬧我多事，話工廠唔係善堂。」

夾在老闆與工人中間，林先生權充中間人角色。但是好是壞？

「有一次有個外省工人家裏死人，要立即辭工，但公司要扣晒佢d糧，連路費都無著落。佢d親人跪係門口，老板唔理，唯有我自己出路費，勸佢離開。」

眾多矛盾，眾多衝突：新移民、外勞搶奪香港工人飯碗？城市工人歧視鄉村工人？香港管工助紂為虐？誰欺壓誰？這些欺壓又為誰來服務？

工人一般都能指認構成當前失業問題的兩大因素：“工業轉型”及“輸入外勞”。在“工業轉型”問題上，不少人希望政府可扶助工業；在“輸入外勞”方面，則希望政府取消“輸入外勞”政策。然而商會卻出言恐嚇：取締“輸入外勞”只會令更多老闆搬廠到大陸去。

“扶助工業”商會當然不會反對，但“扶助工業”可對工人有好處？怕還得看是扶助誰的工業？不少學者，專家建議政府協助工業“升級”提升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但“升級”帶來就業機會嗎？試以被譽為香港最“自動化”



的電子業為例，在資本和技術不斷提升的同時，工人數目卻從1988年的109,677人下降至1993年的53,591人。

又以傳統以來採用“先進大規模”生產的紡織業為例，當土地炒賣有價，坐擁大型廠房的紗廠老闆登時變成財源滾滾的地產大亨時，誰還稀罕工業政策呢？

所謂“工業轉型”，是資本轉移，資本家追逐超級利潤，將資本由工業轉往金融、地產投資的結果。同樣，工序北移、輸入外勞也是工業資本轉嫁成本，擴大剩餘的剝削手段。

## II. 剝削新形式

七十年代，工業蓬勃時，有大量女性吸納到低工資、勞工密集的電子，製衣行業。然而到了九十年代，當金融、土地資本熾熱投機、引致地價急升，市民生活水平下降時，則連服務業亦陷入困境。然而面對大量被工廠裁減，爭相尋找工作之餘勞動者，服務業資本便乘機調整僱傭形式，大幅壓低工資。

從上述女工個案中可看到，被裁減後，通常只能在服務業內找到兼職、時薪或臨時工；否則就是一些比工廠工更勞動強、工資低的職位。那些身兼家務，照顧子女的婦女，更不用說，只能忍受無保障，工資極低的臨時職位。

我們再看工友的例子：

### a) 雪梅

雪梅在澳門出生，與香港來的丈夫結婚，移居香港，她在香港生的頭三個女兒，都送回澳門讓她媽媽照顧。

「個女六個月大（第一個女），我將佢羅過澳門俾我亞媽湊……佢阿爸（指雪梅丈夫）唔夠野做，多做一份輪班工作，返兩星期放一個星期，又要輪夜，個女嘈住佢……。後來生第二個女，第三個女，都係俾阿媽湊。」

「一九八二年公司執笠，我無野做，身體有事，個女又病，加上那時申請到公屋，咪帶返個女返來讀書……羅野返屋企車……。」

「三個女都係自己照顧自己，大女買菜煮飯，二女洗碗，二女同三女隔日做，照顧屋企。其實好慘，造成子女無父母去愛，我地淨係掛住搵食，佢地變左唔聽話，後來我唔做，都係因為大女唔聽話，知道佢壞，咁就開始無做呢份工。」（當時雪梅在一間羽毛廠工作）。

「但係我先生搵既錢唔夠我地七個人開支，四個仔女（雪梅再誕一子），兩公婆，仲要俾錢我奶奶……個仔要去補習社託管，又要費用……跟住我就轉左去一間藥房做煮飯，因為響同一條村，淨係煮下午同夜兩餐，中午可以返黎睇仔女，照顧家庭。」

後來雪梅轉做美容助理，返半日，但不久又要辭職：

「做左半年，佢（指老闆）想我做夜晚，我話唔得，因為要返屋企煮飯，我想睇返d仔女，又要照顧老人家，做主婦真係好難……佢（老板）開始為難我……我咪唔做。」

「我老公都唔識照顧d仔女，仔女發生乜野事，我仲要瞞住佢，自己一個人去解決……我個大女要睇社工（接受輔導），佢係我做promote（產品推銷員）的時候學壞，所以我以後唔敢接長期野做。家庭主婦好有局限，為左兒女、丈夫，就發揮唔到自己。」

### b) 芍藥

芍藥在大陸出生，廿一歲偷渡來港，投靠親戚，在工廠車花，結婚生下第一個女兒，轉做外發，在家車衫，直至另一個兒子出世，曾外出工作，但幾個月後，便辭退工作。

「我老公做布廠，收入有限。其實我返工廠搵得可以比佢更多，但係唔知點解，人夾人緣，奶奶唔肯幫我湊細路，只好自己湊……等到個女讀幼稚園，佢（奶奶）幫我湊，我就出去做野，湊左三個月，我發覺個仔瘦左好多，佢唔肯食野，我好心痛，唯有買架車返屋企，自己車。」



「那時有個街坊又係車花，又係大陸落黎，佢話不如我地一齊接單，專幫人起辦，好過打工。我叫奶奶幫我睇仔，佢唔肯，我都唔知點解，我又無鬧佢，真想知道點解我咁失敗……個工友後來自己返大陸開廠。」]

但塞翁失馬，芍藥猶有餘悸：

「我唔可以上大陸，佢（指上述街坊）咪自己同老公去囉，我就幫佢羅貨做，無辦法，我唔捨得d仔女，但佢捨得，點知佢個女，響工廠玩較剪，咁就盲左隻眼……。」

「後來兩個仔女都讀小學，我又返出來做野……我做sales（售貨員），一早返工，放工返黎又要做，做到肺病，好彩我阿媽係大陸落左來，由佢服侍我，成頭家都係佢睇晒，我好難受。」

「我老公做餐廳樓面，六千蚊，無休息，其實佢係大陸有學識，但係無文憑，落到來唔適應。最近都好暴躁。維持一個家，每月最少九千蚊，所以我要賣些貨才夠（指做售貨）。為了仔女，我一定要搵野做，但佢日日喊（大女有病），我都唔敢出去做。」

婦女的困境，正好被服務業資本所利用。過往穩定而長期合約的，變成臨時工，散工式，時薪的工作崗位；所有退休、假期、遣散等福利都轉嫁到由勞工自己來承擔。有研究稱這種現象為“非正式化”及“臨時化”（informalization/casualization）。“非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下的新僱傭剝削形式。其動機與工序外移、輸入外勞並無本質上的分別。

### III 生計如何安排

十個工友被訪時，只有四人有穩定的全職工作，她們是詠娟（電子）、香棠（電子）、珍珠（文員）、月荷（售票員）。其餘各人正處於失業或半失業狀況。

雖然說“工業轉型”帶來的是大量工作機會消失，失業工友難以再找一份工作，但翠蓮、蘭秀、玲瓏、秀菊的想法和對生活的安排，則顯示女工也並

非單只是無奈的逆來順受，在環境尚許可的情況下，仍保有自己的尊嚴作出抉擇：

#### a) 翠蓮

翠蓮雖然在工廠遣散後，嘗試了多份工作，其中卻也不乏自己辭工的例子：

「有個同事做校工，問我做唔做，十個鐘頭一日，人工四千七蚊、三百蚊飯錢，好刻薄，做了一個星期唔做……我唔做之後，半日內就有廿幾三十人問工……好得人驚……。」

「八十年代個時話行頭差（指製衣）、但差極我地既人工都比出面好，售貨員，辦公室助理，都無我地唔夠工開咁多人工。」

翠蓮突然發覺九十年代的服務業比八十年代不如，這使她更加懷念工廠時代的生活，因此更加無法接受服務業“臨時化”的殘酷現實。

「我問過一間地下鐵舖位，佢話每日做兩個鐘，但我唔識打機（指收銀機）就只有廿二蚊一個鐘，我最後都無去見，因培訓局俾我讀電腦，依家仲讀緊。」

（問：學電腦有用嗎？）

「學電腦，其實心知無人請，我預左啦，不過現在電腦好普遍，而且上堂唔駛錢，政府仲要俾錢我咪去學囉。」

這種抗拒“工業轉型”、“臨時化”的心態，其實普遍存在：

「好多勞工轉工，因人工少，做得唔好又容易俾人炒……心有不甘，跟著士氣低落。」（蘭秀）

「那時（指婚後）依賴，以為有老公養就得，價錢一唔好就唔做，點知而家仲衰，成件起都係得四個半……其實都仲有得做，我無心機再做。」（玲瓏）

「我而家都唔係好積極搵工，想等仔女大d再算。」（翠蓮）



b) 秀菊

秀菊在未找到接待員之前，曾失業幾個月。之前她在一間百貨公司當售貨員，由於人事複雜辭職。問她失業生活怎樣安排：

「電子廠遣散時有二萬幾蚊，用住先，而且老公返緊工。不過佢人工都唔係幾好，兩年無加人工，只有七千蚊。」

女工多是在六、七十年代工業蓬勃時投入勞動市場，現在一般是三、四十歲，已婚，由工廠遣散出來，她們抵制低薪的武器就是手上少量的遣散費及丈夫微薄的收入。

但可抵抗多久？

c) 雪梅

女工不會坐以待斃，在抵制低工資就業的同時，她們運用智慧，設法創造資源，來應付生活的需要。

雪梅被迫辭去葯房煮飯工作後，自己創業：

「無做煮飯，我就去學美容……考試得左，我就買d化妝品返黎，響自己屋企騎樓做；前後俾左五千蚊學費……用左萬幾蚊買儀器、用品，就係屋企開檔。」

「派單張，派傳單，個女幫手入信箱，朋友幫手宣傳開去，每月搵千幾二千蚊，有時朋友結婚化粧，就賺得多d。」

不過，自我創業也有許多限制，尤其資金不足，以家為舖的困難更大：

「做左時間好唔固定，有時d客夜晚都黎，我老公反對，話成日咁多生面人出出入入，唔好！晚上我老公又響度，佢唔鐘意，佢好麻煩，咁咪唔做……做左年幾，賺番成本。」

d) 芍藥

當雪梅打算結束美容生意時，另一邊，芍藥正盤算如何開始。兩年前，芍藥得病，休息了兩年，其間曾替妹妹湊仔：

「我也都學，因搵唔到野做，學facial（美容），諗住學左返大陸做……我個妹都有學，我幫佢湊仔，佢返黎教我。兩姐妹，諗住返大陸搞，貨都買晒，點知大陸個舖位傾唔成……而家諗住係屋企做，自己派咭片，做街坊生意。」

芍藥又試過做小販，每天擺幾個鐘：

「我識sales（推銷員），知道點羅貨……每日擺兩、三個鐘，都有三、四十蚊，羅貨要靠眼光。以前做時裝舖售貨時，買貨頭貨尾夜晚去賣，一晚賣百幾蚊，都幾好搵，但好辛苦，而家唔易做，客人都窮，唔會買……最怕係俾小販隊拉。」

除了自我創業外，街坊間亦發揮互惠的幫助。冇做小販後，芍藥仍間中去批發商處羅貨：

「買返□，同街坊一齊分囉！你知喇，呢度大家d細路差唔多大，買d衫仔返來，邊個要咪要囉。」

（問：會唔會賺？）

「自己街坊唔會賺既，有時我地會一齊去買生果，例如買橙，買榴槤，幾個人手提車去搬返黎，返黎一齊分……。其實我同有d街坊d性格都唔係好夾，但隔離鄰舍好重要，大家要互相幫助。」

IV. 結論

所謂“工業轉型”其實是資本轉移的結果，資本家為追求更大利潤，把資本從工業轉調至投機的金融、地產業，或把工序外移至低工資，低地價地區，造成大量製造業工人因此而被轉行。勞動力的轉移，令服務業資本得以乘機將僱傭關係調整，轉變為臨時化、兼職、時薪以壓低工資，加強勞動強度。

「工廠·廚房·垃圾房」——香港女工十五年



部份被淘汰的製造業女工，在兼負家務的重擔及家庭收入不足的情況下，亦被迫忍受“臨時化”的工作，滿肚怒火。另一部份，在經濟壓力還未折服他們之前，仍負隅頑抗，拒不接受低薪工作，憑藉手上的遣散費及家庭的收入。然而，當遣散費用盡又或家人亦同樣面對轉業時，也不會剩下多少的選擇。另一種方法是從事薪資工作以外的事業，如小販、美容到自我創業等，工友也往往發揮互惠合作精神，如以共同購物來減低生活的成本等。

在種種生活壓力下，女工不滿自不待言，當我詢問導致就業困難的原因時，大部份女工都指出了“工序外移”及“輸入外地勞工”兩大因素。然而當我們聽取女工的工作歷史時，卻不難發現類似的族群矛盾，在香港工業化不同階段都曾以不同形式存在過。早期是城鄉工人的矛盾，接著是新移民與土生土長工人，最後是外工與本地工人的矛盾。更甚者，隨著工序北移，矛盾更擴散到中國大陸的香港管工與大陸工人之間。

我們無需質疑工人所講故事的真實性，它們都發自工人內心，然而在兜兜轉轉不同工人族群的矛盾變化中，有一點始終沒變，那就是資本家的超額利潤。事實上，正是這些分而治之，讓工人互相排斥的策略，才保證了資本家的利潤。這點令我們面對紛紛提出“反對輸入外勞”作為回應“工業轉型”的香港工運界時，作為其中一份子，不能再三深思。在前線基層權益組織中，一方面面對來自工友因具體生活壓力、要求停止輸入外地勞工的訴求，但同時又要提防掉入造成工人族群矛盾的陷阱；這是權益和意識工作的一大難題。

另一個常聽到的口號是“建立工業政策”，支持工業升級。不過，工業升級卻不表示就業可得到保證，一些採用自動化生產的行業工人人數大量下降便是一例。然而，工人卻懂得自我創業，又或以互助形式紓緩經濟難題，不過在缺乏資金及支援的情況下，再加上家庭責任的壓力，個人的創業也不易經營；但互助的購物方式雖未見經濟成效，卻已達到街坊間的合作、互助支援網絡。

## 面對女工的經驗，我們覺得有三點值得思考：

(1) 在資本轉型下，女工首當其衝，而傳統的工會運動方法著重廠房組織，旨在吸納在職工人為會員。這點令失業者無法找到位置，即使找到工作，但就業形式的“臨時化”、“兼職化”及工人行業的不斷轉變，令工人對傳統行業工會無法產生歸屬感。如何尋找新的工運策略成了當前工運——尤其是婦女

工運的重要議題。

(2) 從女工的經驗可看到，婦女在生活上的策略和安排，薪資工作未必是婦女唯一樂意的選擇。有時，如家庭經濟許可下，她們寧願放棄工作而肩負照顧子女的家庭責任，以子女為重。當然，提供廉價高質素的托兒服務可為婦女提供更多選擇機會，但除了薪資工作可供選擇外，婦女運動的方向，也可以是鼓勵婦女建立自主的生計，可以有各類創業及互助活動。多元化的自主生計安排，往往較薪資工作更能適合女性。

(3) 如何突破狹隘的族群思想，建立更廣泛的工人團結？這顯然不能一蹴而就，也不需要美化這種團結，但也決不只是一種烏托邦。當不同族群互相排斥時，資本的主導優勢便更難打破。

現時香港工運呈現一種矛盾的性格，在泰國及大陸工廠火災事件中，不少工會，團體都施予援助，但當“反對外勞”的旗幟豎起，他們就充滿矛盾，又或掉進資本家的陷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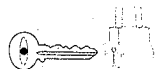
如何建立起工人的團結，不以地域為限，需要本地工人與外地工人的更多接觸及瞭解。唯有這種精神才能使區域的或至洲際的團體交流，變得有意思。

## 未來行動策略建議：

(1) 發展地區性的婦女交流中心：既然傳統工運組織方法並不能容納現時被“邊緣化”、“臨時化”了的婦女勞工。而這些婦女勞工已甚少在工廠區出沒。所以，應推動以屋村為基地的“勞工社區化”策略。為女工提供一處共同交流生活，爭取權益的組織點。

(2) 協助婦女發展多元化的自主生計：以合作社形式，協助婦女建立互助活動及自主的創業、或就業。這既適合女性的生活安排，亦能建立婦女間，或社區中的互助互惠生活模式。

(3) 與外勞團體建立更多的溝通，交流：除了對引致工人矛盾，互相排斥的問題多作團體之間交流外，亦應讓更多工友多接觸和了解不同族群工人的生計，建立更多溝通途徑，建立彼此的消息交換。



## 香港婦女勞工運動發展

吳曉真

在今日香港的主流社會講婦女勞工運動，似乎是有點落伍了。曾幾何時，基層婦女團體是社會上推動政治議題最活躍的其中一員。或者也不是太多人會想起，在70年代，香港的婦女運動其實是由婦女就業、同工同酬運動開展的。

不過，婦女勞工運動在過去幾年間在主流社會的靜默，不代表它在運動上的消沈。香港婦女勞工協會成立於1989年，15年來一直是本地唯一旗幟鮮明以婦女勞工為組織對象的機構。倘若大家稍花一點時間去了解，便會發現女工協會以及其他一些姊妹團體在過去十數年間，在社會環境不斷轉變，在女工問題由中心愈推邊緣的過程中，仍無減生命



力，並不斷反思、檢討運動方向。

婦女勞工運動既是婦女運動，也是工人運動。或許正是在這狹縫之間的曖昧身份，令女工運動帶有強烈的內省性。本文旨在追溯香港婦女勞工運動在過去15年間的發展軌跡：它如何在婦運與工運之間、在香港社會經濟環境的不斷變遷中，尋找發展空間；如何在女工身份失落的千禧年代為「女工」和「女工運動」重新定位。

## 香港早期的婦女勞工運動：一點背景

六、七十年代香港工業生產最旺盛時，女工佔工人總數比例由57年的41%增至60年的46%；大批年輕女性在此時投入勞動市場，按1966年的統計15-19歲的女性約一半為勞動人口，20-25歲的組別更達六成，這還未包括借用別人的身份證到工廠打工，不計其數未及法定勞工年齡的女童工。女工除了要面對刻板機械性的坐line日子、養家的重擔、晚晚6點半的夜校生涯，還要提防工業意外、性騷擾，及忍受種種無理苛刻的規條。當年一些年輕女工面對工廠種種不公平待遇，在彼此訴苦之時，也嘗試聯合起來爭取權益，例如在製衣廠，整條生產線的女工與管工或廠長講價錢，團結一致爭取加薪的行動不少。

七十年代初期開始，先後出現不少類似工會及工人小組，爭取工人權益及改善勞工法例，獨立自發組織亦積極支持當時的工潮。73年工人自發組織的電子業工會成立，工會以外的女工小組也紛紛出現，如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婦女組(1978成立)，吸引沒有參加工會的女工。女工人數雖不斷上升，但參與工會率偏低：76年女工只佔工會總人數22%，但相比其他行業，僱用女工最多的電子、製衣業，女工參與工會率最低，分別是1%及6%。當年工會運動政治氣氛濃烈，工會數目繁衍重疊，勞工界內嚴重分歧，令一般工人對參與工會卻步。而女性因傳統性別角色，不慣拋頭露面，怕影響婚姻家庭生活，加上缺乏託兒服務支援，要在返工顧家之外，參與工會及小組，需面對社會家庭極大壓力。

但在這些先天不足的環境下，婦女運動和勞工運動也曾結合力量，為女性權益寫下重要一頁：

六零年代初女性公務員爭取同工同酬運動，起初是殖民地政府一群外籍女性高級公務員發起，後得以陳方安生為首的華人女性高級公務員的支持。1963年多個婦女團體和工會共同組成「爭取同工同酬工作委員會」，向港府施壓，很快擴展至護士及教師行列，終在1971年取得成功。

七零年代末的爭取有薪分娩假是另一里程碑：雖然政府於70年通過10星期的分娩假，但一直沒有要求僱主支付薪金；1978年由香港婦女協會及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發起「爭取有薪分娩假期運動」，並得到廿個勞工及社會團體支持，終於1980年立法局通過修訂法例，1982年開始女性僱員可享受這個運動的成果。



有論者指七十年代的工人運動是以社區為本，關心的不只是工作間內工人的遭遇，更關心下班以後工人在社區內的日常生活。自七十年代起，香港社區及居民組織蓬勃發展，不少基層女性由關心家庭環境進而積極參與改善社區設施，為基層女性參政打下基礎。1982年香港舉行首屆區議會選舉，候選人當中有20名是女性，其中5名當選。她們中有家庭主婦，女工和社會工作者。「工廠皇后」或者是美其名，但儘管這時期婦女勞工面對的工作、聘用條件亦有待改善，製造業始終為她們提供了經濟獨立的機會與自信，在車間與其他女工的聯繫亦提供了重要的人際資源。製造業的衰退間接奪回了這些基層婦女的機會。

## 成立在過渡之中：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初

工廠北移的情況，其實早在八十年代初已有出現。中國政府在七十年代末期提出「四個現代化」的口號，在珠江三角洲開發經濟特區吸引外資設廠。中國大陸的廉價勞動力在短短幾年間，吸引了大量外資湧入。到了八十年代中，考慮到內地龐大的市場，早期對中國政治無信心、擔心配套不足的大廠，都開始大規模遷移。

大量大廠北移，意味著大量本地工人被解僱。由1981年至86年間，香港大約有112,000工人離開製造業。作為香港工業的中流砥柱，女工在這一輪的撤廠中，自是首當其衝。

在勞資糾紛特別多，而工會在香港又沒有實質集體談判權的情況下，這個時期香港勞工團體的角色甚為吃重。在個案跟進的工作上，勞工處和勞審處一般都接受勞工團體跟進個案或上也很普遍能代表工友。勞工團體又不時會組織工潮，而進路都較激進。工人運動愈來愈集中在就業權益的問題上，開始脫離了七十年代社區為本工人運動的模式。

### 1989年女工協會的成立與早期活動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便是誕生在工業轉型如火如荼的80年代末。同年（即1989年）成立的還有後來的聯合工會「大哥」職工盟。

女工協會成立之初，並沒有甚麼條件開展很多工作。這時期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組織工潮及法例爭取上。由於當時主要成員都是來自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在資源限制下，遇有重要勞資個案或大工潮的時候，女工協會往往便聯合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合作跟進。

當時女工協會職員只有一個（即嚴月蓮），很多其他工作得靠義工的幫忙。創會時所謂的會址也只是借用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在佐敦的辦事處，往後數年，也是輾轉租借團體的地方辦工。

沒有固定辦工地方卻反而令女工協會更接近群眾。由於租借地點通常在寫字樓大廈，對組織和接觸工友都不太理想，女工協會成員便主動到工廠區擺檔，直接組織工廠女工，同時積極跟進社會事件和勞資糾紛。這種以行動為主的組織形式一直主導女工協會往後十年的發展。

或者在不少人眼中，婦女勞工運動與整體勞工運動並沒有甚麼兩樣。事實上，早在女工協會成立初期，便一直有人質疑：為甚麼我們需要一個只以婦女勞工為服務對象的勞工組織？到底一個婦女勞工組織的價值在哪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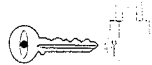
當年參與創會的成員不少是其他勞工團體的成員，她們的女性身份與在勞工團體工作的經驗令她們發覺，傳統工會或勞動團體由男性主導，往往未能回應一些女性勞工面對的獨特問題。不少女性議題如產假、工時限制、托兒服務等，都未能在團體內引起大多數的關注。婦女勞工運動在香港以團體組織的形式出現，便可以說是緣起於這一批女性工運份子的性別覺醒。

### 百花齊放的婦女運動：基層作為主調

八十年代「新女性運動」在香港的發展為這種性別覺醒提供了契機。從婦女運動的脈絡去看，女工協會的出現正在婦女運動組織百花齊放的發展階段。有別於過往將婦女規限在傳統角色的婦女團體活動，「新女性運動」在八十年代由一群在西方留學的年輕女性知識份子蘊釀產生，強調女性的並如經驗，探索「女性在社會受壓迫的根源」。1982年新婦女協進會的成立正式標記著「新女性運動」的開展。

在同一時間，政制民主運動在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下促成。一如當時的工





人運動，婦女運動亦與民主運動合流，帶政治化、本土化的趨勢，而且在社會論述普遍關注民生的氣氛下，以婦進為首的女性團體亦甚為強調組織基層婦女。婦進早期設立的基層組吸引不少在其他基層團體的婦女參加，其中包括嚴月蓮、杜潔麗等後來成立女工協會的中堅份子。

在整個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不同類型、主力發展不同領域的婦女團體及女性工作小組湧現。即使並非以性別或婦女問題作為主要議題的社會服務團體，包括社區中心等，亦針對婦女服務作出研究。強調女性角色、強調基層的八十年代婦女運動為婦女勞工運動開拓了一個新舞台；直至九十年代中，女工運動在整體社會運動、民主運動中，都擔起一個不小的角色。

### 艱苦中奮進：踏入九十年代中

進入九十年代中期，勞工市場的狀況、工人運動的發展，以及整體婦女運動的發展，卻令婦女勞工運動處於一個必須要不斷進行反思的狀態。同一時間，本港的婦女運動又轉換了一個新的面貌，從關注社會民生轉向文化議題。女工運動在這其中，雖然聯繫更緊密，矛盾卻是明顯的。在很多議題上，可以見到女工運動夾在女性和工人兩個身份之間行動的困難。

#### 女工運動的新難題

製造業衰退經濟轉型，婦女勞工面對的問題比以前龐雜，為女工運動帶來很多新的難題。在工廠遣散和失業問題嚴重的情況下，女工面對的當務之急，固然是爭取從各方面，處理工廠欠薪欠遣散費問題。但長遠來說，就業輔導、轉業培訓等又亟待發展。政治倡議和法例爭取等工作本來極為重要，在發展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卻又難有進取的建議。至於之前女工運動積極推動的倡議項目如更優的分娩假、其他假期、工資的規定等，更不得不暫放一邊。這不單是因為人手資源應接不暇；更是因為在擔心飯碗不保的陰影下，一向被社會認為應安份守己、克盡己職的婦女勞工失去參與工人運動的信心和動力。

這時期女工協會除了嘗試透過法例爭取凝聚女工之外，做得較多的，是提供轉業培訓的過程。翻看當時女工協會出版的通訊《女工一族》，不時有關於轉職「新興行業」如傳呼通訊、百貨公司促銷員等。可惜，這些行業多數

甚為「短命」— 女工剛熟習中文輸入法，傳呼業已開始衰退（或撤到內地）了— 要為被遣散女工轉職實在不是一件易事。

有些時候，團體的倡議與群眾自覺的需要又未必協調。在90年代後期，有鑑於女工就業「兼職化」的趨勢，女工協會在就試過提出爭取「兼職法」保障兼職工人，防止僱主利用兼職制逃避法例要求對工人承擔。可惜，倡議未有獲得多數女工的支持。這主要是因為兼職女工們其實仍然不斷在市場尋找全職工作，她們尚未相信市場原來只會接受她們當兼職。對她們來說，兼職只是暫時的，「兼職法」便顯得可有可無。

鍾婉儀在本書訪問中提到，女工協會不會「為發展而放棄群眾」。在為女工尋求出路的過程中，女工協會經常爭扎於許多原則與理念的問題，相比其他工會或勞工團體，行動上便較多考慮和困難。這時期出現的輸入外勞與再培訓兩個議題便很明顯的例子。

至九十年代中到九七回歸後一段時間，政府又多次提出輸入外勞政策。在失業問題困擾香港下，社會上反對的聲音自然很大，並普遍將失業問題與外勞問題連上。而這反對聲音中，又少不免有對歧視外勞和分化的成份。不少勞工團體，包括女工協會，既要反對外勞政策，但又不想變成歧視外勞，內部壓力很大。

對女工協會來說，外勞同樣是工人，而工人應有權到不同地方工作。而且外勞常被剝削



「工廠、廚房、垃圾房」——香港女工十五年



，理應要保障他們的權利。然而，當時不少工友堅決反對外勞，更質疑女工協會在這問題上未有盡力。到後期，女工協會唯有盡量協調，強調反對外勞政策，但不反對外勞本身。儘管如此，不少成員還是很感不安。

同一時間，政府面對反對外勞政策的聲音，推出「再培訓計劃」，吸引工會申請撥款，意圖減小批評聲音。雖然不少團體都申請參與，女工協會卻認為「再培訓計劃」只是轉移失業問題，如果團體參與舉辦，就等於認同了政府所講「失業是個人學歷不夠，個人要進修」這種講法。再者，計劃中有部份款項來自外勞和外傭的工資，經過一輪商議後，女工協會就議決不申請這個資助計劃。亦失去了一個爭取資源、擴大組織的機會。

### 談階級還是談性別：我們是工人，也是女人

女工運動面對的另一個主要困難，是女工議題變得愈來愈不受重視。在運動連線上，女工運動一方面是婦女運動，另一方面亦是工人運動。但進入九十年代中，在整個社會氣氛的變遷下，婦女勞工的議題在兩者之間似乎都找不到一個清楚的位置。

在工運方面，當整體社會經濟持續衰退，失業變成是社會「大環境」的問題。失業問題中的性別差異，如婦女就業困難、「彈散化」、婦女就業貧窮等問題，就被隱而不宣。

同一時間，由於勞工法例問題和工潮特別多，工會的角色開始較勞工團體的角色吃重。勞工團體遇有大型工潮一般會轉大型介工會處理，與資方談判，勞工團體從旁協助。這樣一來，遇有勞資問題的工人傾向覺得應加入工會。這與80年代以前勞工團體在工運中擔起主要角色的情況就很不同。像女工協會一類的工人團體，必須重新定位。

至於婦女運動方面，香港婦女運動在九十年代進入了「文化的年代」，強調女性自我身份的建構，較多討論自身經驗、性自主等議題。這個情況在婦運的內部製造了意見上的分歧。

香港婦運在九十年代中轉向文化議題，最主要大抵是西方基進女性主義者對年輕一代本地女性主義者的影響。她們傾向關注性/性別，身體/身份的問題。

基進女性主義者認為，性解放是女性解放的關鍵，主張從身體政治著手改善性別不平等。199X年台灣學者何春蕸來港，在大學演講，適逢校園的幾宗性騷擾事件正鬧得鼎沸，令這些性/別議題更深刻地帶到校園之中，對該代的大學生產生很大的衝擊，紛紛成立如「XX小組」、「女妍社」等小組，討論身份/性別的文化議題。當年活躍於這些小組的學生，不少在畢業後投身於婦女運動倡議身份政治的文化議題。部份更創辦了「不示弱女人」等的新一代婦女團體。

另一個可能的因素，是與運動的分工有關的。在整個八十年代，出現了不少以某特定婦女群體為組織對象的婦女團體：針對女工有女工協會、受家暴婦女有群福及和諧之家，後期又不同的女同性戀者團體、單親協會、新移民團體等。婦進和女協作為女性主義團體的代表，在以往需要回應各項有關婦女的議題。但當上述團體出現後，不同議題有不同的團體專注和深入的認識和回應。這或許也間接令婦進和女協的新一代在尋找位置時，專注於文化議題及研究。

性與身份等議題固然是為女性主義運動打開了一個新的窗門，帶來了新的角度。不過，對於不少基層婦女來說，她們最關心的年齡歧視、就業困難等政治民生議題仍亟待緩解。新一代婦運以文化議題為核心，難免令基層婦女及基層婦女組織者感覺疏離和不被關注。這並不是說基層婦女面對的問題，如失業、家庭暴力、單親婦女、新移民婦女等問題不被關注，然而，「弱勢社群婦女」面對的問題似乎被定性為社會福利問題，而性別問題卻只局限於性議題、「文化議題」。在這個狀況下，女工運動在整個婦女運動中，又被推離中心。

在婦進十週年的研討會上，參會者便就所謂的「中產」與「基層」的分歧進行了認真的討論。當提到女工與基層婦女面對的問題，不少女性主義者似乎認為這些都是階級問題多於性別問題，而婦女運動應以性別先行，不應談階級。

女工問題既是性別問題又是階段問題，夾在工運與婦運之中，前者認為女工運動太強調性別問題，後者認為女工運動太堅持階段問題，便掙扎於「兩邊不是人」的困局。

### 回歸後整體婦女運動的發展

在婦運中出現「中產」與「基層」的矛盾的，其實不單是香港。事實上，婦女作為一個集體，當中的階級、種族、年齡等等的差異，正是西方所謂「第



三波女性主義」(Third Wave Feminism)的中心議題。婦進十週年的研討會名為「差異與平等」。將婦女間的差異放上議題，討論如何在差異中尋求平等，這亦是香港婦女運動的一大發展。

撇除所謂的階級爭拗，自九十年代，香港的婦女團體合作是十分緊密的。這時期婦運界不得不提的一件大事，是1995年在北京舉行的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香港婦女團體大概分兩大陣營參與，分別是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及後來的平等機會婦女聯席。前者主要由親中央政府的名流政要組成，後者則是本地十多個婦女團體組成(女工協會為其中一員)，其時頗有壁壘分明的形勢。

世婦會的合作經驗對聯席回港後積極發展有很大推動。世婦會上，香港簽署了CEDAW公約，落實成立平等機會委員會(1996)及婦女事務委員會(2000)，促使婦女團體成立平等機會婦女聯席，監察政府執行公約的情況。在這以前，婦女團體雖然常有集團行動，卻是傾向「事工式」，較難有策略性或方向性的討論。

## 工人身份的失落與“女工”意義的重塑：二千年至今

### 小政府下的貧窮女性化

香港政府致力要做「小政府」的方向，早在九十年代末已有趨勢，在2000年更明確定為施政方針。在小政府政策下，保障民生的政策不單沒有改善，更變本加厲削減。幾年間，政府不斷大削公共開支，同時間削減撥款、加快外判、削公務員開支、削社會福利等等。小政府背後是自由市場的大發展，政府對大財團優惠的政策也紛紛出現。這種情況導致社會貧富懸殊越來越嚴重，社會日益分化。就業市場的困難尚未過渡，婦女失業處境更不樂觀。中年婦女面對的「彈散化」已是常態，婦女貧窮女性化更加明顯，卻未見受社會重視。根據黃洪、xxx在2000年的調查，本港就業貧窮，即收入不足\$4,000的人口中，婦女便佔了八成。而在2003年，每11名婦女中便有1名失業。

然而，如前所述，當年青人和中年男性皆面對失業問題，婦女失業和就業貧窮問題變得「不嚴重」，不成問題了。

### 誰是「女工」？工人身份的失落

近年社會學家開始提出「婦女隱性失業」現象，即婦女由於就業困難，被迫成為「家庭主婦」，而傳統人口統計卻將「家庭主婦」排除在適齡就業人口以外，未能反映她們的失業狀況。

認為所謂家庭主婦不可能與「工人」拉上關係的，不只政府或統計學家。1996年，女工協會遷至觀塘翠坪村現址，不少「屋村師奶」對女工協會的招牌望而卻步：「我以前做過車衣，依家無做，咁入唔入得去架？」至於白領的打工一族，又無法認同自己是「女工」。到了二千年，一般理解香港工業已不存在，所以大多數人對「女工」這稱呼都不太認同。畢竟過去所謂「女工」是指製造業的女性工人。

工人身份失落，對整個工人運動來說，都產生深遠影響。因為製造業工人數量劇減，不少勞工團體都收縮或專注於再培訓項目，工人議題就更集中在工會手上。九十年代過後，比較活躍的勞工團體寥寥可數。至於志願機構內的勞工服務更少之又少。

面對工人身份模糊和不穩定，婦女勞工運動在策略上必須要重要思考：現在誰是組織對象？組織方法又如何才有效恰當？工會是服務在職工人的。對於傳統上以女性為主要對象的工會來說，解決的方法就比較直接。成立於1985年的「成衣製造業職工總會」在1995年正式易名為「成衣業、文職及零售業職工總會」，以吸納經濟轉型後，從成衣業轉投文職或零售的女性工人。作為一個社運團體，這些問題對女工協會來說，需要思考的空間卻大得多。

## 香港婦女勞工運動 —— 再出發

### 女工社區化：摸索與實踐

本書的訪問中，不少曾參與女工協會工作的被訪者都提出了兩個「女工消失」後的組織概念，即「社區化」和「生活化」。當傳統工廠女工失業，婦女就業「彈散化」，工廠不能再作為組織女工的場地，要組織勞動婦女，便要從



屋村社區入手。而議題不再單是婦女就業問題，更關注生活權益。

社區化、生活化的一個其中一個方向，是擴大組織對象，包括家庭主婦。不少女工協會以往的組織對象失業後「回到屋村」，成為家庭主婦。這令女工協會重新思考「勞動婦女」這一概念。其實，自90年代中，女工協會開始由強調就業婦女轉為強調基層婦女，並突出無酬家務勞動概念。1996年女工協會搬到屋村，更加强了發展這方面工作的需要。近年女工協會的幾個主要發展項目，包括合作社、與樂施會等團體合辦的「綠領聯盟」、關注清潔工問題等，都是社區化、生活化方向下的工作。針對家庭主婦的活動，還有時事論壇，訪問邊緣婦女等等活動，旨在開拓婦女生活空間。

### 工人·學生·組織者

是巧合也是有意栽植，九十年代末香港工運的另一發展特色，是越來多大學生加入為勞工/工會組織者行列，這在女工協會也不例外。過去，工會組織者多是由資深工友或理事出任，近年卻有



更多大學生加入，而工友身份的組織者愈見減少。對女工協會來說，如何平衡和融合大學生組織者和工人組織者，成為內部不斷反思的一個問題。從潘藝到阿Joy，在本書的訪問集，幾乎每一位以大學生身份加入女工協會的職員或執委，都提到作為「大學生組織者」的種種反思。當中「工友」與「學生」共同組織的磨合過程，也為整個運動帶來新的沖?與角度。這一代大學生組織者對女工運動與整體婦女運動的合流亦發揮著一定的作用。在所謂中產vs.基

層的矛盾中，新一代基層婦女組織者如烏蠅、阿靚，都積極以不用手法嘗試將新婦女運動結合到女工運動中。

### 結語：在政治舞台上重尋角色

香港婦女勞工運動與整體的「新婦女運動」一開始誕生於本土化民主運動的大流，走到回歸前後，日益政黨化的政治環境卻逐步收窄婦女團體在政治上的參與空間。進入二千年，在不少事件上都反映婦女團體正積極在政治參與上再出發。2000年的立法會選舉，平等機會婦女聯席發表《二千年婦女聯合政綱》，邀請參選議員和政黨簽署。其中在性工作者問題上，由於出現政治團體「出爾反爾」事件，婦女聯席接連在報章傳媒對民協及其他保守派政團作嚴厲批評。雖然最後政團未有讓步，婦女政綱論壇及繼後的報章「罵戰」對政治團體也做成一陣輿論壓力。2004年立法會選舉，婦女聯席亦再次舉辦婦女政綱論壇。婦女團體在策略上應如果處理與政治團體，特別是較保守政治團體的關係，應是往後亟需討論的一個問題。另外，2003年尾的王見秋事件，王見秋最後辭職在很大程度上，是平等機會婦女聯席連番追擊的功勞。是次爭取成功，亦令民間婦女團體在政治範疇內重獲不少自信。

本文落筆正值女工協會十五週年，除了上述的種種理念上、方向上的反思，女工協會亟需尋求解決方法的，是財政上的嚴峻困境。香港回歸以後，國際性非牟利團體逐步將資助撤出香港。本地組織以往普遍沒有籌款基礎，導致不少機構出現重大財政困難，女工協會當然亦不幸免。經過大半年的「半價支薪」，現時已要面對無法負擔全職職員的事實。經過十五的艱苦經營，似乎又要打回原形，在最少的資源之下，重整旗鼓。

近年來，我們都說「有危就有機」。在此亦謹祝願香港婦女勞工協會憑著十五年的經驗與組織基礎，能集眾人之力，找到新的經營路向與資源，繼續為在不同範疇努力的勞工婦女爭取工作尊嚴與平等權利。

「工廠·廚房·垃圾房」——香港女工十五年



## “自主團體的內部緊張關係”

### ——學生與基層

撰文：基層仔四九八

團體內部緊張關係有乜特別？

因為這是自主團體。

自主團體有乜特別？

因為特別重視“基層”和“自主”。

讀者恐怕正追問：呢個作者又點界定基層自主？又作者自己站在甚麼位置去界定？

這問題容後回答。

先告訴大家基層自主團體的內部關係會點緊張、會對基層運動點解咁大影響。

非常同意一位朋友所言：“‘基層’作為身分，呼召其它身分進入一個共同位置，結成憂戚與共的關係。”大學生頂著真誠熱血的心因關心基層而加盟缺乏資源的基層團體，以所學及對基層的信念、分析、理想為基層工作，組織基層……誰敢說他們並非基層！但可惜發展下來又給這位朋友言中：“大學生帶著不同的思考方法和習性，進入基層團體，與團體內基層成員及基層出身的工作員，難免分歧。那些越有‘群眾’基礎及強調會員自主的團體越有這種緊張關係。”奇怪在他們的分歧並非因為對某事件立場不同、更無涉任何人沽名釣譽等情況。真箇如此的話，是熱血大學生還是基層出身成員有問題？

他們的分歧嘗試以一些例子反映：

當各種爭拗到達難分的階段時，只要基層出身工作員話：“我來自基層、曾經歷過，比你更接近基層，所以你的意見唔實際。”那麼你大學生再發言時就收不起那些青筋、理不順暢那條氣……。

當有事情令成員群情洶湧，怒火、激憤、感歎、難過時，大學生或者會發覺

基層出身工作員可以比基層的會員更大怒火、更激憤、更感歎、更……而自己的感同身受明顯差一大截，看在成員心裏，體會很不一樣。

在分析討論中，大學生充滿自信地發表：“深層分析……從宏觀來看……由社會學角度……以社工的專業……”時，基層出身者在頭腦漲大、瞳孔放大情況下雖然不同意但也找不到合適插咀的空間，其實更多都不知講乜。

大學生出於關心、熱誠和想像，構思了大堆計劃，但基層出身的同事卻處處質疑、對嘗新或挑戰表現抗拒，你可以直覺到那種保守、自我保衛是出於無信心、擔心、焦慮同不安……。

團體工作還有一大堆諸如文字、電腦、歸納、看或整理資料，帶小組、主持、記錄……等伎倆，普遍院校有類似訓練，但團體鮮有在職訓練。大學生背著本來就負荷不來的工作，對著做不來這類工作的基層同事，當中彼此的張力……。

以上的例子只說明大家分歧並非出自立場或原則，是大家如何面對和處置彼此差異。

其實大家都有問題，但我不認為就此來個“各打五十”或大家都改善……就能扯平。我認為大學生有必要作更多的自我檢討和改善，如果大家覺得這對大學生不公平，我會話：“是的，因為社會已經對基層出身者不公平不公道，所以大家位置和權力關係本就不平等不一致，所以要改變這個不合理，就不可以用一樣的要求對待大學生和基層出身者。”就好像我會話男女之間權力關係不平等、社會條件差異大、起步點不同，所以改善婦女地位不是簡單向男人和女人都提供同樣資源和服務可以解決……。

在團體積極參與的基層出身成員或組織者，大多是中年，大多也經歷了那個團體所關注的問題處境……如經歷反抗家庭暴力、失業抗爭、工潮行動等，對同處境的基層自會深刻感受，他們禁不住的那種怒火、激憤、感歎、難過，其實充滿感染力，因為那時他對自己充滿信心和激情，不要搬出甚麼話組織者不應比案主(client)更……。虛心的問問基層會員他們最舒服聽組織講道理、還是喜歡這個“過火位”的組織者將他們的情緒加上幾分肉緊的認同感？！

當然要理解大學生當被基層出身者大噴代表基層口水時那種無奈、無癮，可



以想像基層出身成員那些言論在這情況下多數無理，恐怕是找不到說服大學生的理由時，就推出你唔係基層的言論。想深一層，即使基層成員的抗拒真的“說不出”（可能是不懂說或不知原因）道理，對於要走入基層的大學生這時不就是最好的考驗嗎？這時何必拘泥於計較他是組織者不是基層會員等角色，他游走於組織者與會員之間，你又何妨在同事、組織者，跟訓練員之間穿梭往來？



有一點非常重要，何解作者我堅持大學生要在基層組織者身上學習、或花點氣力去幫基層同事，上面已提過是因為不平等的起步點和權力位置。要在基層團體中做好、有所發揮，對基層出身成員來說他們要花的力會是好幾倍（比大學生）。大學生因

為是大學生，未站出來身份已贏了服務對象的信心，間中再加隻英文，再拉高了在client眼中的權力形象，如果勤力又虛心的大學生更得人讚嘆……。你想想過很多時當client知道這個組織者和他一樣出身他會如何理解這組織者？如果仲發覺你雖然講得好但原來寫不好、你有感情但不太識帶組、又或你會主持原來做不到記錄……。這時client會因此而懷疑、質疑、猶豫……。又令我聯想在商業世界，一個女人要打天下，比一個男人要付出更多才能達到同樣成就，仲可能有好多人繼續懷疑她的能力。

最後一點，對大學生來說這是最大學習機會，當然最重要（做到就可上山下鄉通行無阻），就是要做到能向基層出身同事提出批評、建議，又能讓同事雖不接受但仍願意跟你討論或爭拗，兼且喜歡你。

# 香港合作社運動考察

夏菽

## 一·香港“合作社運動”史

據政府資料，香港“合作社運動” [1]，這個由政府一手促成的運動，已有47年歷史。[2] 1951年政府通過“合作社條例”（香港法律33章），強制合作社必須註冊，然後依據法律賦予之權力，廣泛成立漁、農合作社。1952年開始，到1965年合作社總數已達387個，社員二萬一仟人。[3]

合作社按性質分為四類，以1965年為例，農業合作社佔22%，漁業合作社佔16%，建屋合作社佔53%，其他則不到9%。[4] 不過建屋合作社又以漁民、農民為主；可以說，政府推行“合作社運動”，目的就在漁、農二民，尤其是後者身上。這點亦可在“合作社條例”中反映得到。按法例33章21節，“社員資格”必須符合“在合作社業務範圍內居住或使用該範圍之土地”的規定。[5]

為何政府五、六十年代推動“合作社運動”呢？這可從三方面來看：

- a. 1944年日本戰敗，英國恢復在香港的管治。此時大量人口隨著大陸政局變化移入，殖民地政府為應付糧食壓力，需要重建糧食生產部門，先後

[1] 自六十年代中，漁農處年報都有報導本港合作社的概況，而且標題突出一稱為“合作社運動” (Cooperative movement)，本文沿用這個名稱。  
[2] 第一個註冊合作社成立於1952年，屬農業合作社。該年共有五個同類的合作社成立。見漁農處年報1965年資料。  
[3] 同上。  
[4] 同上。  
[5] 合作社條例，第33章21節。

「工廠·廚房·垃圾房」——香港女工十五年



於1945、1946年採用統營來穩定漁類及蔬菜供應。接著再進一步介入漁農業生產，提高產量及打擊“中間剝削者”，並於1952年成立第一個漁民合作社，掀起香港的“合作社運動”。

- b. 1949年大陸政權易手，中、英港處於緊張關係。由於香港糧食依賴大陸入口，於是提高糧食生產(尤其是蔬菜；稻米可從泰國入口)便成為殖民地政府生存的戰略手段，合作社便擔當了這種時代角色。
- c. 香港大部份耕地都屬“原居民”所有。從大陸來的移民只能向前者租取較貧脊耕地，又因移民缺乏社區宗族支援，生活困難，易滋生對殖民政府不滿。所以政府透過組織合作社，不但可直接組織及支援這些貧農，提高農業生產，亦可分薄傳統以來敵視殖民地政府的鄉族勢力，及抑止左派力量向農村滲透。[6]

政府扶助合作社運動，首先由組織產銷合作社開始，漸次擴大至養豬、灌溉、建屋、漁塘、消費及信用等各類合作事業。至六十年代末，漁農合作社網絡完成。以1971年為例，原有34個蔬菜收集站中，31個已由蔬菜產銷合作社取代。

在漁農以外，較有規模的“合作社運動”是“儲蓄互助社運動”，[7]他出現的時間較政府推動的漁農合作社足足遲了12年，第一個儲蓄互助社在1964年成立。[8] 儲蓄互助社同樣奉行民主管理、公開社籍及公平待遇三大原則，但活動集中在鼓勵儲蓄及向有需要社員提供借貸。此外還旁及延續教育及服務社會等目標，亦受政府條例監管。[9]

與政府“合作社運動”只集中漁農方面不同，“儲蓄互助社運動”分佈在

[6] Stephen W.K. Chiu and Ho-fung Hung(1997) *The Colonial State and Rural Protes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30-35.

[7] “儲蓄互助社運動”或“儲蓄互助運動”，簡稱“儲運”。這種名稱的使用，常見諸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的刊物內，如1992年、1993年《國際儲蓄互助社日特刊》等。

[8] 第一個註冊的儲蓄互助社成立於1964年，見〈儲蓄互助社簡史〉，《國際儲蓄互助社日特刊》(1992)，P. 12。

[9] 〈儲蓄互助社經營原則〉，資料同上，P. 1。

公務員、教會及私人機構裏。以1987年為例，66個儲蓄互助社，教會佔1/3、公務員佔1/5、大機構僱員佔1/5、社會務機構佔一成。但人數卻以公務員佔大多數，佔全部社員(28, 551人)的46%。[10]

本地設有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後者又隸屬國際合作社聯盟。架構雖完備，但作為一個運動影響力甚微。尤其踏入八十年代，無論是政府漁農“合作社運動”或民間性質較強的“儲蓄互助社運動”的發展都停滯不前。根據政府數字，1997年共有合作社131個，社員19, 328人；儲蓄互助社65個，社員56, 125人。[11]

“合作社運動”重要性之失去亦可在漁農處的行政架構中得到反映。由於當年推動“合作社運動”首要在“安定”漁農業，所以管理合作社事宜便交給漁農處負責。現時有關工作由漁農處內的“合作社及儲蓄互助社管理組”負責，它的銜頭是“組”，與其餘四個“科”同隸“行政分處”麾下，不免相形見拙。事實它也曾經次身“科”級位置，只是“合作社運動”萎縮，才下降為一個“組”。

如果由政府推動的“合作社運動”和自發性較強的(暫不論其公務員佔多數的事實)“儲蓄互助社運動”在八十年代都面臨困難的話，那是否表示合作社並不適合香港土壤或“黃金時代”已過？

要回答便需要回到事情的起點，或“合作社”是甚麼這個問題上。以上所引述的，無論是“合作社運動”或“儲蓄互助社運動”的資料，都是有“史”可稽的。原因是他們都是註冊的，受漁農處監管；都可在漁農處檔案或年報中追查。至於註冊合作社以外的“合作社”(不能用合作社之名，否則受罰)[12]歷史，卻煙沒無聞。

我們沒法得知在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之間，當香港“合作社運動”正處“黃金時期”時，他們的狀況；也不知道“合作社運動”在八十年代萎縮時，他

[10] 漁農處年報1987年資料。

[11] 漁農處年報1997年資料。

[12] 合作社條例，第33章56節。



們是否同樣萎縮，或是否根本並不存在。

## 二·民間合作社活動

似乎除了最近幾年外，沒有人研究過香港民間合作社活動。不過零星的資料，仍可讓我們瞭解其中面貌。

基層權益互助社在九十年代初成立“合作社運動資料室”，採集了一些口述歷史。根據描述，民間一直存在這類強調互助、合作的社會經濟組織，譬如一些工會在罷工時會成立生產合作社，助罷工工人解決收入問題。此類合作社屬臨時性質，罷工結束後解散；亦有個別沒有解散的合作社，發展成獨立單位，或轉變成私人企業，或成為工會附屬資產。而一些社會運動取向的團體，亦出現由社員自發組織生產活動，一來幫補生計（因全心投身運動，沒有正職）；二來可為團體增加收入。其中一個合作社的分配形式採用三三制，即三分一收入歸生產者，三分一用來資助團體，三分一分紅，另外一成用作合作社儲備。生產活動包括印刷、塑像、書店、貼街招、修裝及散工等。而另一個團體則成立了托補中心，用意是接觸工人子女，團聚工人。

除了工會及團體外，也常見工友因失業或擔心失業而合資辦小生意的事例。一班女工合資開設快餐店，她們從一些團體聽到合作社這個概念，於是有“意識地”按所想的合作社方式運作，經營數年。其後因退股及無法集資修葺店鋪而結業。[13]

以上的例子都是從“合作社運動資料室”的訪問紀錄中整理出來，屬當事人的回憶及感想，沒有原始資料可供參考。而以下兩個例子，則由於有文字資料保留下來，或曾經被人研究記載，因而能提供一個較全面的脈絡。

### a·N合作社 [14]

[13] 以上個案均來自基層權益互助社“合作社運動資料室”資料。

[14] 一篇文章曾以“N合作社”作為這個合作社的代號，本文沿用此名稱。見張德標（1998）〈合作社為何寡頭私營化？香港合作社個案的研究〉，《基進論壇》（第一期）1998年1月，P. 39-50。

N合作社成立於1979年，是一個印刷合作社，成員有卅人。他的資本，由每人出資一百元組成，成員包括社工、學生、工友等。他的成立可追溯到另一個勞工團體的誕生。

1978年，一個由不同社區中心勞工小組組成的團體成立，主力是青年中心社工。理想是爭取勞工權益。其中一些社工認為，工友應建立參與管理、自主生產的信心，因而發起組織合作社。由於當時參予許多社會行動，要時常印制大量傳單，因而選擇成立印刷合作社，以減輕團體的經費，及作為對其他勞工團體的支持。

頭幾年，合作社首要關心其實是勞工權益工作，合作社無法自負盈虧。之後，由於勞工團體散渙，連帶合作社也失去大量社員。於是合作社便出現了經濟先行還是勞工活動先行的爭論。從此合作社的商業取向日益濃厚。接著，由於要開拓業務，進行注資，資金及決定權遂集中在幾個人身上。

經過注資後，合作社全面奔向商業考慮，並提高質素，“生意”急速發展。到了1985年，由於對參選區議會意見分歧，再有一批人退出，合作社便成為了一人獨資生意。

到了八十年代末，勞工團體結束，N合作社便完全成為一盤私人生意，與“合作社”再沒任何關係。[15]

### b·Y中心的合作社試驗

Y是一間已經結束的勞工中心，但在七十年代中，Y是頗著名的，並由工友自行管理。W是中心職員，曾在外國修讀合作社運動，回港後，在Y中心推動了一連串的合作社實驗。

#### i. 儲蓄互助社

是Y中心最成功的合作社計劃，成員多時過百人，都是Y中心的會員，累積金額達幾十萬元，一共維持了十五年。結束原因是因社區老化，社員流失，最後Y中心結束，儲蓄互助社亦停辦。

[15] “合作社運動資料室”資料。或參看《基層權益互助社通訊》第一期（94年3月）。更詳細的描述，參看〈合作社為何寡頭私營化？香港合作社個案的研究〉，見註14。





## ii. 茶座合作社

Y中心每晚均有活動，許多社員來到。W發起組織茶座合作社，提供茶水、小食，由社員經營。資金籌集自社員，自助消費。利潤分兩面分配，一部份按消費額分紅；一部分撥入發展基金，支持中心運作。一年後結束，原因是沒人願承擔管理工作及需求不大，因社員大都在家吃過飯才到中心。

## iii. 手工藝合作社

Y中心常舉辦興趣班，社員興趣強烈，W於是鼓勵社員組合作社，自行生產手工藝，如玻璃裝飾及編織公仔等，主要在中心寄賣，也向其他社員推廣。利潤按生產量分配。一年後，因社員缺乏興趣結束。

## vi. 製衣合作社

Y中心的製衣工人常吐苦水，不滿老闆壓價。W乃鼓勵工人自組製衣合作社，初時有十多人願參加。W於是四出申請資助，一年後基金到手，但工人已意興闌珊，因而作罷。[16]

以上的例子雖無法填補，卻証明了香港的民間合作社並非一片空白。而所提及的例子，又可分作兩類。第一類是團體及個人間自發的互助活動，雖有時也稱為“合作社”，實取其“分工合作”的意思，沒有一定的形式及宗旨。第二類多由社工發起（如N合作社及Y中心），他們心目中的合作社有一定的形態，許多時是以歐美的合作社運動作為典範，與政府合作社條例規定的反為接近。不過這些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合作主張（如N合作社的工運參予，Y中心的工人自管理念）卻肯定不為政府欣賞；相反，卻是政府介入“合作社運動”（如防止左派滲透）的重要原因。

從政府的角度看，無論是第一類或第二類都不應稱為“合作社”，因為他們都沒有註冊（Y中心的儲蓄互助社例外）。因此，在合作社“法定”的場域內，民間合作運動確實是——一片空白。

[16] “合作社運動資料室”資料。亦可參看Y中心1977—1978年周年報告及《基層權益互助社通訊》第二期（94年3月）。

## 三· 九十年代的創建

八十年代末，（政府）“合作社運動”經已息微。漁農處“合作社及儲蓄互助社管理組”除了繼續慣常的工作外，就是忙替失去功能的合作社辦理結束手續。鮮有新合作社登記成立；而民間的N合作社，Y中心等亦已消失，一些曾熱情投入的攬手認為香港缺乏合適的土壤。[17]

然而沒有合適的土壤是否可讓雨水、施肥來填補不足？又或者種不出“純種”的合作社後，可否試試異種的繁殖？1993年民間合作社運動議題再起，一連串的實驗計劃正好提供參照點，讓我們無需作閉門式的臆測。

以下將1993年至1998年民間對合作社運動的探索劃分為：理論及方向探索、民間團體的合作社試驗，及社會服務機構的合作社試驗三個部份。各個部份層層相扣，只是重點各自不同。

## a· 理論及方向探索：從《民間抗爭》到《基進論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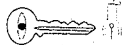
1991年《民間抗爭》報創立。這份報紙由不滿議會政治及黨派政治的社運活躍份子組成，目標是尋求基進的民主出路。[18] 由第一期至第三期，《民間抗爭》集中批評議會政治迷思；並與不同層面的社運份子開展對話，嘗試開拓另類社運空間。

然而從1993年的第四期開始，主題“轉向”合作社運動，先後刊登了“新的生活和政治實踐”（日本消費合作運動）、“另類貿易——內格羅斯的例子”（菲律賓民間組織與日本消費合作社的貿易）、“香港——大陸‘綠色扶貧’的新鮮嘗試”（大陸農村婦女合作社與香港消費者合作社的活動）、“工人能否改變‘市場’？”（美國移民僱工合作社經驗）、“集體買屋，自力造屋！”（台灣合作建屋運動）等文章。其中“從退休保障看民間出路座談會”以本地中央公積金論爭作為引子，試圖探索合作社運動在香港的可行問題。

《民間抗爭》認為，這種變化並非“轉向”。第四期社論有這樣的話：“政

[17] 有關訪問N合作社及Y中心成員的資料，來自“合作社運動資料室”，或參看《基層權益互助社通訊》第二期（94年3月）。

[18] 見《民間抗爭》創刊號發刊詞（91年9月）。



治不止於議會。全面民主不止於全面直選。不關心政黨不等於不關心政治。生活就是政治——我們支持議會和行政決策組織全面直選作為最低限度的民主，但不會因此被整合到各種形式的權威中去。”社論提出：“幾期的《民間抗爭》已嘗試提出新社會運動可能的多種價值取向。現在急須探討實踐的可能性。讓我們從合作性〔社〕運動開始吧。”[19]

但這個“開始”沒有持續太久，《民間抗爭》便於1995年停刊。

不過對合作社運動的探索並沒有停下來，《民間抗爭》一些成員與志同道合者，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內分別組織了兩個探索合作社運動的團體。一個是綠色扶貧社，另一個是基層權益互助社。綠色扶貧社從中國社會服務及發展研究中心(CSD)派生出來，後者以合作社方式協助大陸農村發展，成員同樣由香港人組成；綠色扶貧社負責將產品運銷香港。[20] 基層權益互助社是一個關注基層權益的團體，也像《民間抗爭》一樣，從社會運動入手，發展成對合作社運動的關注。[21]

有關基層權益互助社的合作社實踐留待下節討論，這裏只討論理論及方向的探索。在這方面，綠色扶貧社及基層權益互助社都很重視，前者在1996年出版《草原上》(共出兩期)，後者亦在同年出版《合作雙月刊》(只出一期)。綠色扶貧社成立了研究組，定期探討第三世界的合作社經驗；基層權益互助社則成立“合作社工作坊”探索香港合作社運歷史。

1998年綠色扶貧社及基層權益互助社停辦自己刊物，轉與其他團體合辦《基進論壇》，至今出版四期，每期都有專輯，由綠色扶貧社及基層權益互助社各自執筆，繼續探索合作社運。

除此之外，新婦女協進會刊物《女流》的“婦女與貧窮”專輯亦曾探索合

作社經驗；[22] 而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刊物《人間路》亦探討過合作社能否解決失業等問題。[23]

## b. 民間團體的合作社試驗

### i. 基層權益互助社／合作打字社

基層權益互助社於1993年成立合作社工作坊，目標是探索合作社運在香港的可行性。其理念源於兩方面，一是探索政黨及精英政治下民間社運的另翼出路；二是尋找經濟及就業結構轉變下工運的路向。基層權益互助社認為，就業結構轉變產生大量傳統工會無法吸納的邊緣工人(兼職、散工、臨時工)，這些工人分散在社區，因此提出“勞工社區化”方向。[24]

基層權益互助社的工作集中荃灣區，為失業、轉業工友提供培訓課程，然後鼓勵學員自組合作社。合作打字社便是在這種情況下於1997年成立，成員包括有失業，就業及義務協助的學生。合作打字社屬一個開放式合作社，不時開辦免費課程，並歡迎工友到合作社練習。合作社社員不斷流動，生意規模不大；但社員認為他的價值在開闢一個空間，實踐互助合作的生活。[25]

### ii. 勞資關係協進會／中文打字排版工作室

勞資關係協進會屬下有成人教育中心舉辦轉業培訓課程。1993年一批完成中文打字課程的藍領工人組織藍鑽社，交流就業、轉業經驗。1994年初，在勞資關係協進會協助下組成中文打字組，運作半年，因人手及技術問題停辦。

995年末，在勞資關係協進會支援下，再成立中文打字排版工作室，獨立

[19] 見《民間抗爭》第四期社論〈關心政治，藐視政爭〉(93年)。

[20] 參考CSD及綠色扶貧社宣傳單張及《草原上》第一，二期(96年5月及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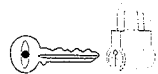
[21] 參考《基層權益互助社通訊》第一至四期(93—95)，《合作雙月刊》創刊號(96年12月)及《基進論壇》第二期〈蒙德拉貢專輯〉(98年7月)。

[22] 《女流》二十二期，1997年8月，p. 6—10。

[23] 《人間路》第二期，1998年8月，p. 22—28。

[24] 《合作雙月刊》創刊號，1996年12月，p. 2—17。

[25] 《基進論壇》第二期，p. 87—89。



於藍鑽社外，業務走向正規化。1997年中，獲樂施會資助發展。打字社成員主要是曾從事製造業的女工，她們參予合作社除了是希望改善就業及實踐工人參與管理外，還爭取社會關注轉業人士困境及改善不公平政策等。[26]

### iii.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女工速印互助社

與上一個例子相似，都是由女工組成，也獲樂施會資助。香港婦女勞工協會於1996年7月舉辦合作工作坊，聚集了一班有志以合作社形式解決就業問題的婦女。她們用一年時間探索組織合作社的可能，曾選擇過不同行業及服務種類，1997年7月，在香港婦女勞工協會協助下開展速印服

務。女工速印互助社成員年齡較長，有些是家庭主婦，有些有子女要照顧，因而只能非正規運作，社員的流動也較大。[27]

上述例子的共同之處是：民間組織先對合作社有興趣，然後再聯絡失業或轉業工友組織合作社。規模不大，帶有實驗性質，成員多數只得幾個人（最多12人），而且多數是兼職性質（中文打字排版工作室例外，擁有兩名全職職員）。

除上述例子外，還有天主教勞工牧民中心由失業中年女性組成的合作社，提供曲奇餅及中文打字服務。另外工聯會在1995年成立工人互助自救基金時，原先設計分兩種形式發放，一是以慰問金形式發放失業工人；二是貸款給有意組織“轉業互助社”的工人。[28] 可惜後者並未有人申請因而作罷。而香港樂施會則扮演提供資源角色（中文打字排版工作室及女工速印互助社均獲其資助）；該會在1995年進行的一項有關低收入住戶研究報告便提出合作社對基層有“充權”的作用。[29]

[26] 見“合作社論壇”（97年1月16日），中文打字排版工作室發言人講稿。

[27] 同上，女工速印互助社發言人講稿，及《人間路》第二期，1998年8月，P.26-27。

[28] 見《工聯月刊》第十七期，1995年9月。

[29] 黃洪、呂大樂（1995）《去權與充權—關於香港低收入住戶探索研究》，香港：樂施會。

### c. 社會服務機構的合作社試驗

社會服務機構與民間團體的分別是前者大都受政府資助，有“專業”社工為“受眾”提供服務，規模大，分科精細。但也有一些社會服務機構規模較細，“民眾性”強（“專業”社工與“受眾”間的界線較為含糊）；而民間團體中亦有強調專業主義，受政府資助的。後者通常後又會慢慢演變成社會服務機構。

#### i. 明愛中心單親扶貧計劃

明愛中心於1996年推行“自助互助創明天”計劃，目標是為領取綜援的單親婦女提供培訓，讓她們建立自信、學習謀生技能、及改善經濟。計劃由五個服務單位聯合主辦，計劃原訂舉辦家居清潔、剪髮、電腦中文打字三項訓練。其後電腦中文打字因財政問題擱置，而家居清潔只舉辦了一次，因導師難找、婦女心目中認為清潔無需技能訓練、及清潔難以小組形式開展生意等理由沒有再舉辦。只有剪髮一項發展下去。

一年內共成立了五個單親婦女剪髮組，為區內老人院、弱智機構提供服務。[30]

#### ii. 小童群益會乙明中心陪診服務

乙明中心的服務對象包括單親綜援家庭。1998年四月中心為單親綜援人士提供家務助理訓練後，鼓勵學員組成合作小組，為區內老人院及居民提供“陪診服務”，陪伴老人到醫院看病及覆診，目的是建立生計，藉此脫離綜援。

與單親婦女剪髮組一樣，成員都是有小孩的單親婦女，彈性的工作時間最能符合她們的生活節奏。“老人陪診”的試驗期是三個月，中心已取得社會福利署協議，社員首三個月的工資將不會在綜援中扣除。[31]

[30] 《女流》二十二期，1997年8月，P.6-7。

[31] 見“合作社計劃交流會”（98年7月8日）會議紀錄。

「工廠·廚房·垃圾房」——香港女工十五年



其實社會服務機構一直有鼓勵受眾以互助方式謀生。如提供傷殘及復康服務的機構便不乏鼓勵受眾合作經營士多、手工藝工作坊、打字社、小食店的例子，通常做法是以合約形式向政府投標，[32]但只局限在個別服務中。近年隨著失業率上升，領取綜援人數增加，這種做法漸有擴散至其他社會服務的趨勢（單親綜援婦女便是例子）。

就以上述“單親婦女剪髮組”及“陪診服務”為例，經過地區服務單位的實驗後，機構中央正有將服務（指組織合作社）擴大至每一區及由中央統籌的傾向。而代表香港社會服務機構僱主方面的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亦正與社會福利署接洽。看來將合作社正式納入香港“正規”社會服務範圍的日子已為期不遠。

#### 四· 歷史反思

自1951年“合作社條例”通過後，“合作社（或合作社運動）”便成為一個有法制支撐以漁農為中心而旁及公務員（住屋合作社及儲蓄互助社）的特殊領域。政府在五十年代催生“香港合作運動”自有其政治及經濟目的，隨著這些目的重要性的減退，“合作運動”亦走向即將到達的終結。

而民間的合作社卻方興未艾，或者正確一點說是隨著環境轉變而生生滅滅。他們有些不會用“合作社”之名以免抵觸法律（像“合作打字社”那樣）；有些則不願花費時間界定自己與合作社的關係；或索性自稱“互助社”（像女工速印互助社那樣）。

如果說五十年代政府推行其“合作社運動”是有其政治動機的話，那九十年代民間團體對合作社運動的探索亦同樣充滿政治意涵。像《民間抗爭》報、基層權益互助社、《基進論壇》都是在不滿九十年代香港議會及政黨政治、力圖開拓民間自主社運的前題下，突顯合作社運動的重要性。

[32] 葉蔭聰、蘇耀昌等(1993)“香港工業政策對葵青區工人就業之影響研報告書（葵青區議會社會服務委員會，P.18-19）。

又或者像香港婦女勞工協會，勞資關係協進會等，無不將合作社放在工運的脈絡下思考。即使N合作社及Y中心這兩個八十年代的著名例子，也同樣充滿著“勞工運動”，“工人自管”等措辭。相對之下，九十年代社會服務機構的合作社活動卻顯得“非意識形態化”。

如果“成功”的話，令合作社重上九十年代末政府議程的將不是充滿不同意識形態取向的民間組織，而是將合作社運動“實務化”的社會服務機構，他們正跟政府磋商。而最有希望成為正規社會服務的合作社項目，又首推傷殘、弱智、單親、綜援等服務。

如何評價九十年代香港合作社運動發展當然離不開評價者的意識形態取向，這裏無法詳細地談及。也許當合作社全面納入社會服務範圍後，其結果跟漁農生產徹底納入政府管理的情況相似：一些人生活得到改善（過去是貧農、遇上天災的漁民、新移民；如今是傷殘、弱智、單親、綜援……）；一些不同意見給“消音”了（過去是左派、地方勢力；如今是不同意識形態、向政府施壓的民間組織）；然後當政府的壓力消解之後，當合作社再不值得撥款支持的時候，他的命運就跟九十年代的漁農合作社一樣，一個跟一個地走向“死亡”。（就如九十年代的社區資助服務一樣）

不過，合作社或互助活動還不會就此絕跡，因為還有那些樂此不疲的民間團體不斷地做實驗，及那些自發不知合作社為何物的民眾在不停地搞其“無法無天”的互助活動。

## 人物專訪

女工做回自己的發言人——月蓮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的創辦人)	-----	183
從工廠到社區——杜潔麗	-----	189
香港婦女運動勝於互相信任的友好關係——林慧霞	-----	192
走出學院，回到基層：從學生到學者——潘毅	-----	198
不示弱女人——林英卿(烏蠅)	-----	203
女工是個很流動的身份——林麗玲(joy)	-----	208
女主義可說是看社會的踏腳石——鍾婉儀(阿靚)	-----	213
期望二十五週年慶祝——速印合作社及膠樽回收合作社社員阿華	---	218
以前打工要聽話、而家人人有發言權——女工同心合作社社員	-----	221
“有人問勞工權益，我也有責任解答”——清潔工人職工會理事	-----	224

## 女工做回自己的發言人 ——嚴月蓮(香港婦女勞工協會創辦人)

訪問員：蔡泳詩

“初初在基督教工業委員會返工既時候，睇過一篇文章，講點樣作為一個時代既代言人，我俾同事睇，同事就罵我，駛也你做佢地既代言人呀，點解佢地唔係佢地自己講呀！”

沒有明星，沒有“偉人”，女工的運動從來就是憑著堅韌的毅力，胼手胝足地熬出來的，人稱“阿嚴”的嚴月蓮就是當中一位做回自己發言人的女工。阿嚴十二歲開始在電子廠工作至廿多歲，因緣際會參與了一次工潮，後來便開始在勞工團體工作，而在八九年更創辦了香港第一個也是唯一專門關注婦女勞工權益的團體——香港婦女勞工協會。我們看阿嚴在婦女勞工運動當中堪稱祖師婆婆，是個響噹噹的人物。她看自己則是一個接棒人，並深信將來也會有其他接棒人繼續爭取婦女勞工的權益。

追溯阿嚴與一班女工成立香港婦女勞工協會(下簡稱：女工協會)的因由，其實離不開她的生活經驗以及社會環境。阿嚴是一位女工，她深切體會到女工面對的特殊困難，她說：“二十年前，女人生仔沒有假期、請假要扣糧，什麼福利都沒有。我們同輩的工友多數在工廠打工，工友生完仔之後三日就要返回工作崗位，否則就會被人取替的了。後來(八十年代初)，中國大陸開始改革開放，香港的工廠開始北移上去深圳，大量工廠工人失業，首當其衝的便是女工了，因為女工的人工最平而所做的崗位亦是最低技術的。”分娩假期和基本勞工保障都不是二十多年前的女工能夠享有的。“所以當時有班女工爭取分娩假期。”阿嚴十分稱許這班自發爭取分娩假的女工，“她們是一群將為人母的工人，一邊往醫院檢查，一邊做問卷，鏗而不捨地爭取了十年才有成果，現在我們連月事假也爭不到，真是慚愧！”阿嚴曾是工廠女工，後來加入了工業福音團契、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下簡稱：CIC)、輾轉又在許多不同的團體

女工做回自己的發言人——嚴月蓮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創辦人)

工作，她說自己做遍了香港所有‘檔口’——非政府組織了。她自工業福音團契那裡開始便著手處理婦女勞工的問題，許多組織工人的方法也是由那裡學習得來的。既然勞工團體也有關注女工問題，又有何需要另立一個女工協會呢？阿嚴很簡單地說是因為女工的問題是獨特的，分娩假、月經假、其他社會服務不能切合女工的需要，便覺得需要有女工自己的團體，與此同時她又提到了女性主義。

八十年代初期香港的社會運動也興起了女性主義，有許多倡議女性主義的本地婦女團體成立如新婦女協進會(婦進)、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女協)，和香港婦女中心協會相繼成立，阿嚴也曾在婦進和女協做過一段短時間的兼職，亦從婦進的學習班接觸到女性主義。她憶述：“我當時不幸地在街上遇到陳順馨(婦進創會會員)，她邀請我參與學習班，我不好意思推卻朋友，便應酬地上了半堂，後來翻閱課本又覺得內容淺白易懂，於是我主動地出席之後的課堂，學習一下女人野(女性主義)”不過，阿嚴又覺得女性主義有所不足：“當時提倡婦女議題、女性意識的人都是知識分子或中產階層，她們所說的理論好像跟我或者我身邊的人的生活很大的距離。舉例，她們主張女性要自主、經濟獨立等，所以女性就應該找一份可賺錢的工作，但是這種論據放在女工身上，其實是“搵緊女工笨架嗰”。叫我們這些女工打工掙錢，在家中又要做家務，而且連夜晚上床都要做！即一世人便要做三份工。如果這樣便等於女性解放的話，我寧願別解放了。”她補充道，後來已有人鼓吹家務勞動也是一種有生產力的工作，應該享有退休保障，諸如此類，但是早年(90年代以前)則沒有這種講法。阿嚴再進一步分析女性主義忽略階級問題：“我們必須承認，女性當中有階級差異。有錢的女人，不愛做家務，愛做文職，可以請個工人或菲傭去代替自己做家務，但是我們女工就沒有資格請工人。再者，我們打工，不是為了自己要‘所謂獨立’，我們所賺到的人工是幫補家用的。不同於知識分子女性憑工作來體現自己的價值。”

批評過女性主義，她也指出了勞工團體的性別盲點，同一個階級就不等於沒有性別問題，在勞工團體或者工會內，永遠都係男人才話得事，把女人的事放在一邊。以爭取月經假一事為例，亞嚴說清楚記得當時有些男工說：「乜咁核突架，食飯時候，成日都係度講月經假，令人地嘔啊。」由此可見，人永遠都有階級的矛盾，性別之間的分野。似乎勞工團體和婦女團體都各有局限，女工協會便填補了兩者的漏洞，又或者女工要建立一個屬於她們和最適合她們的發聲平台。用阿嚴的講法，女工協會就是為了去回應女工的獨特需要。

1989年香港婦女勞工協會正式成立了。經過了這麼多年，人們都想弄清楚女工協會是一個婦女團體還是勞工團體。阿嚴甫聽到這個問題，便很坦白和豪邁地說：“我是一個很懶的人，嗯……昨晚我剛與同事說起紫藤成立的時候，是否想得很清楚，有明確的理念呢？沒有這回事。大概知道我想做什麼，就一邊做

一邊想。我沒有想得好清楚自己去做女工協會時，考慮階級問題多一點抑或女性意識多一點。不過我的工作經驗全都與勞工有關，所以我就會好習慣地做勞工的事務，例如向工人講解勞工法例、為失業工人登記等。既然女工協會的性質在香港是獨一無二的，何必硬要把她歸類呢，孰勞工團體？孰婦女團體？不如說她是屬於女工們吧。”

問到女工協會的創立經過遇到什麼困難，阿嚴竟然聳頭一句說：“無！香港社團註冊好簡單，找齊三個人去警署註冊便成。”也對，在法律上辦一個手續，開一個名號真的這麼簡單，不過要做到名符其實，就一點都不簡單，接下來就充滿了無數的汗水和淚水了。女工協會於1989年成立，可謂生不逢時，因為所有人包括阿嚴在內都去做民運，半年後才回歸本位。阿嚴記得女工最初租用(CAW) Community for Asia Women一張寫字台，就馬上做一些勞工法例的展版，有關分娩假期的同女人有關的就做得大張一點，每個星期到新蒲崗做街展，向女工解答勞工法例。除了分娩假，她們另一個戰役便是有關獨留子女在家中的法例，“記得立法局提一個法案，如果獨留子女在家，父母就要被懲罰”這對女工來說是大問題，當時的託兒服務不是很普遍，又沒有課餘托管，即使有營業時間卻是朝九晚五，早上八時半才開始接管小孩子，而下午五時半前就要家長接走，對朝八晚六的工廠女工沒有什麼幫助，身兼兩職的媽媽唯有把子女留在家中，是無可奈何的做法。我們要阻止這個對女工不利的條例通過，便去立法局，就話：“如果係既話咁就拉晒成家入監，你照顧我，就好過我返工，扔低細蚊仔，你拉？我入去個細蚊仔唔知邊個湊。”最後都阻止了這個法例。回應女工的托兒問題，阿嚴和阿歡也曾在女工協會在暑假期間(因為孩子放暑假，媽媽仍然要上班)辦過大約40日左右的托兒服務，阿嚴戲說自己和拍檔尤如兩個傻婆，湊著幾十個小孩，做到頭髮也直了，一年之後，其他社區中心也紛紛仿效，女工協會就不再做托兒所了。

女工協會所做得工作與其他勞工團體皆十分相近，阿嚴說分別在於女工協會在女工問題上做得比較細心和落力，說著說著她也道出了一件難忘的經歷。當時工廠北移，大量工人失業，許多勞工團體都會為失業工做登記，女工協會也會做，而且她們事後會逐一聯絡工友跟進，多走一步。有一年，許多大的團體組成全港失業大聯盟，舉行聯席會議等，女工協會也希望加入這個聯盟，但是受到冷待，加入不成，阿嚴覺得沒有所謂，於是繼續做好女工協會的工作，在觀塘為失業工人登記，恰巧被傳媒報導了。不久之後，該聯席的人便致電阿嚴邀請她參與會議，阿嚴對那次的經驗非常深刻，她記得自己當刻拿著電話哭了出來，感慨世態的勢利。因此她明白到，別人看不起你不重要，最重要是做好

本份。女工協會從零到漸有規模全賴阿嚴和工友們的堅持和埋頭苦幹，一步一步地建立起來。

阿嚴艱苦經營了女工協會數年，她卻選擇離開香港讀書去。確切的年份，阿嚴也記得不清楚，大約是93或94年之間，有一間台灣的神學院贊助她讀一年神學，就這樣女工協會的創辦人便做了一年的神學生。修讀了神學之後，阿嚴首先在女協（婦女基督徒協會）工作，也曾在青島當過義工，不過阿嚴卻覺得女協是一個非常中產的婦女團體，所關注的宗教議題與女工的生活脫離，她很灑脫地說：“冇乜工做，不如自己搵份工做下”。阿嚴又轉到了很多不同的機構，有機會認識到一些姐姐仔（性工作者），了解到姐姐仔在香港工作遇到許多不公平對待，也缺乏法例保障，激發阿嚴於1997年創辦紫藤，關注這一群最受忽視的邊緣婦女勞工——性工作者。

萬事起頭難，成立紫藤就如成立女工協會時一像，總是不太被人理解，阿嚴說：“外人不理解姐姐仔，只覺得她們貪威識食，貪慕虛榮以及不乾淨，不值得幫忙！正如女工問題，人們覺得一就是勞工問題，一就是婦女問題，另起爐灶辦個女工協會好像有點多餘或不倫不類。”姐姐仔比任何一個行業的婦女勞工都要痛苦，因為她們的勞動價值不單止沒有受到社會認同，甚至要背負沉重的道德污名，她們差不多等同罪犯。阿嚴做紫藤本著最重要的一個理念，就是承認性工作是一份工作，為姐姐仔爭取她們應有的權利，而不是盲目的勸導姐姐仔從良。雖千萬人吾往矣！有許多人不會做的，不敢做的，阿嚴就會做，只要她認為值得做。阿嚴覺得在工業福音團契時所聽過的一句話很有警醒作用：“我們現在做的事，便好像在石頭上播種，很傻對不對？但是你會不會夠堅持下去呢？”即使阿嚴沒說，我們也可以想像得到紫藤的工作是多麼的艱鉅，而她都一直堅持下去。

從1997年到2004年，在報章上或人們的談話中，大家對性工作者的稱呼逐漸由叫雞、妓女，變為姐姐仔或性工作者，可見到紫藤的所下的功夫。另一方面，姐姐仔本身也勇敢地站出來，去請願，去開記者會，開拓自己的文化空間。讓社會認同性工作者，以及讓性工作者認同自己的職業，是阿嚴和紫藤眾姊妹一起努力的成果。從女工協會到紫藤，阿嚴最厲害的地方就是團體了一眾姊妹委身投入權益爭取的運動中，這是如何做到的？當然要請教阿嚴的組織經驗了。

阿嚴回憶說，大約60至70年代的香港，關注工人問題的（不計工會）有兩大宗派：以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為首的一派和工業福音團契。那時候，阿嚴從早到晚



都進出工業福音團契，在那裡只是聽道而已，沒有觸及其他議題，但是團體給她的訓練很好，訓練她們用午飯時間相約工友在後樓梯間唱聖詩和祈禱。“這個除掉宗教元素其實就是一個組織方法。無論做什麼都好，我們都要同被組織的人建立感情關係，即是找到共同要解決的問題，才有辦法有得開始同佢地去傾，所以我話最先在工廠入面組織女工就是躲在樓梯口唱歌和祈禱。”後來，阿嚴在女工協會初期與阿歡什麼都嘗試做一做，就為了尋找女工所需，例如做托兒服務，又組織到一些媽媽了，從托兒入手再探討女工真正的需要。將心比己，動之以情，阿嚴“哄騙”不少工友與她並肩作戰，例如她時常掛在口邊的阿歡，也是工友出身，後來參與了女工協會的工作，並且全心投入了婦女勞工的運動中。

觀乎阿嚴提及過的合作夥伴都會是她的組織對象，是否她覺得本身是女工的人做組織者會比較好呢？阿嚴話：不一定，“身份唔可以決定一切！”經過多年的觀察，阿嚴認為組織者不一定要是當事人，有相同身份的人不代表此人對她所屬的群體或階級有感情，要有同行感情的，背後要負出相當大的代價，自己和屋企人也賠上很大的代價，她又再提起老拍檔阿歡了。縱使阿嚴沒有具體說明這個代價是什麼，但可以肯定地說“時間”會是其中一項，而阿嚴26歲入

行(做爭取權益工作)，今年52歲，她已經貢獻了超過四分之一世紀的歲月在勞動運動上了。人生又有多少個25年呢？

資歷豐富的阿嚴卻不願評論整體香港婦女勞工運動的發展，她謙說自己離開了女工協會多年，不了解實況，沒理由泛泛而談。那麼她怎樣看經歷了一段女工運動的自己呢？——是一位接棒人。阿嚴深刻記得初任職基督工業委員會，看了一篇教人做時代代言人的文章，便跟同事分享，卻被同事責罵，指出應該由當時人做回自己的發言人不用他人代表，而且他說：“我們今天所享受的勞工福利，是前人奮力爭取回來的，如果我們不去接棒的話，就會連累下一代，什麼都享受不到了。”所以阿嚴有責任去接棒，不辜負前輩所做的事跟著我們要繼續做下去。一個人接了棒行了一步，還需要有人再棒再走下去，再接棒再走下去……可能就是這一種使命感讓阿嚴堅持在石頭上種植吧。

阿嚴之後的接棒人呢？“有啊！女工協會有美蓮，紫藤有Elaine（林依玲）”，而阿嚴現在則長期往內返地工作，把紫藤的工作放手交給接棒人了。

訪問員：蔡泳詩

新婦女協進會成員，吳曉真的同學，單身女青，聲音和身高卻如孩童。偏見和歧視潛伏在所有個體和團體之中，但是我們只常看到別人身上的塵埃卻忽略自己眼中的棟樑，所以要改變社會首先要改變自己！（無宗教信仰）

## 從工廠到社區——杜潔麗

訪問員：梁靜珊、許少英

### 徘徊於理想與現實之間

杜潔麗，又稱亞杜，在1989年成為女工協會的執委，是義務性質；直至1994年她便正式當上職員。她回憶說當時經歷了一個掙扎期，她原有一份豐厚的收入及穩定的年資，但為了做自己喜歡的工作，便毅然放棄高薪厚職到女工協會工作。她說，於1995年時，她到北京參加世界婦女大會也沒有足夠水腳，最後要變賣嫁妝，才能得償所願到北京開會。

亞杜憶述，初初加入女工協會執委的時候，會從理念的角度思考婦女運動。但成為職員後，多了機會接觸工友，例如一份計劃書的推行，先會諮詢工友意見，而不是盲目的去實踐組織者的理念。

### 中年女性被歧視

亞杜說，女工協會初期關注的議題是年齡歧視。在80年代，基層婦女團體只是寥寥可數，當時香港面對經濟轉型，很多工廠北移，令到大量婦女失業或只能當兼職。很多婦女於找工作時往往因為她們的年齡而不獲聘用。

面對如此的社會氣候，女工協會常到勞工處招聘會外擺放攤擋，協助工友透過勞工處找工作。除了關注女工失業的課題，還藉此組織婦女反對年齡歧視。女工協會曾組織巴士巡遊、放氣球等請願行動及發動女工到立法會旁聽，以爭取設立反對年齡歧視法，但可惜的是，當時的立法局內老闆代表太多，未能通



過反年齡歧視議案。

婦女們及組織者對是次的事件均有深刻體會。女工坐在立法局內旁聽議員的發言，得知立法局的議事模式，及立法局議員的「真正面目」。組織者體會到在社會轉型下，女工的技能及知識不被確認，沒有生活保障，更沒有尊嚴。這些體會進一步激發了大家推動婦女勞工運動的決心。

## 從工廠走到社區去

到了九十年代初，女工協會的工作開始有了新的變化。一來，工廠的北移導致婦女失去工作，被迫成為低收入的家庭主婦，困守在社區，這令女工協會發現社區化發展的重要性。二來，女工協會原本活躍於康寧道舊會址附近的工廠區，但工廠區內的職員多是文員，她們普遍不承認自己是工廠工友。三來，由於女工協會於1996年在觀塘翠屏村覓得會址，工作亦漸趨社區化，以東九龍的公共屋村為活動空間。

## 不同位置的抗爭

亞杜現於職工盟工作，雖然沒有再當女工協會的職員，但卻站在不同的位置推動婦女運動。她近年聯同一班婦女運動的活躍分子，成立了「婦女動力基金」，主要是籌募經費去支援各小型婦女團體。但由於現時籌得的款項不多，故只能象徵式地支援。雖然如此，但亞杜相信婦女動力基金是一個嘗試。現今的民間團體資源匱乏，有些工作被視為「不重要」，因而不獲資助；就算得到資助，卻往往受著批款者的種種指標要求所制。亞杜期望婦女動力基金可扮演支援婦女運動的角色，向社會大眾宣揚婦女訊息及籌募基金，以資助有需要的婦女團體。



訪問員：許少英

又稱elaine，曾是大學生一名，經常在女工合作社賣魚蛋及派單張；在撰稿期間成為女工協會的職員，時常到屋村探訪清潔工友，又攬下女工協會的籌款活動。

## 香港婦女運動勝於互相信任的友好關係——林慧霞

訪問員：阿牛

返港9年，慧霞今年7月再度離港。  
在港9年，將熱情貫注於婦女運動。

慧霞十多歲移居英國，在1995年返港，投入香港婦女運動的工作。慧霞當時首先加入新婦女協進會（下稱婦進），再加入香港婦女勞工協會（下稱女工協會），同時身兼兩份工作。適逢1995年北京舉辦世界婦女大會，平等機會婦女聯席（下稱婦女聯席）於次年成立，慧霞便成為婦女聯席的中流砥柱，一直關心香港的婦女議題，爭取婦女權益。

慧霞離開英國返港的時候，其中一個目的是尋找自己中國人的身份，同時希望讓她在英國出生，當時8歲的女兒多認識中國。慧霞在倫敦華人社區中心工作12年，專注工人階級、種族和婦女問題等，但女性勞工的工作接觸不多。

慧霞在英國服務的華人社區中心是一間



左派機構，強調工人權益，關注種族、婦女問題，慧霞說：「這十二年的工作經驗是對我個人的政治洗禮，令我深信福利是一項權利。」

作為身在外地的中國人，她深深感受到種族問題的嚴重性。慧霞回憶在1980年的時候，當時香港還是英國殖民地，但英國將香港留學生當作海外學生，對香港留學生收取比英國學生高幾倍的學費。她認為這是英國政府對當時香港留學生的不平等待遇。

1981年，慧霞第一次到中國旅遊，見到美麗的中國，令她對自己作為中國人的身份更加強烈。

1989年64事件令慧霞印象非常深刻。在英國生活，她對自己中國人的身份感覺非常強烈，為自己身為中國人而自豪。她對中國存有很多幻想，仰慕中國文化，加上她沒有經歷過暴政，89年64事件對身在異地的她打擊很大。慧霞說：「我像是甦醒了，開始更積極加深自己對中國的認識，第一件事便是學會唱中國國歌。」

1995年慧霞舉家返港，開始她在香港的婦運工作。過去9年，慧霞一直是婦進的職員。而在女工協會的參與，則是她從事組織合作社計劃的可行性研究。當時女工協會獲資助了一個合作社可行性研究計劃，嘗試以合作社的形式凝聚婦女，團結力量。

這個合作社計劃決定開辦女工速印合作社。因為其他業務的合作社投資較大，而當時參加的婦女來自不同背景和工作經驗，在決定做某一特定行業或類型的合作社上困難重重。加上當時民間團體需要柯式印刷服務，便決議成立女工速印合作社。一年多後，慧霞也離開了女工協會，而合作社經歷了六年運作，至2004年因業務不繼而處於休眠狀態。這是女工協會的第一個合作社，雖然在“提供婦女就業機會”的目標失敗了，卻為女工協會其後再開拓的合作社提供了更多理念基礎。

對慧霞來說，在香港婦運的參與中，最滿意、最成功的是和各個姊妹的友好合作關係。她覺得在婦運的工作中，和同事建立的不單是職員之間的關係，是平等對待、互相尊重的關係，而非由上而下的從屬關係。

在女工協會速印合作社的參與中，慧霞和女工們和諧相處，互相支持。計

劃開始的時候，很多參與的婦女都希望從女工協會找到一份工，因此參與這個合作社計劃。但是女工協會希望在合作社建立平起平坐的關係，由婦女自己組織合作社，而不用依靠職員作決策，更加不是僱主和僱員的關係。

參與婦女聯席九年，慧霞覺得最成功的是大家的彼此信任、默契、友好的合作關係。慧霞說：「婦女聯席可以經常以高效率作出各項決定，主要是由於大家的互相信任和支持。雖然各個婦女團體的關注議題、資源分配等各有不同，但合作的過程中，我深深體會到大家結合的力量。這就是婦女運動的成功。」

成功不一定是見到成果，不一定是某些社會的顯著改變。尤其是相對於英國，香港的權利意識很薄弱，勞工很難得到有關的資料。「沒有資料，便不知道自己的權益，不知道自己可能被剝削，更加不知道如何為自己爭取權益。」

婦進是婦女聯席的秘書處，慧霞作為婦進的職員，在各個婦女團體之間處理大量組織和協調工作。經過9年的經營，婦女聯席建立起對政府機構「平等機會委員會」進行監察的公信力。每當平等機會委員會就婦女事務向公眾諮詢時，一定會和婦女聯席商議，顯示婦女聯席在社會政策上有出聲的空間。慧霞說：「平等機會委員會也怕我們三分，可以說，婦女聯席是『有牙力』的。」

對於婦女聯席在香港婦女運動中扮演的角色，慧霞說：「婦女聯席在香港成功地建立了社會地位，監察平等機會委員會的運作、政府的施政，和婦女事務委員會的工作。」以前香港沒有這個平台，只能有零星的聲音，沒有一個可以跟政府溝通的民間機構。婦女聯席成立之後，深化地探討各個議題，不僅是只有行動而沒有討論。她說：「這是好事，可以令大家在各個議題上有共識。」

慧霞說，在2003年平等機會委員會的王見秋事件上，婦女聯席的作用很大。在很短時間之內，婦女聯席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施壓。各個婦女團體只消多個電郵互通消息後，便能迅速作出決定，並且作出行動。在婦女聯席的關注和施壓之下，王見秋事件連續兩星期都出現在報章雜誌的頭條新聞，顯示婦女聯席的高度組織和協調能力。

她說：「王見秋下台，不單是婦女聯席的作用，同時也體現婦女團體之間互相信任，行動才能如此迅速。」之後，婦女聯席也乘勝追擊，在新主席上任後繼續跟進事件。

在2004年4月的天水圍家庭暴力事件，婦女聯席也舉行記者招待會，出席立法會會議，舉辦“無暴力藍天行動”、並且去信政府，積極突顯事件的政策問題，希望令社會關注家庭暴力。

慧霞認為婦女聯席在香港婦女運動中能夠起一定作用。她說：「婦女聯席在香港這種環境，政府沒有有效溝通途徑，就算可以提出意見，政府可以不作任何回應或行動。香港沒有直選，對於這個政府，無可奈何，很洩氣。」

在強積金問題上，婦女聯席曾經向政府提出家務勞動者沒有受到保障的問題。但積金局的回覆是，家務勞動者有人養，可以儲蓄私己，已經有保障。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梁劉柔芬亦說，女性可以多“打斧頭”。

面對這樣一個完全沒有女性意識的政府，慧霞說：「在英國，民間團體和政府有很好的溝通。相反，香港公務員令人泄氣。他們像在守龍門，事事由上以下，跟指示辦事，而且他們的咀臉也非常難看。處處都說是跟從上級的指引，是縮頭烏龜一般的處事態度。」

婦女聯席雖未能成功爭取全民退休保障，但慧霞認為，婦女聯席的成功在於爭取的過程，各個婦女團體之間的合作關係，而不是爭取得來的結果。她覺得英國尊重民間團體的多元性，英國團體比香港容易生存。在香港，民間團體的資源非常少，通常都讓政府給掐死了，或是艱難地維持著。

慧霞說：「在香港這個環境，大家沒有放棄，提高了社會上對有關議題的意識，雖然未必看到的社會改變，已經可以說是成功了。」

在過去9年的工作中，慧霞覺得不時也遇到困難，各個同事也經常互吐苦水。

婦女聯席在初成立的時候，工作進度很慢。她自己又剛從英國返港，對於很多處事的方式也不習慣。慧霞說：「英國的民間團體很少接受傳媒訪問，很少上街或發表聲明。剛開始的時候，我在很多方面也要學習，而且那時我的中文又不好。」

慧霞認為，婦女聯席開始時工作不集中，開會天南地北地說一大番話，會議完畢後怎麼決定也沒有，也沒有人負責執行工作。她說：「這是可能因為香港民間團體的資源實在太少，造成他們怕承擔。開會的時候每每提到分工，所有人

便靜下來。但我覺得要做的事情就得去做，不用怕，只要認定是需要做的，就想辦法去完成。」

對於香港婦女運動的進程，慧霞最關注的是女工失業和就業的議題。她認為女性必須經濟獨立自主：「經濟自主的話，處理家庭暴力時也較容易。」

慧霞認為新移民婦女方面，政府應有政策配合，幫助新移民婦女融入社會，同時需要教育香港人接受新移民。

她說：「新移民婦女並不是跟香港的婦女『爭飯吃』，工作市場差是因為香港經濟轉型的問題。新移民婦女的內地學歷不被承認，加上語言不同、環境適應問題，而政府又不考慮中年基層婦女的需要，沒有提供合適的兒童託管服務，令她們只可以自生自滅。」

慧霞認為經濟政策應該發展一些行業給婦女發展。香港需要有自己的生產的工業，而不能只靠旅遊等服務行業。她說：「經濟轉型這說法已經十多年，資金一直在外流。更有人說這是因為工人權益太高，其實這是因為香港租金貴，政府卻沒有相對的政策，處理香港本身的經濟問題。」

經濟政策必須考慮婦女議題，在外國，政府提供access course，幫助婦女從新投入社會。慧霞認為在現在的經濟發展之下，婦女的就業環境只會越來越差。以資訊科技為例，婦女在這方面一定追不上。她說：「我女兒今年17歲，電腦在她的成長中，已經成為必需品。相較之下，我工作上也常用到電腦，但總不及她。」

慧霞覺得，香港過去二十年來的婦運發展，一點一滴的在積聚。在過程中，覺得發展很慢。但回顧過去，處處發現有改善的地方。整體來說，婦運正在向前走。

慧霞決定返英，主要為了她的女兒。

9年前他們舉家回港，當時女兒只有8歲，慧霞和丈夫希望她們的女兒學習中國的事物。

但女兒今年已17歲，很掛念英國的朋友，就像慧霞當年決定回港，希望尋找

在港的記憶一樣。慧霞覺得需要尊重她，讓她回英國尋回自己的記憶。

慧霞在港工作9年了，也希望休息一下，思想一下下一步如何走。慧霞的先生則會留在香港。

慧霞說，身邊的朋友有時會說，這樣像是女人的犧牲，為了家庭，放下事業。慧霞說：「我卻不認為這是犧牲。這是我與先生共同作出的決定，我們不希望像當年回港時，將英國的一切連根拔起。」

「返回英國是我的選擇，我自己願意的。而且留在香港，人在局中，很多事情可能看不清楚。」

兩年後女兒便升讀大學，到時候慧霞和先生便可能有多些自由。她希望繼續在英國參與民間團體的工作，還未定會做什麼，但不希望再做華人社區，希望可以發展不同的空間，多作嘗試。

訪問員：阿牛

離開學校多年來求職信、大學申請信等寫多了，不知不覺間學會了如何在字裡行間present 別人幻想中的自己，以片面的我impress 別人，更學會了隱藏dark side 的自己。老實的牛變得虛偽了，卻能贏得工作、學位……想來多數人看到的不是我，而是履歷表上的某某學校、某某海外英文測驗某某大學入學試。又或者他們根本不想看到真實的我。

以前相信世上有真實的什麼，讀完新聞傳播學位發覺更多時候是寫了什麼真實就是什麼。越寫越多了，更覺自己以文字在戲弄讀者令他們以為自己知道了什麼什麼。其實我所知道的也只是別人告訴我的什麼和什麼，我所未知的實在有許許多多。也許別人也在玩這個偏頗報導的presentation 遊戲。

參加女工會15週年出版工作小組是少有的機會，令我覺得自己在聽在看在再經歷被訪者真實的過去和感情。多謝慧霞和阿華抽出寶貴的時間，真心誠意地向大家和盤托出自己多年來在香港婦女運動上的辛酸和得著。許多人不想別人看到真實的自己，另有些人自己已經看不到自己了。謝謝妳們的坦白和真誠。

香港婦女運動勝於互相信任的  
——林慧霞

## 走出學院，回到基層：從學生到學者

### —潘毅

訪問員：葉長秀、梁淑美  
整理：葉長秀

#### 偶遇婦女勞工

當潘毅還是一個中大學生的時候，她經歷了八九六四的洗禮。她曾經走到北京的最前線，親身經歷了中國大學生的愛國運動，體驗民主愛國是怎樣從概念到實踐。雖然現實是殘酷的，而且曾令她很失落，但藉著同學之間的反省及討論，熱血及有理想的她卻找到另一個方向！就是「走出學院，回到基層」，她不單關注中國的民主議題，還關心香港本土的社會問題。

「接觸香港婦女勞工是很偶然的，同學們選擇到團體中參與協助，我是在所有的同學選擇後，才選擇這比較冷門的社會服務機構。」潘毅說。其實，香港婦女勞工協會成立於八九年，記得當時性別議題還是處於未成熟的年代，加上女工的切身議題，時常被勞工的議題邊緣化，所以要找這些團體做義工真不容易！但潘毅仍在1990年，以大學生的身份，開始了在香港婦女勞工協會的義務工作。當她憶述這段歷史時，她笑得花枝亂墜，彷彿也回味這看似傻氣的自己！

她清晰記得當時女工協會的職員是嚴月蓮，她深刻地記得阿嚴不斷向她灌輸婦女勞工的雙重負擔問題（double burdens），以當時的背景說來，這些都算是新議題，然而時至今天，這問題仍然存在，可以反映女性在勞動市場，要兼顧家庭的同時，又要兼顧工作的問題仍未得到充份的關注，而女性這些問題都有別於男性的勞工。「只要多留意日常的生活，都清楚知道，無論婦女是從事全職、兼職、有薪酬、或無薪酬的工作，婦女勞工都面對男性勞工所不用承擔的壓力——就是生育及做家務的責任。女工協會當時正努力倡議女工在這方面的獨特需要及困難。」潘毅補充說。這時，她才開始了解婦女勞工，作為女性的主體，再加上勞工的階級所面對的處境。

#### 進入她們的生活空間

當潘毅回顧以往在婦女勞工協會的日子時，她那銀鈴般的笑聲又再度出現，邊說邊笑道：「雖然選擇婦女勞工是偶然的，但對我以後關注國內的婦女勞工的情況，起了很大的幫助。我承認學院講的，是很抽象的，直到當我們有機會進入她們的世界後，始能具體知道她們的掙扎。我還記得，當時阿嚴叫我做一個關於製衣業女工的報告，那麼我就訪問了30多個女工，她們從十幾歲開始工作，一做就做了20或30幾年，她們一方面很開心地工作，因為可以為家庭作貢獻，減輕家人負擔；另一方面，她們卻面對很大的困難，就是有關工業轉型的問題，因為當時其實已有很多廠房搬入大陸，她們正受著失業或開工不足的煎熬。她們除了製衣的技術外，其他都不曉，知道自己現在已40多歲了，不能一下子變做白領或者學其他新技術，……當中很多的女工有沉重的家庭負擔，小孩要生活費，讀書又要錢，家庭的收入卻很不穩定，她們很徬徨無助……雖然女性勞工的「雙重負擔」是很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但生計卻是她們現在最切身的需要。因此我感受到，一個大社會結構的轉變，是如何影響小個體的處境。」當潘毅進入她們的生活後，藉著家訪，參加小組，聆聽她們的聲音，才真正體驗到她們的處境。這些經驗更加深她關注婦女勞工的決心。她大笑謂：「女工協會的成立，實在是『遲來的春天』！」（這首歌大概是她當年喜歡的金曲！）



## 理想與現實的不同

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香港婦女參加勞動市場的人數愈來愈多，然而並沒有代表婦女勞工的處境愈來愈有所改善。為此，潘毅認為這表示已經有幾十萬的婦女勞工被犧牲了：「她們為了這個『女工』角色，將自己所有的青春貢獻出來，…儘管在九十年代時，很多廠已經執笠或者吊鹽水，很多女工也面臨前所未有的黑暗時期，不合理的工資並不是她們最關注的，沒有工開才令她們真正感到切膚之痛！諷刺的是，女工面對這個『被壓迫的女工』角色，卻到現在還想要保住它！她們不惜坐在家中等電話，等待指導工叫她開工！」這一切的經驗，跟她在學院裡所學的有差異：不論馬克思或是女性主義的理論也好，婦女勞工都是『被壓迫』及『被剝削』的階級，她們不單不去集體反抗，卻還要留戀這角色，究竟可以怎樣去理解這現象？她認為這種矛盾，是要通過參與在她們的生活當中，才能得知這是理想與現實的差異，沒有誰對誰錯！婦女勞工是活在現實當中，學者也好，義工也好，我們也不能脫離女工的現實去了解事情。無論站在那一點，以後組織婦女勞工的工作，都需要通過彼此的理解及溝通，才可以找一個大家都同意的工作起點，從而真正有望按婦女勞工的真正需要，改善她們的生活處境。潘毅十分欣賞婦女勞工協會當時的存在意義：正當香港的製造業開始沒落，女工協會作為一個關注婦女勞工的志願團體，發揮著回應作為基層女性勞工階級在時代轉變中的角色及獨特的需要。此後，隨著愈來愈多香港工廠搬到中國，她轉而關注中國婦女勞工的現況，她開始從事有關中國婦女勞工的學習及研究，直至成立“女性聯網”——香港第一間志願團體關注國內婦女勞工的需要。

## 學生與職員的不同關注

回想以往在婦女勞工的日子，潘毅不畏言說，作為大學生的身份，她做義工的期望，確實與當時職員所期望的有不同。她說：「當時我還是個大學生，雖然我也有組織學生的經驗，但這應該與組織婦女的經驗很不同，所以我滿懷希望，期望可以學習更多組織婦女的技巧。」但事實是，她發現當時的職員並不是那麼想，她們認為她是一個大學生，應該多做研究，寫報告，甚至對外開會的角色。一切似乎只因彼此的學歷及階級不同，所以應該各盡其「才」，而不是各取所「需」！或許當時的她未必認同職員的想法，但她都會盡量去完成有關工作，雖然她當時很想做香港製衣及電子工業女工轉型所面對的問題。她總結說：「我覺得現在或許都是這樣，組織者對大學生參與基層的工作期望還是千年不變的！他們似乎認為大學生永遠都適合做寫或者研究的角色，反而較少讓她/他嘗試落實做組織的工作……，其實，大學生也可能想做其他的工作呢！」

無論如何，她盡力做好職員對她的期望，兩年後，她甚至繼續擔任婦女勞工協會委員會的執委，她的參與直至她到外國讀書就停止了，但她在精神上及物質上對婦女勞工協會仍堅持到現在，雖然她知道自己的付出仍然很少。

## 對組織者的困難及掙扎

她認為當時組織婦女勞工的困難是：「因為基層的聲音太弱了，婦女勞工的聲音就更難帶出，例如當時一講起勞工的問題，十居其八、九都是那些男性骨幹去回應，因為他們大多擁有固定的職業，所以參與工會的動力比較大，聲音也比較多，隨之而來，他們獲得組織培訓的機會「自然」比女人多。環顧九十年代婦女勞工的處境，她們很多時只是一個不固定的勞工（casual labor），即多以兼職工為主，工作時間及起點不穩定，角色又時常轉換，沒有固定身份去參加工會，所以與男性的勞工有不同的處境。但這些現象都不是自然而然的，是人為因素造成。」另一個組織的困難，就是當時婦女勞工協會的辦公室只是租用在佐敦道的一個工會的寫字木台，但關注點卻是以全港為主，而不是一個地區。她認為這種跨行業及跨地區的組織工作，會削弱組織的力量；加上婦女勞工的流動工作特色及雙重負擔（double burdens），在為口奔馳之餘，又要兼顧家庭的責任，要將她們組織起來，談何容易！面對婦女的需要，若機構不去為她們預備托兒服務，調校平時開會的時間及支付參加活動的交通費等支援配套，或許婦女勞工的聲音會沒落了！

累積了多年的組織婦女勞工經驗，她現在的體驗是：「無論是在香港或在國內，那管自己的身份是一個學生、老師或者什麼，我們始終都要接受我們不是工人的事實，這些經驗將永遠有別於一個女工在每天工作10多個小時的經驗。其實，我們每一個人是會受主流的社會影響，無論是朋友、或者傳媒，香港的婦女勞工也不例外，其實她們受女工朋輩的影響也很大的，很喜歡旅行呀、娛樂呀等集體活動，這與大學生追求的平等呀、自由呀及博愛等抽象概念不同。」她認為組織者要接受這種一開始已存在的差異，求同存異！

經歷了那麼多年的掙扎，增加了她對於權力的醒覺及敏感度。她現在的體會是，她覺得：「過去的組織者用了頗多的精力，去隱藏自己是組織者的身份，怕自己被認為是一位知識份子，而主導了所有的事情。他們太害怕權力了，顯得畏首畏尾，而且過去已經差不多浪費了十年的時間，現在應該是時候停止了。」其實她認為組織者是可以主動一點。她言道：「香港是一個極端相信市場的地方，政府及市場均是香港婦女勞工面對的敵人，如果我們在下面無法製造出另類的抗衡文化，那麼，就極有可能迫使婦女勞工用以暴亦暴的文化方式來反抗，無補於事。」她還補充，相對於政府及市場，基層的聲音已經太弱了，作為知識份子，不能再自我消耗，她希望組織者不要再自廢武功，浪費所有精力，

組織者必須時常調整自己參與的角色，與時並進，了解自己所有的限制，認識彼此的不同，合作前行，將婦女勞工的議題及行動帶出！她認為婦女勞工的方向是社區經濟結合民主運動，真正落實分享權力及共同承擔的責任，發揮共同力量！她自己，就憑著昔日在婦女勞工協會的經驗，選擇了國內的工廠女工作為她的研究及服務對象，深入了解她們的掙扎及困難，還在香港成立了「女性聯網」，現在易名叫「女工關懷」，全力關注很多離鄉別井到深圳打工的女工，進入她們的日常生活點——宿舍去開展工作，那管是關於婦女健康、女工權益、及性教育、或兩性關係等。還記得訪問當天，她很歡迎及鼓勵我們發起運動，推動其他人也主動關懷女工的需要，捐書也好，做什麼都好，目的是組織更多女工，關懷自己的需要，共同改善工作的空間，爭取更多的社會福祉！

### 結語

時常流連大學的我，認識不少的學者，但筆者很欣賞潘毅這類實踐型的學者。行動及身教的影响力往往勝過滔滔的雄辯，她的熱情及幹勁，凡事親力親為，而且堅持走出學院，回到基層，卻並不是現在每位香港的大學教授可以做到，但她做得到！

訪問員：葉長秀

以「終身學習」為目標，對婦女、家暴、婚姻及同志議題感興趣。小女子對全職婦女、勞動的女性、雙職女性、婦女運動工作者敬仰，同時對找到人生目標及意義的婦女特別欣賞。志願做自由、無國界的工作者。

## 不示弱女人——林英卿（烏蠅）

訪問員：Sam·Bill  
整理：Sam

### 烏蠅看香港女性

林英卿又名烏蠅，把現今香港女性的狀況以中產及基層作了個分野。她認為在現今的香港，中產女性的情況不論在學歷及經濟收入上皆比過往有改善。她們享有較多自主的原素，比如說，她們經濟獨立，可以考慮是否生育，亦已意識到很多自己應有的權利。烏蠅認為中產女性的情況有這樣的轉變，一部份原因是她們有較大的機會接受專上教育，在那兒認識到女性意識，身邊亦有較多的資源和機會。另一邊廂，基層的女性能接觸婦女角度、女性主義的思潮又或其他思想的機會則相對地少。主流傳播媒介在這方面又不多提及，加上基層在經濟上不時承受著壓力，以至基層的女性可以談獨立、談自主的空間很少。

### 烏蠅看香港女性運動的當下

烏蠅用'conflict'（衝突）一字來形容女性運動在香港的現況。她認為現在很多女性已掌握到一定的性別意識，中產的一群更可能在社會有一定地位。然而，在女性運動推動了女性對性別有所反省的同時，男性卻好像站著不動。她舉例說：現今職業女性已很普遍，但有些男士還未能放下男性應為家庭經濟支柱的思想，在不知如何自處的情況下，一些'conflict'（衝突）就此造成。當然，烏蠅並不是說女性所受的壓迫全來自男性。男女各有各的問題及壓力，只是現今的制度及權力架構下，男性往往掌握著絕大部份的資源和權力。當那一群男性用現有的、仿似既定的父權意識處理問題時，性別不平等只有延續。可惜的是，社會上不見得有一些針對兩性在待遇上的差異，或是社會加諸兩性

不示弱女人——林英卿（烏蠅）

的壓力、枷鎖、不平等的教育工作，因此性別意識難以浮現，甚至被接受。

## 烏蠅看自己進行婦運的歷程

談到如何晉身婦女運動之中時，烏蠅憶述大概94、95年左右，她跟幾位在學聯認識的女孩子均對性別問題很感興趣，於是產生了一個想法，希望聯合其他院校的女孩子，組織一個探討性別問題的小組。當時中大已有個一個類似形式的小組叫“女研社”，港大亦有一個討論性別問題的小組，也就是後來的“XX小組”。於是，以中大和港大的女孩做主力，聯同理大、浸大和城大一些對性別議題有興趣的女孩，便形成了一個分享、討論及反思性別話題的小組。當時她們定期會進行聚會，所談的話題多圍繞性騷擾、女性自主作為女性的生活經驗、對性別的理解等。閒時更會翻閱書本，找尋相關理論。除了私下討論外，她們還籌辦過一些校園論壇，以及出版了一期名為‘女萌’的通訊。這是烏蠅開始關心女性受剝削及女權意識等問題的一個開始。她又指出，自己是諗社工的，初時多關心弱勢社群，比如天台屋事件。後來到了婦女機構實習，接觸到多了一些有關性別的議題，又把那些議題結連自身的經驗，帶到那個討論性別話題的小組中。透過對眾人對自身經驗的反思及分享，她發現很多問題都與女性的身份有關，漸漸參與多了，在這範疇的關注已差不多十年。

## 烏蠅在女工協會

女工協會是烏蠅畢業後第一份工作。選擇從事基層的工作，一方面是自己對弱勢社群的興趣，另一方面認為基層是最有需要的一群。烏蠅初加入女工協會時，可說是首批沒有基層經驗而成為組織者的大學畢業生。她提到當時常有對自身身份危機的思考。那時候，她工作上的夥伴是基層工友的组织者。在烏蠅眼中，她們對社會的意識、甚至對現況的改變相對自己來說是悲觀的。自己當時的想法則被認為是過於理想甚至不切實際的，把實際環境對婦女的限制看得過輕。然而，烏蠅則認為自己雖欠缺工友的生活體驗，卻可帶入新的元素。烏蠅評價自己當時還真幼稚，不太掌握應如何把自己的一些理想，一些意識形態的東西轉化成實際可行的計劃，才給人不可行的感覺。其實當時是未能掌握到

介入點，心裏只著急組織女工，為她們自己爭取權益，想令她們理解不平等是社會既問題，並非她們個人的問題，卻不知從何入手。她坦言，一套以她們的生活經驗出發的語言，不竟是需要時間，在那種工作環境中浸淫和建立的。

在烏蠅初加入女工協會的時候，另一個她遇上的是相處上的問題。她形容自己在大學教育中過份崇拜冷靜、理性的溝通。在女工協會內的溝通方式，卻往往是說話很大聲、反應很直接、很情緒用詞的那種。基於當時信心不足，常感到自己的意見不被重視，又因表達方式的不同，常有被罵的感覺，曾有一段時間很失落。那時候烏蠅曾有離開念頭，幸當時的執行委員成了中間人，不時開解她，又跟她分析，其實大家都在給與回應，只是意見和溝通方式的不同，不是刻意令她難為，令烏蠅感到問題是可以得到調和的。日子久了，兩位基層拍檔亦對她的溝通方式作出某方面的遷就，而自己也都察覺到說服不了人的問題，後來努力把自己的想法變得實際一些。其他人看到她的努力，漸漸放手給她作新嘗試。就這樣，在關係建立及互相配合的情況下，過渡了數年的磨合期。



不示弱女人——林英卿（烏蠅）



在烏蠅口中的女工協會，一如它一向給人的印象，是一個以女性的「工作」，而非女性「生活」作為指向的組織。對於女性生活及性等話題則較少談及，通常是在某一活動內順帶出現時，才会有討論。她認為那可能是女工協會創立時留下的歷史因素有關。就著女工協會是談勞工問題還是性別問題的詢問，烏蠅認為女工協會談的是兩者重疊的地方，並以基層婦女的角度出發。比如說，她們會著眼於爭取退休保障及最低工資，因為那樣可以改善女工的生活。但這並非以女性主體作為視角，實有其盲點，未能把家庭主婦包括在內。女工協會常有如何組織家庭主婦的討論，結論是多招攬她們作義工，但技術上有還有一定困難。例如，膠樽回收計劃成功吸納一群家庭主婦。可是，礙於計劃中常有許多事工的話題要討論，性別分工又變成很少討論的話題。對於女工協會以女性「工作」為主的著眼點，烏蠅認為沒有必要改變，卻可以多加入其他原素，比如女性獨特的生活經驗，那樣性別意識的反省可以更落實一點。

## 烏蠅在「不示弱女人」

在女工協會工作的同一時期，烏蠅亦活躍於「不示弱女人」，更可說是「不示弱女人」的創辦人之一。她一直參與由一群大專女生組織的，討論性別議題的小組。在97年的時候，她們開始感到一個轉變的需要。她們意識到既然自己已離開院校，除大專之外，可嘗有在區內發展討論性別話題的空間。剛巧當時有一個婦女團體從美國請了一些人來港教授自衛術，這令她們聯想到討論強姦的問題時所感到的無奈。她指出，性騷擾及強姦在她們的討論中是比較深刻的話題。很多時候，她們均會在討論中反思個人面對性別問題時，自我可以調解的空間。可是面對這兩個話題時，則好像只有無助而沒有空間。直至認識了自衛術，她們發現原來面對性騷擾及強姦也可以有主動回擊，便打算把自衛術帶到社區。當時她們考慮作街頭示範，為了一些如場地借用的程序上問題，便註冊成立了「不示弱女人」。

「不示弱女人」的給予烏蠅許多成功的經驗，如剛開始時的自衛術街頭表演、組織一群年青女性談性的小組、批評瘦身的活動以至近期於公共交通工具上張貼有關舉報性騷擾的標貼等。她稱，在「不示弱女人」的工作以分享為主，始終它只是個關注性別議題的組織，是個沒有什麼目標、方向的聚會所，因此活

動都較輕鬆、貼身。如她那樣，現今運作「不示弱女人」的都是業餘的人，相對於從前在女工協會全職的前線工作，她認為在女工協會那兒有較多責任，感到自己是個組織者，有需要帶給參加者一些什麼。

## 烏蠅看將來

對於女工協會將來的路，烏蠅認為現今要突出女工問題很困難，在經濟大氣候不理想、女性工作多元化的時代，不單男女各有就業上的問題，女性作為工人的獨特需要就更難表達，可以說女工協會也未知到如何定位。烏蠅認為不論女性運動及勞工運動，均各有其局限所在，女工協會的出現便是要把性別議題帶到勞工運動中。就她個人來說，關注性別議題的工作已有十年，現正尋找新方向，希望作多方面的嘗試。雖然她表示計劃中的將來不會主力關注性別議題，但她又稱自己已內化了一套性別觀念，亦感到那些觀念對自己是重要的。

訪問員：Sam  
八掛每事問的討厭人物  
藉故讀社工認識自己  
額外收穫地聽到婦女工作  
婦女運動  
第一印象女人好煩  
女人工作好霸道  
不甘被自己的限制矇蔽  
時時刻刻提醒自己  
要在還有衝動問  
還有勇氣問的時候  
要發問  
要問多D

# 女工是個很流動的身份

## --林麗玲(joy)

訪問員：關紹君

林麗玲Joy，任女工協會執委。參與女工協會執委工作三年、已經第二屆擔任執委的她，會怎樣形容女工協會既關注婦女，又關注勞工的角色呢？

「我覺得單單討論勞工並不足夠，勞工中的gender (性別)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issue (議題)。在被壓迫的勞工當中，婦女可能最為邊緣。女性勞工面對很特殊的處境，而這處境之所以邊緣，正正來自她們的性別。如果單用就業去組織女性，那白領也是我們組織的對象，但女工協會會比較集中於組織基層女工。我們有女性的角度，有class (階級) 的角度，也有工作的面向。很多勞工團體、工會都沒有女性角度，沒有考慮到在勞工中最邊緣的女性所面對的特殊處境。女性勞工除了要考慮人工、工作環境，還要面對照顧家庭的責任，或者其他方面的concern (關注)。這些都是一般勞工團體，要是沒有女性角度的話，不會關注到的。」

### 甚麼是女工？

回顧這幾年來女工協會的發展，Joy自言當初加入時亦有點不習慣，因為女工協會有它自己的傳統，而她當時又不太熟悉女工協會，所以往往不能給予太多意見。「我本身不是女工，只是因為一些偶然的合作，之後有心想做一些事才開始加入。有些女工可能是一直參與女工協會的活動，覺得有點歸屬感，認為可多放點時間，才當上執委。」Joy表示自己作為一個社工，與「真真正正」的

女工間總存在著一些分別，舉例說，在一些執委會的討論上有些女工是較難參與的，在涉及發展方向這些問題上，她們可給予很好及很實際的意見，但有時有些較宏觀的東西如全球化，可能需要較多時間去向她們講解。這些議題在性質上可能會導致女工較難參與，加上開會時間少，導致越來越少女工來參與討論。「當執委會入面有女工的時候，自己便要更加aware (留意) 自己的意見會否dominate (主導) 了整個討論、會否出現了主導情況。我們實際上需要女工的參與，雖然現在的情況不太理想，在執委層面較少基層女工的參與。我們想過不少方法改善，除了開會時使用較淺白的語言外，我們也會盡量邀請她們給予意見，但始終有些話題對她們來說是頗悶的。」除議題外，Joy認為開會時間不足也是一大問題，對基層婦女勞工來說，要抽空開會並不容易，例如清潔工的工作時間很長；而且婦女下班後也要照顧家庭。

越來越少女工參與，會否是因為現時女工這個身份已不能把人凝聚呢？Joy認為今天的女工是個很流動的身份，以前有紡織業女工、製衣業女工，但到了今天根本沒有人會稱自己為紡織業女工、製衣業女工、或甚麼甚麼工。因為今天她可能是清潔女工，但明天便轉了當待應，或收銀，甚至是今天有工作，明天



女工是個很流動的身份  
——林麗玲(joy)

便失業也說不定。Joy便有一個很貼切的形容詞用來形容當今的工作，就是「彈散工」。「到底我們組織了的是女工、家庭主婦、還是失業婦女呢？女工身份正在不斷流動，已到了很難作組織的地步。以前要搞工潮，走到工廠便可組織到一班女工，但現在已較少有這種情況。女工今天可包含很多不同種類的人，例如失業婦女及家庭主婦。家庭主婦可以到街市兼職做清潔，那麼她便又是家庭主婦又是女工。」

## 怎樣組織女工呢？

至於組織方式方面，Joy覺得女工協會也只是整過社會運動洪流中的一個部份，而這洪流正在不斷改變，由以前搞工潮上街很work(有效)，到現在五十萬人上街才有丁點關注。社會行動已不再純粹可單靠工潮發揮效力。例如爭取綜援或其他政策上的轉變，面對立場強硬的政府，各團體已發覺上街的方式不太有效。Joy表示女工協會會強調怎樣改變政策，但在政策未能改變前，也需要討論怎樣「自救」。「自救」的意思是到底該做甚麼，用來繼續凝聚婦女，因為與政府爭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婦女覺得爭取不到甚麼便會離開。提到「自救」，Joy第一個談到的東西就是合作社，也就是她往後提到社區化、生活化的一個重點項目：「現時很多社會運動也提出社區經濟、合作社運動，女工協會亦開始去推行這些工作。合作社是一個讓婦女一同討論出路的地方，在這個組織的過程中，她們的生活實際上也起了變化，因為合作社本身是一種生活，在這種生活下她們去重新認識自己，這可說是比較個人政治的。我覺得現在有一個shift(轉變)，不是說由macro(宏觀)去到micro(微觀)，更絕對不是要搞個人化，強調甚麼最終都只能靠自己，絕對不是。但現時很多運動也不能單靠上街便可解決，反而要靠大家走在一起，想想怎樣自救、生存。同時亦在這個自救過程中爭取政策上的轉變。這可以說是由一些很大範疇的政策討論到現時的合作社實踐、膠樽回收計劃、環保或者是個人生活層面化、生活化、社區化，把事情以道地及貼身的方法處理。」

Joy表示今天社會運動要對抗的已不再只是政策、政府，而是一套潛藏於人們心裏的文化。例如甚麼是資本主義呢，其實就是由我們生活中實踐出來的一套文化。有些問題不止出現在政策上，有些更在文化上。例如今天人們可以上街抗議老細剝削，但明天又會罵新移民搶他們飯碗；在工潮中很有力地說出自己

的權益，但另一方面可能又會剝削另一些比自己更弱勢的人。合作社運動就是要挑戰這種思維模式。透過改變個人的看法，合作社運動就是一個小小的實踐，作為一個點火的作用，再去影響其他人。所以女工協會願意投資很多資源於合作社發展上。「我覺得合作社賦予到一個空間給婦女們，一面搞合作社一面搞社會運動。」不過Joy強調，她從來沒有放棄集體行動有它的力量，她仍然期望可以組織到很多很多人上街，但亦明白到，在實際運作中單靠這種方法未必可行。

## 社區化是甚麼？

就有關將來的方向方面，Joy表示就是要社區化和生活化，雖然現時仍有點迷迷糊糊，未有甚麼實質的東西能做出來。那甚麼是社區化呢？就是利用了「女工其實就是生活於社區中」這一點，有工作的也好、失業的也好、家庭主婦也好，其實全都生活在社區中。第一，她們的住所本就在社區之中；第二，基層婦女的工作地點一般也不會離住所，即不會離社區太遠，因為她們人工本就不高，不能花費太多於車費上；第三，家庭主婦本身也是女工，家務本身就是一種工作，加上她們有時也可能會於區內做著各種兼職。所以要組織女工的話根本就從社區入手，而且要實際，與生活息息相關，所以女工協會提倡環保，好像膠樽回收運動，就是希望區內女工可在女工協會中有所參與。

Joy認為相對於政策層面，社區化和生活化的發展空間應該會較大。但Joy指出無論哪一種方向也好，錢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當然其他問題也需要考慮，例如在膠樽回收運動中，始終也要向政府申請一個地方用來擺放碎膠樽的機器，這時地方是其中一種限制需要考慮。不過Joy覺得始終錢才是最重要的問題，但造成今時今日各個團體也缺錢的原因可能就是以往長久以來都太過依賴來自外國的資助，或政府的撥款，於是大家都比較少去構想怎樣才可做到本地團體支持本地團體、本地人支持本地團體，或者怎樣去建立一些可以自我維生的「產業」。說到解決方法，Joy提出重點是要建立一個捐款的網絡，「以前我們從來都不會想會員可以怎樣支持，但今天都會去想。當然現在也很難構想到會員可以怎樣支持，因為會員都是基層女工。以前從來都較少explore(考慮)本地支持網絡的可能性，但現在我們正嘗試去建立。其實要是商界想捐錢的話，只要它不是太差或太剝削，我們都會接受。」

## 總結過去

對於過去婦女勞工運動的發展，Joy的想法是：「其實我也不覺得過去有很大的進展，你要參與其中才會發現到微細的進展，例如清潔工方面，已迫使政府外判出來的職位要有最低工資，又成功組織了清潔工的工會，令到最邊緣的女清潔工的權益有機會被提出。這些都是很細微的進展。如果說整體的話，我真的覺得比較難看到有甚麼進展。但其實女工協會亦帶起了一些合作社的討論，當然不純粹是女工協會帶起，但女工協會是最早發起合作社的團體之一，亦身體力行走到現在。」對於將來，Joy表示現時的敵人不僅是政府不單是權益，而是一種文化，甚至女工本身。「鬧綜援養懶人的已不是政府，而是街坊……覺得三千蚊人工做一份全職工也可以接受的已不單是政府，而是街坊，當然它（政府）有份推波助瀾，但在實際運作上似乎大家也很接受這種被剝削的文化。」

由於要對付的敵人包括整個文化層面，Joy覺得要改變這樣的情況可能需要靠一些較為細微深入的組織工作去實踐。「不是單單與女工去討論這些問題，而是透過社區中共同的生活去改變大家內在的structure（習慣）。我們說要改變大社會環境，但其實大社會環境是由無數的人組成的。所以女工運動無可避免要有文化的轉向而且必須要與其他很多概念有所聯繫，譬如環保，很多東西也是一脈相承的，資本主義鼓勵的消費、生產，也是造成今天女工處境的原因之一。」至於這種運動取向的轉變是否會令運動更難取得成果呢？Joy說：「我覺得這的確會較難看到成果。未必可很快看到政策一百八十度轉變，但大家對成果的要求不應只著眼於政策怎樣改變，而是整個文化層面。這些成果都不是顯而易見的。是否比以前難做，我覺得可能是。不過這只是一個轉向，很難作比較。」

訪問員：關紹碧

二十五歲，先後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理學院及文學院，在大學資源緊縮的情況下，曾就讀的兩個學系均告執笠及重組合併，可說是黑仔一名。

## 女主義可說是看社會的踏腳石 ——鍾婉儀（阿靚）

訪問：李峻嶸

### 接觸婦女基層議題

大學生活讓鍾婉儀（阿靚）有了接觸婦女基層議題的機會。小時候在圍村學校讀書的她原本被灌輸傳統男尊女卑的性別意識。九十年代中，阿靚升讀大學，開始認識女性主義，更與其他大專同學出版刊物及討論婦女問題。畢業後，她更與一些好友一起創辦了一個關心女性議題的團體——「不示弱女人」。阿靚認為：「女性主義可說是看社會議題的切入點。不單是性別議題，其他議題如階級問題都可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去看。」當年阿靚曾聲援家園被拆卸不獲合理安置的天台屋居民，不但體會到基層文化的魅力，亦了解到基層所受的壓迫。畢業後，她便開始做組織基層婦女的工作。

### 主流組織的組織形態

在訪問中，阿靚經常表現出她對組織形態的重視。阿靚是香港婦女勞工協會（下稱女工協會）的執委會主席，現職於一個社區團體，但她也曾在工會工作三年之久。她認為主流工會的組織文化是男性主導的。所謂男性主導的文化，即是一個論資排輩、著重階級、「睇大佬」的文化。各人都追隨著一個領袖，由這位領袖帶領其他工友與僱主抗衡。

這種強調領袖帶領群眾的組織文化，阿靚認為是與婦女的經驗非常不同的。她指出男女在兒時玩玩具時已建立了不同的經驗。男孩子從中表現自我；女孩

子則藉玩玩具與其他人分享。因此，一個適合女性，而且較平權的組織形態應是要每個成員都有自己的角色，並且是互相支持的。

可是，主流工會的組織形態始終是男性主導的文化，故女性難以在工會中取得主導的地位。以她當年負責的工會為例，雖然會員中有七成人是女性，但主席依然是男性。甚至在工會的婦女部中，大家都以一個男性的方式去思考，依然是論資排輩、「睇大佬」。雖然阿靚曾積極推動提升婦女在工會內部的地位，如建議在執委會中訂下女性應有的名額，但效果並不顯著。因為，在男性主導的文化下，能跑出來的女性都會是較強悍的女性，像男性一樣當領袖，而領袖一般又缺乏自省能力。這與阿靚心目中不靠個人、包容多角度的理想形態始終不同。

但在女工協會中，組織形態則與主流的基層組織不大相同。例如在合作社中，各社員的關係是平等的，每人都享有一樣的發言權與決策權。這種把權責分散，並非由個別二、三人扛上所有責任的組織方式正是阿靚嚮往的組織形態。

## 對女工協會工作的感受

在女工協會數年間，阿靚最滿意的工作是合作社與清潔工的組織。在香港，女工協會可算是組織合作社的先行者之一。合作社強調眾社員能夠平等地分享意見，互相協調，不用領袖來帶領，這正切合阿靚心目中理想的組織形態。尤其女工協會與婦女在中文大學成立的合作社，合作意識相當不錯。但亦因為合作社較著重意識的深度，故只能小規模製作。此外，女工協會亦通過合作社，在中大校園內與同學連結起來。

清潔工方面，工友們的動力給予了阿靚不少滿足感。阿靚雖身為女工協會主席，但她直言不想太主導會務，因為這與其組織的理念相違背。阿靚希望不會讓會員感到她與其他人不同。她會盡力融入會員當中，擔當鼓勵、打氣的角色，絕不要求其他人去做些甚麼。阿靚希望這種做法能打破階級觀念及科層架構。因此，她樂於見到清潔工工友自己行動，積極主動找人入會和組織活動。

## 對女工協會的反思與期望

談到女工協會內部文化時，阿靚指出了一個特別的現象。她說：「或許是對自己的要求過高，女工協會整個氣氛總是比較負面，大家經常認為自己的工作很差。」但阿靚堅定地認為這種想法並非事實。「其實女工協會的工作已算不錯。起碼女工協會不會為求發展而放棄群眾，而是堅持自己的路線。我想，大家應該想得正面一點，多點鼓勵，並要學會欣賞自己。」

參與女工協會的事務多年，阿靚認為女工協會仍有一些可改進地方。她指出女工協會的組織力始終不算強。職員與會員之間的交流未算足夠，兩者應該不斷溝通，以確立發展方向及共同的價值觀。

阿靚以前曾在關注被虐婦女的團體工作。這個團體有定期的會員會，會員經常出席，建立起會員對組織的認同。阿靚認為女工協會可考慮這做法，讓一眾會員有決議的機會，並建立群眾的議事文化。這樣不但能提高會員的積極性，促使會員自發籌辦活動，而且會務的發展將更加由下而上，更加民主。阿靚並期望將來的執委會由出身女工的成員為主，那麼女工本身便可主導女工協會的運作。

談及女工協會目前的方向，阿靚認為未夠清晰。現時女工協會主要的對象是中年婦女及清潔工。這卻令女工協會面臨青黃不接的難題。她說：「中年女工退休後，女工協會便可能再接觸不到她們。但現時的組織形態只適合這些當年在工廠打工的女工。以往女工在工廠工作，組織工作較為容易。但面對現時二、三十歲當白領的女性，既有的組織形態是不合適的。」阿靚認為女工協會應嘗試組織年輕一輩、工作散雜化的女工。但除了未找到合適的組織形態外，社會的價值觀亦被阿靚視為難以組織新一代女工的原因。「整個社會形態都是貶抑組織，注重個人。與在工廠中感受到群體重要性的女工不同，現時年輕的女工在學校受教育時，都是學習不用與他人合作的。現時強調組織就會被指為基層，被指為草根，使人與社會分離。這都令組織工作更形困難。此外，她們有『工人』這身分嗎？這個詞言在現今的香港始終予人一個低俗的感覺，年輕女工實難以產生身分認同。」換言之，尋找新的組織形態與擴大「女工」身分所包含的範圍，正是女工協會要思考的方向。



阿靚認為，以上所提及的問題並不是女工協會所單獨面對的問題。環顧整個基層運動，現時確有組織僵化的現象。因此，阿靚在工會時便曾嘗試過用較新穎的方法來做組織工作，以回應社會的轉變。當年她在工會做組織工作時曾嘗試不再用「工作」為切入點，而改以「生活者」的身分。她希望藉著生活知識的交流令群眾聚集起來。作為組織者，阿靚不會扮演一個灌輸者的角色，因為當婦女自己討論時，其感染力絕對比組織者的說話高得多。可是，該次的經驗未算太成功。會員雖對不少生活上的問題感興趣，但當討論政策議題時，群眾始終較為被動，而且出席的人數較少。現在在社區團體中工作的阿靚則希望以消費者角度把婦女議題帶入社區，希望能有更加好的效果。

## 對香港婦女勞工運動的意見

有關婦女勞工運動方面，阿靚指現時的難處是難以突出婦女的身分。所謂婦女勞工，當然是有雙重身分。但阿靚認為現時香港的婦女勞工運動應放開階級，

先談女性。否則與其他工運無異。以女工協會協助的清潔工會為例，究竟它與其他工會的議題及手法有何不同呢？雖然婦女勞工運動的對象都是女性，但這並不代表是女性的角度。阿靚建議可設一些培訓班，訓練女性去接聽性騷擾的熱線電話，處理有關女性的問題，以突出女性這個身分，以證明「婦女」勞工組織的存在價值。

與其他婦女運動一樣，婦女勞工運動都不希望有領袖的出現。雖然有領袖會令行動較有效率，在爭取權益時或許有較有快捷有效，但阿靚卻認為這種形式始終與婦女組織所追求的組織形態不同。眾成員的意識與在運動中的角色均是不可忽視的。阿靚並不否認由個別領袖帶領的行動會較易見到成績，但她卻堅持「一個人走出來前進十步」並不如「十個人走出來共同前進一步」那麼珍貴。另外，她亦認為現今的群眾已不如以前那麼重視領袖，可說是一個「英雄已死」的年代。但如何在沒有領袖的平權架構下進行有效的抗爭，則是婦女勞工運動所面對的另一難題。

訪問員：李峻嶸

學生一名。自女工合作社在中大創立後便光顧至今，多是購買魚蛋。身體不適時亦會去買感冒茶，效果不俗。

女主義可說是看社會的踏腳石  
——鍾婉儀（阿靚）

## 期望二十五週年慶祝——速印合作社及膠樽回收合作社社員阿華

訪問員：阿牛

### 「我期望女工協會將會慶祝二十五週年」

在女工協會慶祝十五週年的大日子，阿華最大的希望是女工協會將會有二十五週年，三十五週年，讓她可以一直幹下去，並且幫助香港有需要的婦女。

由以前的速印合作社，到今天的膠樽回收合作社，阿華一直為女工協會默默耕耘。「我覺得膠樽回收合作社的工作很有意義，可以推動環保。其實膠樽回收合作社的工作十分辛苦，又髒，下雨濕日頭曬，但我認為減少廢物很重要，不希望堆填區越來越多。」

2001年，阿華由另一速印合作社成員介紹，參加了女工協會的速印合作社。阿華當時帶著強烈的求知慾，希望從參與女工協會之中學會新的知識。阿華1996年從大陸來港，在香港人生路不熟，加上多年沒有工作，對自己沒有多大信心，希望參與速印合作社，學會新的技能。

阿華說：「參加速印合作社最大的收穫是自信心大了，不再覺得自己及不上別人，學會了積極主動。以前沒有工作，在家對著四面牆，覺得自己很沒用。」

速印合作社的工作殊不容易。阿華和同事需要負責接單、報價、收稿、印刷、送貨、收費等等，一手包辦所有運作。「最初兩三個月，我們是挨過來的。」阿華說。

在女工協會職員循循善誘的幫助下，阿華除了學會了速印的技能，還和同事建立了珍貴的友誼。阿華說：「工作帶給我滿足感，又可以和同事融洽相處，我自己的心情也開朗了。我享受工作，喜歡靠自己生活。我要求自己將本份做到最好，不想浪費自己的人生。」

2002年尾，速印合作社間歇休業，阿華便參與膠樽回收合作社計劃，一直支持女工協會的工作，直到現在。阿華除了工作和照顧家庭，還一面持續進修，報讀保安、家助理、電腦等課程，增加自己的技能。

「膠樽回收合作社的工作時間長了，以前速印合作社一星期只工作兩個半天，膠樽合作社要四個半天。我又要兼顧家庭、進修和兼職家務助理的工作，工作不定時，十分辛苦。」



膠樽回收合作社去年得到政府基金的資助，但今年的資助還未獲批，阿華擔心膠樽回收合作社可能被迫結束。阿華說：「我希望可以支持環保，鼓勵回收，減少廢物，貢獻社會。同事們都努力工作，互相支持和接納，如果今年膠樽回收合作社因為不獲資助而結束，我們都覺得不捨得。」

阿華喜歡工作，最擔心的是不受錄用。她期望女工協會可以繼續下去，讓她可以為自己繼續建立自信，並且幫助香港其他有需要的婦女勞工。

訪問員：阿牛

離開學校多年來求職信、大學申請信等寫多了，不知不覺間學會了如何在字裡行間present 別人幻想中的自己，以片面的我impress 別人，更學會了隱藏dark side 的自己。老實的牛變得虛偽了，卻能贏得工作、學位……想來多數人看到的不是我，而是履歷表上的某某學校、某某海外英文測驗某某大學入學試。又或者他們根本不想看到真實的我。

以前相信世上有真實的什麼，讀完新聞傳播學位發覺更多時候是寫了什麼真實就是什麼。越寫越多了，更覺自己以文字在戲弄讀者令他們以為自己知道了什麼什麼。其實我所知道的也只是別人告訴我的什麼和什麼，我所未知的實在有許許多多。也許別人也在玩這個偏頗報導的presentation 遊戲。

參加女工會15週年出版工作小組是少有的機會，令我覺得自己在聽在看在再經歷被訪者真實的過去和感情。多謝慧霞和阿華抽出寶貴的時間，真心誠意地向大家和盤托出自己多年來在香港婦女運動上的辛酸和得著。許多人不想別人看到真實的自己，另有些人自己已經看不到自己了。謝謝妳們的坦白和真誠。

## 以前打工要聽話、而家人人有發言權 ——女工同心合作社社員

訪問員：Carmen

「以前打工要聽老闆話，佢話點就點，但而家合作社大家平等，每個人都有發言權，返工好開心。」中大女工合作社社員蓮姐對筆者說。「同工同酬、共同決策、沒有剝削」是女工合作社的營運理念，十二位社員共同協商，一同經營中文大學的小食店及影印服務中心。

女工合作社社員大多為失業中年婦女，她們年輕時是香港製造業的中堅份子，隨著經濟轉型，她們的選擇收窄，要不轉投服務業，要不乾脆回家做全職主婦。女工合作社的出現無疑為這些婦女開拓一個新方向。

蓮姐年青時做過製衣、電子廠，女兒出生後便當全職主婦照顧女兒。及至數年前女兒升讀中學，便打算重回職場。然而，時移世易，製造業早已式微，昔日的技術已無用武之地。如其他背景相似的婦女一樣，可供選擇的工種不多，蓮姐找到一份學校小食部的工作，但只做了三個月，不過雖然時間短暫，但當時的工作經驗於今日大派用場。三年多前，蓮姐經朋友介紹，參加由女工協會舉辦的合作社工作坊，認識到合作社的概念：「當時參加工作坊純粹好奇，不知道甚麼是合作社，亦不知道工作坊舉辦的目的是招募社員。但上了幾課後，很有興趣，便加入合作社。而介紹我參加的那位朋友最初亦是社員，但後來因健康理由退出了。」蓮姐說。

「入社」後，社員們開始投入於中大學生會的影印服務，及於半年後更投得小食部經營權。當時取得經營權，中大學生會出力不少：「小食部原本打算公開給各便利店投標的，但中大學生會提出反壟斷，認為學校資源應要回饋社會，所以爭取要先讓社會服務機構招標；因此女工協會這樣一個毫無生意頭腦的團



體也有機會參與，最後更成功取得經營權。」至今，中大學生會的幹事仍然非常支持女工合作社。而當年爭取反壟斷的同學則成立了“基層關注組”，最近更支援女工合作社的特更服務，於晚上11時至凌晨由同學在小店當值。

開設小食店對社員而言，不僅是個挑戰，亦是個極佳的學習過程。合作社強調共同協商、共同決策，故所有大小事務均由所有社員一同決定。蓮姐回憶時：「很好笑，除了我在小食部做過三個月外，其他社員均沒有類似經驗。但由裝修選哪種顏色，以至賣甚麼貨品等，都需要由我們自己決定，大家認識有限，所以最後裝修完後，很多人都說似住家多過做生意的店舖。」其實，小食部的這份家的感覺正是它的吸引力，所以生意不錯。小食店除了包裝零食、飲品外，亦有售賣熟食，如炒麵、中式包點，及學生至愛的魚蛋、魚肉燒賣、腸粉等。筆者最喜歡的是女工們的糖水，像媽媽煲的一樣，非常「足料」，而筆者亦有



不少「同道中人」，因此小食部的糖水每每很快便會賣光。

小食部的運作，全由社員們一手包辦，社員亦需輪流擔任訂貨、編更等工作。而女工協會除了組織工作，在實務方面則幫忙部份文書工作如會計、辦理強積金等，小食部的實際運作則不會干涉。

自主的工作模式，令女工們加倍投入，雖然人多意見亦多，爭拗實無可避免，但透過這些經驗，社員學懂互相接納，互相忍讓，蓮姐謂：「透過凡事商議，我們學會了毋須固執己見，多聆聽他人的見解。作決定時，我們通常少數服從多數，但亦有多數服從少數的時候，當有社員堅持己見，我們認為她提出的理據合理，便聽從她的建議，嘗試去做。」此外，由於大家都是母親，故當其中一位社員因要照顧家庭如子女生病時而需請假，其他社員亦樂意「替更」，社員彼此間十分諒解與支持：「換了是外面的機構，根本沒可能，但我們大家都明白大家的處境，所以無所謂。」蓮姐說。

另一合作社成員阿惠加入合作社僅三個月，她最喜歡的是社員間「有傾有講、有商有量」。她以前於電子廠工作，工廠北移後曾做過廚房、食肆樓面等工作。住在粉嶺一公共屋村的阿惠偶然見到女工協會於村內張貼舉辦工作坊的告示，以為是學習工作技巧的課程，於是便參加了。當參加了後才知是招募會員，而這個是對她來說極之新穎的工作機會，她非常感興趣，於是便加入成為社員。不單同工同酬、共同決策這個理念極之新鮮，而參與公共事務及討論時事對阿惠而言亦是新的經驗。合作社社員會討論時事及各種公共議題，甚至積極參加遊行、集會等去表達意見。這些活動令社員更關心社會事務，而參與社會活動亦令她們成為非一般的「師奶」，社員的家人對她們此舉十分支持。正如阿惠所說，以往她們不會關心時事，現在便不同了，可以與家人討論時事，而話題多了，彼此的距離也拉近了。

正是這份對社會的關心，引發她們於小賣店推出集體訂購有機蔬菜服務。數月前社員計劃於小食部售賣有機蔬菜，認為有機蔬菜不僅健康，而透過直接向農夫購入，可免除中間剝削，買賣雙方均可得益。她們四出尋找農夫，最近終於找到合作伙伴，蓮姐謂：「大學校園住戶不多，訂貨量有限，中大的位置又偏遠，很難找合作伙伴，幸好最終亦找到。」有機蔬菜於一月正式推出，每週農夫送貨一次，送貨費用由合作社支付，而每斤菜蔬的來貨價與售價只相差一元多，可算是「蝕本生意」，但合作者當作是一項服務，沒打算賺取利潤，目的是支持種植有機蔬菜的農夫及讓學校的老師、同學們有健康的蔬菜食用。

小賣店不經不覺已經經營了三年多，筆者亦是見證其成長的其中一人，很慶幸有機會透過這個訪問，更了解女工合作社。希望女工合作社能不斷擴展，讓更多中年或失業的婦女加入這個能使她們獨立的「行業」。

以前打工要聽話、而家人人人有發言權  
——女工同心合作社社員

## “有人問勞工權益，我也有責任解答”——清潔工職工會理事

訪問員：關紹君、李峻嶸  
整理：關紹君

依據清潔工職工會其中一位理事阿張的看法，女工協會其實一直也有關注清潔工的問題，但說到要成立清潔工職工會，則是近年來的事。為甚麼有了女工協會還要特意成立多一個職工會呢？阿張解釋道：「主要是這樣的，以往有工潮或訴訟，上庭時法官都不會接受女工協會替清潔工講話，因為女工協會並不能代表清潔工的工會。所以女工協會便萌生了為清潔工成立職工會的念頭。事實上，自清潔工人職工會成立以來，也試過數次代表工友上庭。」

不過阿張提到，現時職工會的運作很多時仍需依靠女工協會的職員，因為清潔工友的上班時間很長，基本上工作時間已佔去了他們生活的大部份時間，所以很難抽很多時間出來參與義務工作或幫忙其他人。工時長或許是清潔工參與勞工運動的其中一種限制。「如果真的要由我們來幫人，我們連自己的工作也兼顧不來。好像今天的訪問，若你約我早上或下午我根本沒可能出席，除非我請假，但實際上我們的薪酬已經很低，若請假的話便連幾十蚊也賺不到。」阿張說。

那既然作為清潔工參與勞工運動的限制這麼大，是甚麼令阿張開始參與並一直堅持至今呢？她表示當初參與女工協會活動時對勞工權益也毫無認識，加入主要是出於一次給僱主剝削的遭遇：「大約在五、六年前，當時我在這條村做花王的工作。當時僱主加了我們工作量，但不加人工，於是兩個年資較長的工友便向僱主要求加薪。僱主初時表示要考慮一星期，怎料結果是不加薪之餘還立即把這兩位工友解僱了。我們對此感到十分氣憤，所以幾位工友一起集體辭職。後來發覺僱主沒有補償他們未放的假期，便找女工協會職員幫忙，

最後也順利爭取到假期的補償。自此之後我便加入了女工協會。」

正如上文所述，其實遠在清潔工職工會成立前女工協會已關注到清潔工的問題，阿張表示當她還在這裏花王工作時，女工協會職員已經常主動聯絡他們，向他們提及勞工法例和關心他們有沒有給剝削假期或薪金之類。不過阿張說，當時她和其他工友都沒有理會女工協會職員，除了覺得她們很好人，又有心幫忙別人外，也沒有甚麼特別看法，因為他們那時很多事都不懂，除了工作外也不想理會太多其他事情。只是後來遇上給僱主剝削了假期的事，才會想到找女工協會幫手。

阿張說當時與她一起辭職的工友有一、兩個也有加入女工協會，其他的則沒有。阿張估計他們沒有參與的原因可能是找到第二份工作後較忙，抽不出時間，又或者不想給僱主知道自己參與勞工組織，甚至可能根本沒有想到這麼多事情（指勞工權益）。至於為何阿張會一直參與女工協會活動呢？她表示主要是女工協會的職員很友善，和她們有很多話題，而且可以幫到人，又能學到很多東西。

其後清潔工人職工會成立，阿張當上了理事的職位，也曾出任主席。阿張說成立職工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單單是叫人入會已很困難。她形容有工潮時工友自然會出現，但沒有工潮時他們又不覺得職工會與他們有任何關係。而職工會本身也不能提供甚麼會員福利給會員，因為資金實在很有限，所以吸引力不大。「我記得女工協會以往辦過的會員福利好像有身體檢查及旅行，但身體檢查男工不能受惠（因為是婦科檢查），而旅行根本很多人都去不到，因為我們做清潔工的很多時星期天都要上班。除非有些工友是女工協會曾經幫過他們，那他們可能會因為感激你而入會，但到了續會時可能又不會續，因為一百元的會費對我們的會員來說並不是小數目。」阿張繼續說：「我當初出任理事的工作主要就是因為沒有人願意出任，而且我住在女工協會附近，有甚麼事也可隨時過來討論，加上女工協會曾幫過我，所以在不影響工作的情況下，也願意出任理事的工作。」

阿張覺得現時職工會有兩大困難，其一是上面已經提出過的，清潔工工作時間長的問題；其二就是清潔工大多都不願出面參與職工會的活動，怕給僱主知道而失去工作。針對後者，阿張解釋道：「我們也經常對其他清潔工宣揚勞工權益的訊息。但可能大家都怕給掉了工作，所以無論我們怎樣落力，得到

“有人問勞工權益，我也有責任解答”  
——清潔工職工會理事

的回應也不算太好。尤其是現時找工作這麼困難，又有誰會冒著失去工作的風險來參與呢？好像現在我參與職工會也不會給上司知道，否則一定會說我『搞搞震』，甚至刻意留難我也說不定。老細經常說，『你不做還有很多人爭著做』，他們根本不愁請不到工人。而工友們最關注的是能否保著工作，老細有否剝削他們只屬次要問題。好像有次我問一位工友，若老細現在無故扣減他的薪金他會否辭職，他竟說視乎老細扣他多少。這些人，你和他多說也沒有用，他們只會顧及自己，要拉攏他們一起對抗僱主根本沒有可能。有甚麼事他們也只會依賴我，叫我出面向僱主爭取或來女工協會求助，而他們只會躲在背後，裝作若無其事。不過我身為職工會理事，若有人問我有關勞工權益的事，我也有責任為他們解答。」阿張認為，工人越不敢出聲其實只會越助長僱主的剝削行為。若工人不主動求助，又不願說出自己面對的困難，就算別人想幫他們也很困難。

面對上述兩種困難，阿張覺得清潔工人職工會暫時都只能在勞資糾紛上替工友上庭及解答勞工法例的問題。在其他方面上，她認為實質能提供的支援其實不算太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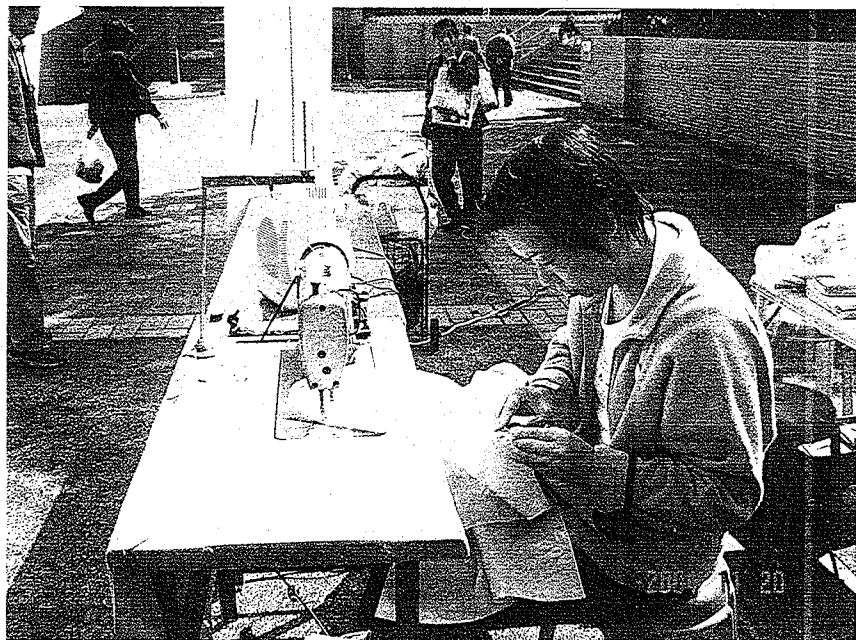
另外，阿張提出女工協會與現時的清潔工人職工會大家所關注的重點應該各有不同。舉例說，女工協會會較關注女性議題，而清潔工人職工會則只要是清潔工都可以參加，即是說男工也可以加入。阿張說職工會現時有幾位男會員，但實際上職工會很少關顧到他們，因為職工會仍很依賴女工協會方面來運作，而女工協會又較多關注女性議題，所以有時會忽略了清潔工工會方面的男會員。阿張提到，有時她們聚會都是一大班女人，那幾個男會員自然也不好意思參與。所以阿張覺得職工會其實有需要考慮擴展服務層面，照顧男工的需要。

最後，阿張對清潔工職工會有甚麼期望呢？「我期望工會能幫多一些人，其實很多人對勞工權益都不了解，如果當初不是女工協會的職員向我講解我也不明白，有時工友們給剝削了也沒有能力反抗或不能爭取自己應有的權益。不過現時我們最大的問題是沒有資金，想做多一點工作也不行。另外我也期望可以有多點義工參與職工會工作，因為工友們的工作時間已經很長很長，實際上能投放於職工會的�間不多，如果單靠女工協會的職員來支撐的話，她們的工作量和壓力便會很大，根本應付不來。」

訪問員：關紹君

二十五歲，先後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理學院及文學院，在大學資源緊縮的情況下，曾就讀的兩個學系均告執笠及重組合併，可說是黑仔一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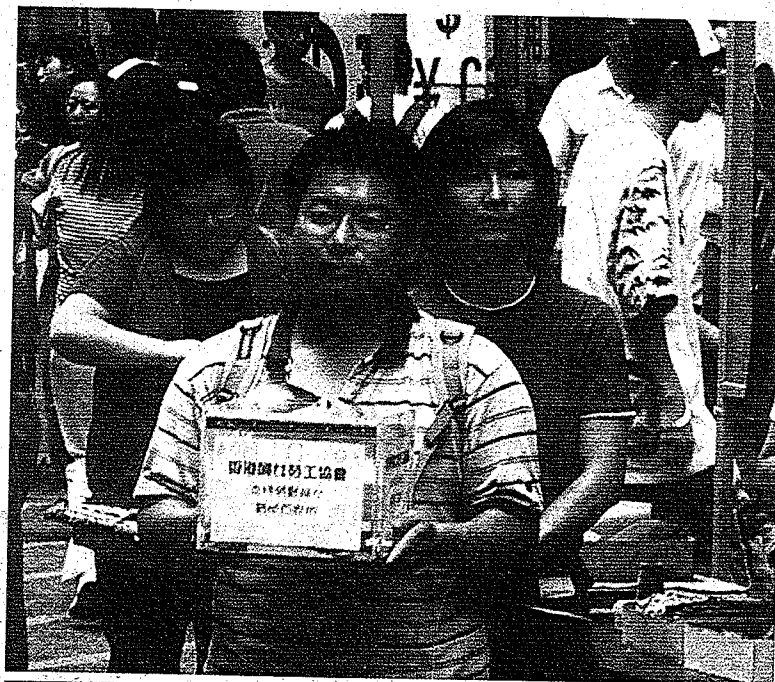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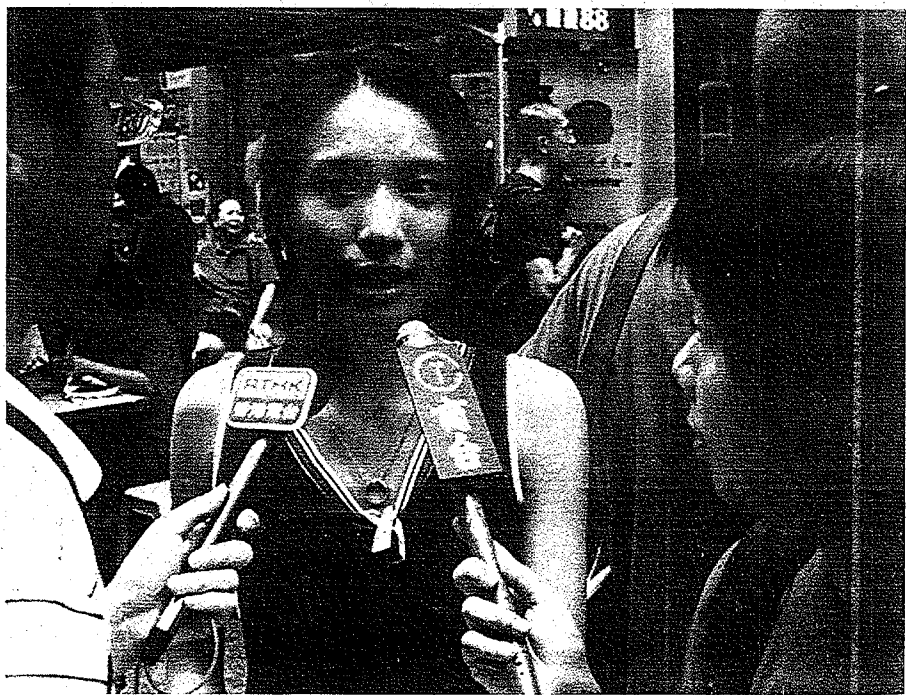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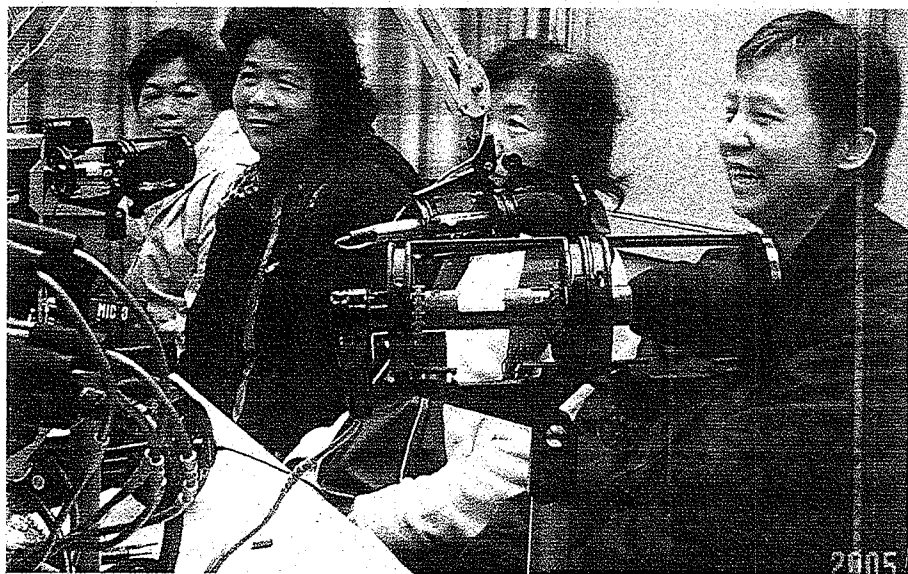
女工協會生活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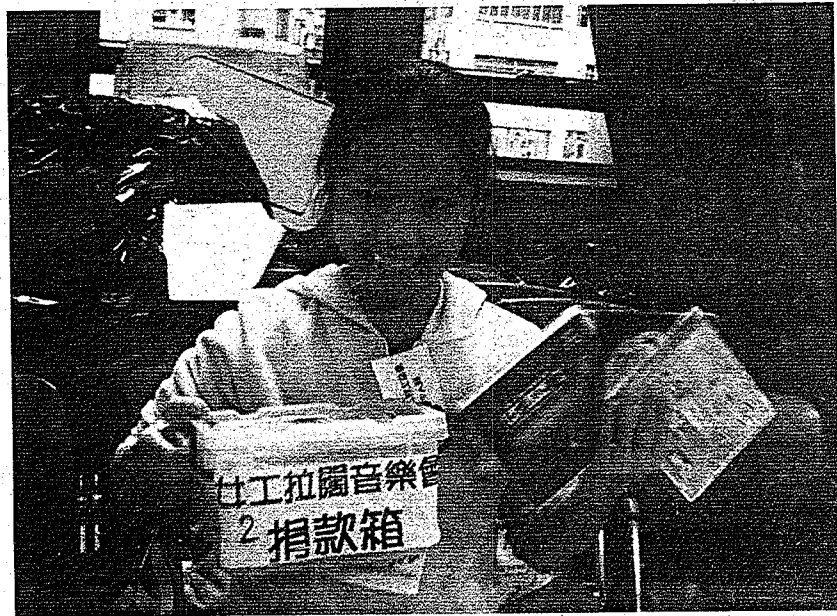
工廠、廚房、垃圾房…… 香港女工十五年

# 女工協會生活照





女工協會生活照



## 後記

吳曉真

自己過去六年都在一家僱用五千多人的龐大機構工作；大機構運作只考慮機構意志（往往亦即機構小數人領導人對所謂「營商環境」的考慮）——我們每顆鏢絲的興趣及專長實在不能亦不應影響項目的發展，或者說，我們每顆鏢絲之間，是不應該有差異的，鏢絲就應該是鏢絲的樣子。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這本小書由籌備至出版歷時兩年，最早只打算由義工組成的出書組訪問歷屆執委，紀錄女工協會不同發展階段的人和事。當時我剛完成了兼讀的婦女研究課程，同時胡里胡塗的做了那個龐大學術機構的工會會長，正為沒有人再跟我討論婦女議題感到非常憂鬱，收到女工協會招募出書組義工的宣傳，就拉了幾個朋友一起去八卦。

當時的目標，是趕在女工協會十五週年會慶時出版，作為一個里程碑。不過，女工協會及協助統籌出版的基層大學都顯然不是大機構，主事者既不考慮營商環境，又嚴重忽視效率。記得當時常常因為欠缺明確指示被搞糊塗，就趁開會時間教職員編輯，心裡是希望他們說明我們每粒鏢絲釘的功能。可是每次無論將問題如何鋪陳，他們都是答：你覺得呢？

在他們的縱容下，我們十幾個人於是都不做鏢絲釘，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意見、性格與做事方法（偶然包括將稿子一拖再拖）。每次開會又總是愈談愈遠，為著被訪者的一句說話討論半天，例如：不是基層出身的組織者是否真的有「原罪」？誰有權代表婦女勞工？誰是婦女勞工？當我們市民大眾都對婦女勞工問題不感興趣，甚至視而不見，女工協會可以如果在社會帶出基層婦女的議題？

於是出書組產生的，就不只是一本書而已，更是一班對基層婦女運動更有反省及認同的年輕人，以及眾人一個共同參與的民主經驗。兩年下

來，我們當中有的繼續學業，有的在本地婦女運動中擔起了一定的角色，更多的人帶著他們對基層婦女的思考，散落在不同團體組織中，在不同的點發揮作用。

我自己受到感召，開始參加女工協會的內部會議，成為執行委員之一。女工協會中人，仍如當日開放包容。投身工會以來，見過能將所有原則身體力行的人及組織不多，始終大環境給予的太多現實限制；女工協會卻始終堅持在生活中，在機構運作中實踐原則。

大家手上的這本特刊，比原來構想的規模大，架構較完整，當初出書組義工寫的訪問稿只佔其中一部份。過程拖長了，反而令編委有機會累積、編收更多研究報告及理論分析的文章，令全書更豐富，更充分作為香港婦女勞工運動發展的一個回顧及展望。

過去整個香港婦女運動在紀錄及分析方面的工作不是沒有，針對基層婦女的努力卻較少。女工協會在2006年的退修中，決定有系統地建立一套本地基層婦女運動的理論。這本小書或者可以做一個起步點。

要在現時全球化的大環境下實踐民主、讓基層婦女發聲、尊重差異等等價值與原則，並不容易；加上外國資助機構的贊助北移，而日益嚴重的婦女貧窮問題偏偏不受重視，意味著女工協會要在資源更少的情況下，做更多的工作，擔起更重要的任務。

女工協會一直堅持共同參與的精神於是更形重要——我們往後對的挑戰及工作，需要由關心基層婦女的你和我共同支持！

在女工協會踏入十七週年之際，與大家共勉之。